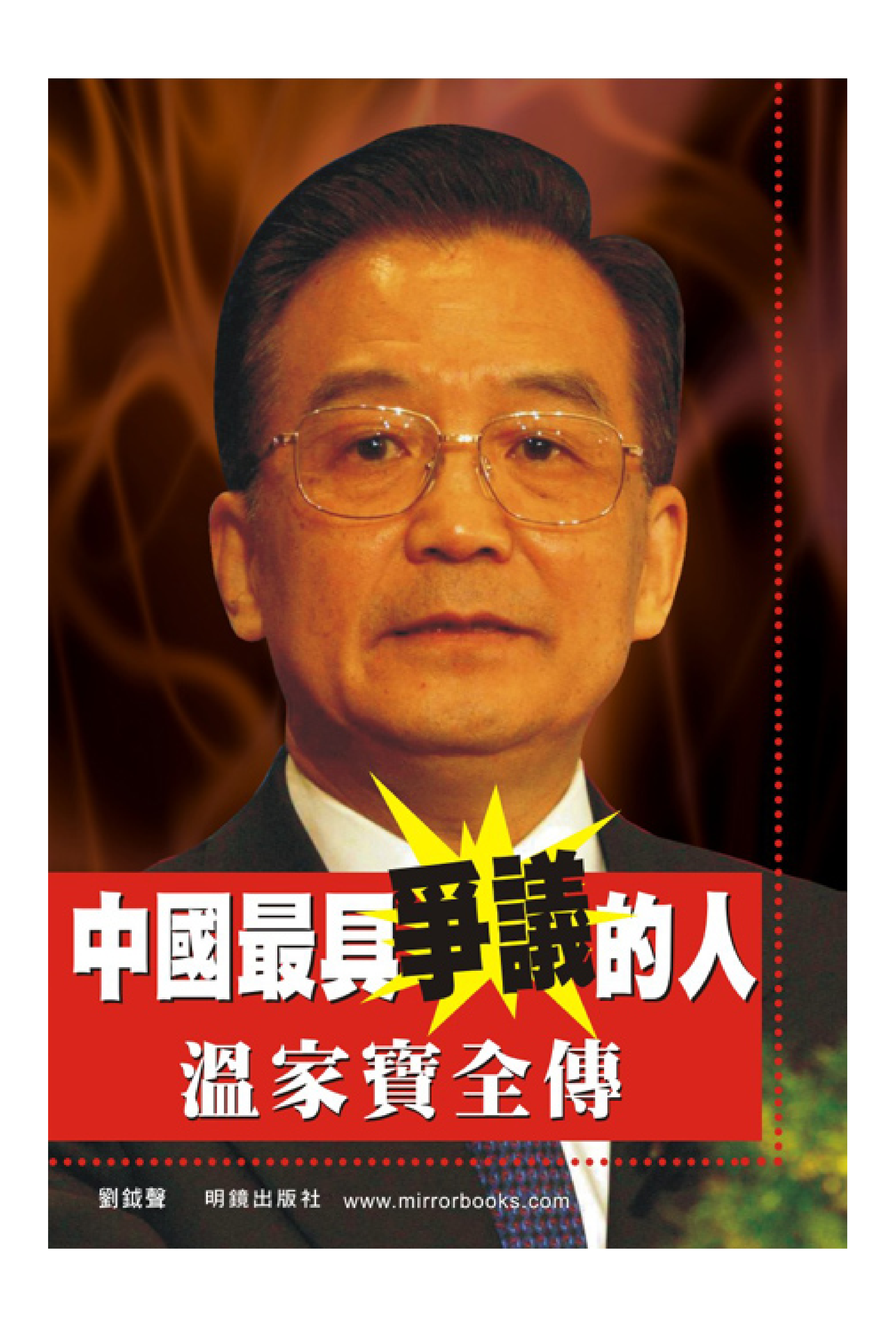
《中国最具争议的人：温家宝全传》


中國最具爭議的人
溫家寶全傳
劉鉞聲
明鏡出版社
www.mirrorbooks.com

《中国最具争议的人：温家宝全传》

目　录

温家宝出身书香门第，深具家学渊源

2003 年 3 月 18 日，温家宝在就任中国总理后的第一个记者会曾主动提到，自己的童年因为战火而摧毁，所以他深知人生的艰难。

温家宝说：“我要对全国人民讲几句话。感谢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出生在农村的一个教育世家。我的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员。我的孩提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战火烧毁了我的全家，包括爷爷亲手办得那座小学。旧中国的苦难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同年 12 月，在美国访问的温家宝再次回顾了自己饱经战火的苦难童年，他说：“一个经历苦难的人，懂得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母亲从小就教育我，对人要真实、真情、真挚、真切。一个人如果做到‘四真’就达到很高的境界。”

出身书香门第，深具家学渊源

温家宝出身书香门第，深具家学渊源。

温氏家族世居天津市郊北辰区宜兴埠镇的温家胡同八号。相传温家先祖六代人都居住在此。年长已久，胡同以温家姓氏命名。

温家宝自祖辈起两代人投身教育，是名副其实的教育世家，可谓桃李满津门。

温家宝的爷爷温瀛士，字阆仙，世居天津城郊宜兴埠，生于 1895 年 2 月，卒于 1960 年 2 月。

1919 年 2 月至 1929 年 7 月，温瀛士被荐担任民立第五小学校长。在办学中，为帮助更多的农家孩子特别是贫困女童就学，温瀛士减免学杂费，

想方设法救助。1929 年 7 月，温瀛士为让学生受到良好教育，筹划将村中娘娘庙改为校舍，因遭反对愤而辞职。

1930 年 9 月，温瀛士受同乡、教育界前辈温世霖的影响，争取女性求学的权利，成立温氏私立普育女子小学。此即普育学校。

官方媒体介绍称，温世霖一家系宜兴埠的教育世家，与温瀛士并无血缘族亲关系，但有形式上的“认户”、“认宗”。1905 年，温世霖开风气之先，创办位于天津老城内的北方最早的私立女子学校之一——“普育女学堂”。所以，天津近代有两所普育学校，先有天津城里的“普育”，后有城郊宜兴埠的“普育”，而宜兴埠也有两个温氏教育世家。

“普”，即普适和普及；“育”，即教育、培育。

1933 年，温氏私立普育女子小学改称私立普育小学。温瀛士亲自题写了校训“勤劳真实”，设计校旗、制作校徽、统一校服、教唱校歌。“勤劳真实”，言简意赅，勤奋、辛劳，又追求本真、务实。

普育小学的校歌唱道：“美哉，宜兴，地广，民众，南接金埠临新河，前途日益红。巍巍我校兮，北乡之先声，学业务真实，养成勤劳风，学生学生好自为，有志事竟成。”

据新普育学校副校长丁静介绍，温瀛士本着“勤劳真实”的校训，要求学生衣着不怕旧，但必须整洁；每天早睡早起，先刷牙后洗脸，运动过后再吃饭。还亲自教学生唱健康向上的歌曲。校园内外，《背着书包上学去》、《早睡早起身体好》、《茶树青青生嫩芽》、《母鸡下蛋》等儿歌嘹亮。

1936 年，普育小学因正式招收男生而改名私立士范小学。士范学校，即培养才智之士的典范学校。士范小学虽然是私立学校，但仍有超过十分之二的学生免交学费，体现了对贫困儿童的体贴关怀。

温瀛士办普育，一直受到宜兴埠父老乡亲的赞誉。乡亲们回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温瀛士都是靠自己微薄的薪金供养全家，因此生活极为俭朴。平时穿的是洗得发白的中式服装，吃的多是饽饽咸菜就白开水，遇有学生在全县会考得了好名次等高兴的事才稍加改善，也不过是加一包花生米。

60 分，这是当时各个学校通用的及网格线。但在普育，温瀛士却将及网格线定为 70 分，为的是激励自己的教师和学生特别是女生，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学得比别人更多的知识。正因为此，普育的成绩在全区统考中始终名列前茅。

宜兴埠马金甲八岁丧父，因家境贫寒 12 岁还没入学，温瀛士了解到他是个好学上进的孩子，亲自上门说服马金甲母亲让他读书，并免除马金甲的一

切学杂费用。马金甲也争气，多年担任班长职务，在初小四年、高小二年连续考出 12 个第一名，名闻乡里。

良师育良才，桃李满天下。用官方媒体的话说，宜兴埠普育学校的不少校友，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杨学通（1909—1987），南开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杨学涵（1912—1999），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曾为两届河北省人大代表，河北省督学
马伯义（1913—），台北艺术学院教授
林松年（1914—），上海师范学院副教授
温士琨（1918—1999），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曾任中国致公党天津工委副主委，享受教授研究员待遇及早期回国定居专家政府特种津贴
苏宝琮（1925—），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曾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主委和名誉主委，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温瀛士的长子、温家宝的父亲温刚出生于 1916 年，1942 年 3 月毕业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先后在宜兴埠公立第二小学、私立士范小学、市立二中、私立育青中学、私立普育女中、含光女中任教。1952 年 2 月后在天津市女四中、三十三中、九十六中任教。

温瀛士的长子媳、温家宝的母亲杨秀兰生于 1921 年，曾用名杨志云。1928 年入宜兴埠民立第五小学，1930 年转入私立普育女子小学，后来在私立士范小学、天津市城厢区补习学校、广播自学分校、南开区东门里小学任教。

是“温加饱”，还是“温家之宝”？

发布: 2010-9-04 11:20 | 发布者: 推介 |

温家宝不止一次地提到幼年时代母亲用“知书达理”四个字，对他进行启蒙教育的重要。高新在《温家宝传》一书中介绍说，温家宝的母亲温杨秀兰本人是大家闺秀出身。中共建政后，她响应妇女解放的号召，不继续在自己

出嫁前的名字前面冠以温氏夫姓，在中共天津市首届人民政府组织的天津市人口登记册上只使用自己的娘家本性。

自幼开始识文断字，青少年时代在女子学校的求学经历，为杨秀兰日后成为小学语文教师打下扎实的基础，更使她自己的孩子终身受益。

1942 年 9 月，温杨秀兰在天津市北郊区宜兴埠镇的温家老宅，生下了她和丈夫温刚的长子，取名温家宝。

据《党史博览》2003 年第 7 期发表的《温家宝家事》一文介绍，温家宝的名字是祖父温瀛士起的，但注入新解的却是叔祖温朋久。温朋久认为："温家宝"就是"温加饱"，以此来告诫侄孙时时要把人民的温饱放在心上，居安思危，永不忘本，来自人民，又为人民服务。现在任重道远的温家宝，当然已不会满足于"温加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正有待共和国新任总理带领全国人民去实现！

显然，官方媒体的报导和温朋久的"新解"有些牵强附会，突出了"温家宝"之名的政治含义。高新在《温家宝传》中指出，既然温家宝家乡的地名当年都能够因他们家的祖宅而起，足以说明当年温氏家族绝不至于肤浅到让他们的下一代仅仅为温饱而生存。高新认为，"温家之宝"的字面之意，应该就是温家上辈对他们新出生的后代所寄寓的全部疼爱和期待。

正所谓"衣食足而知廉耻"，当年最为疼爱温家宝的爷爷和父母双亲，为他这个"温家之宝"进行的人生观的启蒙教育便是从族姓"温"字的拼写和字意开始的。

中共十六大召开前，香港《明报》曾组织对温家宝的专题报导，该报记者采访到温家宝父辈在当年温家胡同的老住户，包括 50 多年前温家宝随父母在此居住的老邻居之一，年近 90 岁的祁婆婆。

祁婆婆回忆说：温家宝小的时候很乖，说话不多，深得父母喜欢。由于温家从事教育工作，他们的生活水平在当时而言要比普通人家好......

祁婆婆印象最深的是 1942 年的一个阴雨天，温家宝的姑姐手抱才六个月大的温家宝在胡同里散步，不巧姑姐一松手，小家宝就滑落在泥地上。奇怪的是小家宝毫发无损，也没有哭。邻居上前哄他说，"这个孩子真乖，很紧张"。

据温氏家族的长辈们回忆，温家的这个宝贝儿子牙牙学语，始便透出特别的灵气。不到三岁，就能在母亲的提示下断断续续地复诵"三字经"前面几段的内容。三岁时母亲问他"人之初"的"人"怎么写时，他已经能够用小手比划

着在空中划出一撇一捺。

从“人”字开始，在继续学写“刀、口、手、牛、羊......”等简单汉字的同时，母亲即开始教他学写自己家庭的姓氏“温”，让他了解“温”字的起源和含义。进小学读书之前，不满六周岁的温家宝就已掌握了许多“温”字起头的成语，诸如“温文尔雅”、“温故知新”、“温柔敦厚”、“温情脉脉”、“温良恭俭让”、“温润而泽”......等等。

从那时起，母亲杨秀兰和一直从事教师职业的丈夫温刚就不断地用这些“温”字起头的成语教导他们的家宝，学业上应该不断“温故知新”，行为举止应该“温文尔雅”，为人处世应该秉承“温良恭俭让”；对人要真实、真情、真挚、真切......

温家宝全家住房及其祖父创办小学被毁

发布: 2010-9-06 11:26 | 发布者: 推介 |

1946 年，也就是温家宝四岁那年，祖父温瀛士受聘来到乡贤温世霖在天津城内创办的普育女子学校任小学部主任。父亲温刚同往，在中学部教授语文、历史、地理。后来，温家宝一家搬离了宜兴埠镇的温家胡同，居住在距普育女校小学部不远的南开区西门内达摩庵前胡同。

据温家宝在南开中学的老同学房世祚回忆，当时温家房子不大，家居十分简朴，但家里有大量藏书，俨然一个小图书馆。温父是一位性格沉稳、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母亲则是一个热情、开朗、质朴、善良的传统女性。

离开宜兴埠镇温家胡同两年后，温家宝祖父温瀛士创办的士范小学和温家胡同的老宅，便在战火中毁掉了。
2003 年 3 月 18 日，温家宝在就任中国总理后的第一个记者会曾主动提到，自己的童年因为战火而摧毁，所以他深知人生的艰难。

温家宝说：“......我的孩提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战火烧毁了我的全家，包括爷爷亲手办的那座小学。旧中国的苦难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人民日报》在一篇介绍温家的文章中是这样描述这段历史的：1948 年 12 月 27 日，平津战役中的国民党守军以“扫除射界”为名，纵火焚烧宜兴埠等津郊 13 村，致使 7800 多户 3.8 万多人无家可归。温瀛士在宜兴埠温家胡同的家连同他亲手创办的士范小学全部葬身火海。

眼看倾注心血的学校化为灰烬，温瀛士最初每天用毛笔追写学校被烧的物品清单以发泄悲愤。但他很快振作起来。在一家老小居无定所、啼饥号寒的艰难条件下，他一边安排学生继续学业，一边加紧谋划：重请校董、再筹经费、修造桌椅，先后租用村中杨家下场仓库和妻妹家烧剩的一间仓房做校舍，使士范学校获得重生，简陋的教室里重新响起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当时学校有教室 3 间，学生 97 人。

1948 年 9 月，温瀛士的长孙、六岁的温家宝入士范小学就读。三个月后，他目睹了爷爷创办的小学、自己的“母校”——士范小学，被国民党军队烧毁。多年后，温家宝多次提到“这次经历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的童年是在战火中度过的，我没有在座的同学们那样一个美好的童年，在日本侵略者用刺刀把人们赶到广场的时候，我曾经依偎在妈妈身边，后来战火无情地烧掉了我的全家，包括我祖父在农村办的那所小学，我的工作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中国最艰苦的地方度过的。”这是 2003 年 12 月温家宝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的开场白。

温瀛士终身从教，培育了一支忠诚于教育的园丁队伍，其中包括他的长子、长子媳（温家宝的父母）、次子和五个女儿。其第三代中，又有一个外孙女从事教育工作。

温瀛士的弟弟温瀛举（后称“温朋久”）、弟媳刘绛雯都曾出任普育小学的校董。刘绛雯还担任过天津城内普育女子中学校长，温瀛举后来在中共建政后成为中国外交部的初创者之一。

温瀛士的长女温克勤、二女儿温克俭、三女儿温克让、六女儿温克良、八女儿温克庄都是以教育为职业。

温瀛士的次子温强 1960 年 8 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并留校任教。翌年 1 月，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作，1984 年 5 月任自治区档案局副局长，1992 年 9 月任局长。2008 年 8 月退休。现为广西大学兼职教授，广西民族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

此外，温瀛士的叔公温赢阶也曾担任天津一间公立学校校长。

温家宝的爷爷温瀛士之死是个谜

发布: 2010-9-08 09:29 | 发布者: 推介 |

在官方媒体数据中，有关温家宝的爷爷温瀛士的去世时间有两种说法，一是卒于 1960 年 2 月，一是死于天津解放前夕。

第一种说法来自《人民日报》和《南方周末》等媒体“温家宝早期家史”的介绍，称温家宝的爷爷温瀛士死于 1960 年 2 月。

文章称，中共建政后，温家宝的祖父温瀛士将士范小学交给了政府，并入宜兴埠第十八小学，改为公办。温瀛士先后任教天津市私立建华和慈铎中学，1952 年 8 月后任教崇化中学，直至病逝。从 1913 年 2 月至 1960 年 2 月，温瀛士从教 47 年，任小学校长 33 年，培育了成千上万的人才。

《南方周末》的文章还提到，1955 年，温瀛士在自传中谈到弟弟温瀛举（温朋久）时写道：“我对弟弟、子女的入学希望是为了使他们进入教育工作，不求做官发财，因为教育是救国的根本大计。后他们开始服务，大多数都是教育工作，今天还是那样。”

不过，《党史博览》在介绍“温家宝的家世”时却称，温家宝的爷爷温瀛士死于“天津解放前夕”：

生于 1905 年的温朋久，一生最难忘的就是兄长温瀛士。

温朋久六岁那年，父亲（即温家宝的曾祖父）病故。从此，长兄为父，他一直在大哥温瀛士培养教育下成长。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温瀛士就担负起家庭重担。他用当小学教员寥寥八块大洋的月薪养活自己，同时又将弟弟们抚养成人。

天津解放前夕，温瀛士不幸被害。40 多年后，每忆及沧桑往事，温朋久总怃然叹曰：“这是我一辈子最难受的事！”

温朋久为何称兄长遇害是他“一辈子最难受的事”？温瀛士到底是如何被害的？官方媒体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都语焉不详。此外，有关温瀛士之死官方媒体为何出现两种说法，而且时间相关至少 12 年（从 1948 年天津解放到 1960 年去世）？

从现有的媒体数据中已很难找到答案，很难解开温家宝的爷爷温瀛士之死之谜。不过，从现有的媒体数据分析，似乎温家宝的叔祖温朋久所感慨的

兄长遇害“这是我一辈子最难受的事”可信度很高。

但从对温家宝早期家史频有研究的记者陈杰，在《人民日报》和《南方周末》发表的文章来看，温瀛士死于 1960 年的“说法”似乎也有足够的“根据”，如天津解放后“温瀛士先后任教天津市私立建华和慈铎中学，1952 年 8 月后任教崇化中学，直至病逝”。

陈杰的这一“说法”已被多家媒体引用。如《中国经济时报》发表的“天津宜兴埠镇——百年古驿焕发生机”一文也“证实”，天津解放后，温家宝的爷爷温瀛士将士范小学交给了政府，他又先后在天津市私立建华和慈铎中学任教，1952 年 8 月后任教崇化中学。

温家宝的叔祖是共和国第一代外交家

说起温家家史，前文已多次提到是温家宝的叔祖、祖父温瀛士的弟弟温朋久（原名温瀛举）。解放战争期间，他一度曾在由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执掌的北方大学任教授。

温朋久是共和国外交部宣告诞生后最早任命的 15 位正副司长、主任委员中的一位。他是外交圈内最具战略头脑的外交家、后来被誉为中国“基辛格”的宦乡（前外交部部长助理、政策研究室主任，前驻比利时、卢森堡大使兼欧共体使团团长）的第一副手，为外交部西欧非洲司的正、副司长。不过，温朋久在外交部部内工作时间并不长。一年后，他就去了日内瓦，成为新中国第一任驻日内瓦的总领事。

少年时代的温朋久曾与周恩来、邓颖超等革命先驱一起参加天津反日爱国运动。

1913 年，温朋久入宜兴埠民立第五小学。1919 年入天津直隶师范学校，参加了“五四运动”，在著名的天津流血惨案中与周恩来等同被推举为谈判代表。1926 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民国时期享有盛名的法科大学——北京朝阳大学。

1929 年保送日本，先后就读于明治大学和早稻田大学。1931 年“九一八” 事变后，为抗议日军侵华而休学回国。1932 年 9 月公费留学德国，1933 年在柏林洪堡大学和富莱堡大学政经系学习期间加入中国抗日救国联合会和反帝大同盟，“七七事变”后回国。

1938 年 3 月，在河南省潢川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团任政治教官。1938 年 7 月，接受中共指示在西北军杨虎城部队第三十八军军部任参议兼教官。1944 年 4 月至 1945 年 11 月在赵寿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任参议，在重庆受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冯玉祥及民主爱国人士沈钧儒的高度评价，并得三人所赠书画。

日本投降后，温朋久回到天津。1947 年 3 月，由天津转入解放区，在晋冀鲁豫边区冶陶北方局学习。1947 年 6 月至 1949 年 6 月，先后在山西省潞城北方大学财经学院、石家庄华北财经学院任教员。

1949 年 7 月至 9 月，参加中央外事组任研究员。1949 年 9 月，任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副司长，是周恩来自开国建部以来首次任命的 15 位司局级干部之一。1950 年 10 月至 1955 年 1 月，先后任驻瑞士大使馆政务参赞和驻日内瓦总领馆总领事。1955 年 9 月，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1960 年 9 月，任驻民主德国大使馆文化参赞。1960 年 9 月，在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五司任司长。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受到迫害，入狱多年。1978 年 8 月起，由中组部重新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后转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任常务理事。1981 年后改任顾问。1984 年 4 月 13 日离休。

官方数据显示，温朋久在“文化大革命”中旗帜鲜明地抵制“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平反出狱后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离休后关

心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晚年乐观豁达，笑对人生，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温朋久对周恩来满怀深情，曾赋诗一首："盛德千古范，丰功震环宇。中外齐歌颂，人民好总理。"2000 年 7 月 8 日，又将自己珍藏的郭沫若等六位名人画作捐给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2004 年 12 月 12 日 13 时 30 分，温朋久在北京医院无疾而终，享年 100 岁。

温家宝喜欢踢足球，惹了祸不敢告诉家里

发布: 2010-9-10 08:35 | 发布者: 推介 |

就在叔祖温朋久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的 1949 年秋天，七岁的温家宝来到天津城里的火神庙小学（后更名为鼓楼西小学）求学，并因成绩优秀被准直上三年级。

1954 年，12 岁的温家宝从火神庙小学毕业后，报考了南开中学（时称十五中）。当时每所小学能升入南开中学的仅有一个名额，温家宝被顺利录取。他在南开中学读了初中和高中，共六年。

李溥是温家宝"发小"，也是南开中学的校友，直到现在，两人仍保持联络。李溥回忆说，他比温家宝大一岁，但温家宝五岁上了爷爷创办的士范小学，后来随父母搬到天津城里，才转到了火神庙小学。

李溥在 1956 年考入南开中学的时候，温家宝已经是初三年级的学生了。李溥说，少年时的温家宝就是温和、亲切的性格，从不和人争吵，从不胡打乱闹，不说脏字；温文尔雅，待人谦和，对师长很有礼貌。

李溥说，温家宝的母亲从小教育他儿子待人要真诚，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并身体力行。因此，温家宝的母亲在左邻右舍间威信很高，人们都亲切恭敬地称她"杨老师"。

南开中学的老同学房世祚在接受香港《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我家境困难，温母就让温家宝上学带饭时多带一份给我。温家喜爱京剧艺术，

常送戏票给我，让我和温家宝一起去看。我还经常到他家去看书，比如中外文学名著等等。他们一家对我帮助非常大。”

据李溥介绍，温家宝不偏科，每门课的成绩都很好。当时每班好象是 40 多人，温家宝常坐在中间靠前的座位。温家宝在操场上打篮球的身影留给李溥的印象最深，“他是南开中学篮球队校队的成员，还在天津市比赛中拿过名次。”

“他右手写字，左手秀球（投篮），温家宝打球的样子很潇洒，他左手投球的特点给人印象深刻。”李溥不无幽默地说：“看来温家宝总理左右脑都很发达，所以，智慧超人。”

李溥接着解释说：“其实，温家宝最初喜欢踢足球，但有一次不小心，他把范孙楼后的一块玻璃打破了，惹了祸也不告诉家里。学校有严格的赔偿制度，当时一块玻璃要赔偿 3 毛钱。总务处老师多次在他教室门上的小缝里贴纸条，催促他偿还玻璃钱。当时老百姓生活水平很低，温家宝只有从妈妈每天给 5 分钱早点钱里攒，攒了好一阵子，才凑够了赔玻璃的钱。从此，温家宝不踢足球了，改打篮球。”

“50 年代时，尤其放暑假，天津不少青少年在胡同家门口，都流行成立小篮球（实为小皮球）代表队。我给我们胡同（达摩庵前胡同）的代表队起名‘达联’， 先找来一块不足一米的长方形木板，用铁丝做个篮筐，再编个网子，然后把篮板钉在胡同的砖墙上，立刻引来胡同里不少青少年玩小皮球，也就是从那时起，温家宝微笑着用左手跳起准确秀篮的动作，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暑假里，在家门口除了搞一些小皮球、乒乓球、跳高体育活动外，还有吹口琴、横笛的音乐活动。我家北邻的宋明荷学长是南开中学 1955 届毕业生，年长我们五、六岁，他擅长写作与唱歌，温家宝曾向他学会了唱《傲包相会》。”

李溥说：“后来在北京他的家里，他曾跟我回忆起南开教音乐的姜韵泉老师，每次在音乐教室上音乐课之前，总是给同学们弹奏一遍钢琴曲《土耳其进行曲》，久而久之，那优美铿锵的旋律令他终生难忘，以至 80 年代他出访欧洲某国时，他能一下子听出了所演奏的迎宾曲是《土耳其进行曲》时，令该国元首十分惊讶、佩服中国领导人的音乐修养。”

温家悬挂的书法“高远”悄然改成“高洁”

发布: 2010-9-11 08:33 | 发布者: 推介 |

2003 年 3 月 6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温家宝，从一条小巷走出的大国总理》一文，对温家宝一家迁入天津城内后的旧居——达摩庵前胡同九号有详细的图文记述：

达摩庵，“文化大革命”前是香火缭绕的尼姑庵。温家宝曾居住的是达摩庵前胡同九号院，推开年代较远的院门，面前是十分拥挤的小院，左侧翻修后房子就是温家宝过去的家。

房屋的新主人刘志杰大爷、刘玉英大娘老两口，原住九号院对门，七八年前买下温家的老房。温家宝兄妹三人，他为长子，与父母一家五口居住在不足 21 平方米的两间平房，上大学前就在这里成长度过。

邻居们说，温家宝的父母分别是中小学老师，带着三个孩子，家境很不宽裕，居室的“洋灰”地面坑坑洼洼，没有什么象样的家具，非常简朴。老邻居敬重温家书香门第，至今称温家宝的父亲为“温先生”。

在他们的印象中，温家宝很聪明，功课很好，做事稳稳当当。人们记得，他与小伙伴一起卸下院门当乒乓球台。母亲上班把房门钥匙留在邻居家，温家宝放学去取，“刘娘，我妈把钥匙放您这了？”言犹在耳。

温家宝到中央工作后曾几次回到这条胡同，看望父母，走访老邻长辈，亲亲热热拉家常，在众人眼中，他还是隔壁的孩子，没有一点官架子。有时，温家宝的母亲炸好面酱，托跑运输的邻居带到北京。

2003 年国庆节，温家宝到安徽沿淮灾区视察时，在阜阳曹集镇与小学教职员工谈话时说：“我家也很穷，我得了白喉，我父亲把手表卖了给我治好了病。”

在邻居们的记忆中，温家宝对亲属要求很严，其姑母长期在宜兴埠居住

未见沾过什么光，温家宝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时，镇里一些居民曾向其姑母查询，得到答复都是一句话：同名同姓而已。几年前姑母去世，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曾寄来 700 元钱。为什么是 700，而不是 1000 这样的整数，或者 800 这样的吉数？让人疑猜。

聊起同一个胡同长大的“发小”温家宝，李溥在接受天津媒体采访时说：“我和他接触中，听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靠自己’。”

“以前，温总理家的走廊尽头墙上悬挂着两个墨笔字：‘高远’，是志存高远之意；近几年，我再去时，主人家墙上的‘高远’两个字悄然改变了一个字，变成了‘高洁’两个字。虽然仅一字之差，却意味深远，耐人寻味。”

“温家宝能成为继周恩来后从南开中学走出来的又一位国家总理，这决不是偶然的。”李溥认为“首先他从小受到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的祖父是位民办教育家、他的父母是中学和小学老师。在家庭的熏陶和父母庭训下，他健康成长。”

李溥回忆说：“80 年代初，杨老师退休后还热心居委会工作，杨老师尊称我母亲为‘李奶奶’，她一有空就过来看望‘李奶奶’，并把温家宝从北京捎来孝敬父母的一些补品转送给我母亲‘李奶奶’享用。”

李溥说：“在他家里三个孩子中温家宝排行老大，宽厚仁爱，颇有作兄长的风范；他生活简朴，上中学时他穿的鞋子基本都是杨老师亲手做的。”

李溥还记得杨老师在天津时向他说过的一件事：“有一次下大雨后，家宝放学是光着脚趟水回到家的，我很纳闷，明明有新做的鞋，家宝却不穿！我很快发现，家宝把新做得鞋子用布包裹起来抱在身上，他舍不得穿，怕新鞋子进了水，就自己趟着水回来了。”

温家宝进入南开中学，以校友周恩来为楷模

发布: 2010-9-12 09:11 | 发布者: 推介 |

温家宝 1954 年跨进并就读六年的南开中学，是南开系列学校（大、中、小学、女中）的发祥地。创办人严范孙、张伯苓，1904 年将旧学塾改建新学堂。周恩来 1913 年至 1917 年在此读书。一所中学培养出两位新中国的总理，绝无仅有。

南开中学首任校长张伯苓任职 46 年，倡导教育救国，缔造了南开精神。南开中学训练学生注重五个方面：一、重视体育。“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体德兼进，体与育并重；二、提倡科学；三、团体组织。训练学生做事能力、服务精神；四、道德训练。特别注重于人格教育；五、培养救国力量。学生在求学时代，必须充分准备救国能力。五项训练归结为“公能”二字，即“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和“服务社会之能力”，“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作为南开校训。用今人的阐释，南开精神就是“爱国、乐群，敬业，崇尚科学，追求发展。”南开中学第六任校长康岫岩说，浓厚的爱国、乐群、敬业的公德价值观氛围，强烈的崇尚科学、追求发展、服务社会的责任感，这就是南开中学的特色，以此锻造学校的人文精神。

南开的校墙特选青莲紫色，寓意学子出污泥而不染，气质高洁。至今，在南开中学的教学楼门口悬挂着创始人严范孙为学生制定的“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官方媒体评论称，在南开的人文精神熏陶下，在天津以及抗战期间迁址重庆，一批批优秀的学子走出校园，成为社会的栋梁和中坚。

据不完全统计，南开中学近百年的历史培养新中国的总理 2 人：周恩来（1917——届别，下同）、温家宝（1960）；副总理 1 人：邹家华（1941）；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4 人：林枫 （1930）、吴阶平（1932）、邹家华（1941）、周光召（1947）；全国政协副主席 5 人：屈武（1922）、王昆仑（1923 师范班）、孙孚凌（1938）、万国权（1938）、朱光亚（1941）；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央研究院正副院长 6 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央研究院院士，外籍院士和国外的院士 55 人。

另外，社会各界的许多著名人士也都是出自南开，比如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著名作家、艺术家老舍、曹禺、黄宗江、端木蕻良、周汝昌、金焰、韦君宜、张肖虎、沈湘......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开中学历届毕业生中还出了两位清华大学校长。

2003 年 4 月才因为年龄原因辞去清华大学校长职务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班主任，著名核能专家王大中是南开中学 1953 年毕业生。

南开中学培养出来的另外一位清华大学校长是著名教育家、中研院院士梅贻琦。他于 1909 年毕业于南开中学的前身“南开中学堂”，考取清华大学游美学务处选派的首批赴美留学生，1915 年回清华学校任教，后任教务长，暂代校务，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等职。

1931 年 10 月至 1948 年 12 月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到职后多次阐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等办学至理，并积极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他认为：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在他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发展为一所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学府。

八年抗战期间，梅贻琦仍是清华大学校长，并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任联大常委）。西南联大的存在和发展，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回到北平，梅贻琦继续担任校长，直到 1948 年 12 月清华园解放前夕。在他任校长的 17 年里，清华大学得到长足发展，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等五个学院 26 个系，在校师生 2400 多人。

梅贻琦于 1955 年由美去台湾，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扩展为新竹清华大学）。1962 年 5 月 19 日病逝于台北。

温家宝在回忆自己的南开生涯时，清楚记得入校的第一天，班主任教师便向同学们讲述了“南开中学校友的最杰出代表”周恩来在南开求学的经历，要求他们以周恩来为楷模，力成大器。

官方媒体曾这样评价称：周恩来的事迹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温家宝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温家宝的为人和行事颇有周恩来风格与此当不无关系。

周恩来，字翔宇，号飞飞。祖籍浙江绍兴，1898 年 3 月 5 出生于江苏淮安。1910 年春天，12 岁的周恩来随堂伯父周贻谦到奉天银州（今辽宁铁岭），入银岗书院读了半年书。秋天，伯父周贻赓接他到沈阳入东关模范学校学习。这时，少年周恩来在老师的教育和《革命军》、《猛回头》等书刊影响下，已树立读书救国的大志。

1913 年 8 月中旬，周恩来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周恩来入学初期，国文、英文成绩欠佳，经过奋发努力，很快赶上，各科成绩均优。在课外，他非常关心时事，经常阅读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报刊、书籍，如《民权报》、《民立报》、《大公报》和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的著作，以及西方启蒙思想家鲁索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

等。他还积极参与敬业乐群会、校风报社、新剧团、演讲会等学生社团的活动，担任各种负责工作。

1917 年 6 月，周恩来从南开中学毕业。经过南开四年的学习培养，周恩来不仅成为热心公益，各科成绩优秀，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而且成为一位极为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爱国者。

同年 9 月初，他抱着"邃密群科济世穷"的决心，为寻求救国良方，东渡日本留学。周恩来在日本度过了一年半的留学生涯，1919 年 4 月，他在得知南开学校即将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决定回国学习。9 月入南开大学文科，学号是 62 号。

周恩来入南开大学期间，正是"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不断高涨之际。他和广大进步青年一起，从"五四"运动一爆发就投身伟大洪流之中，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起成立"觉悟社"，组织天津学生赴北京总统府请愿。在校内，他负责"南开学校学生通讯处"工作，联络海内外南开校友，他还协助张伯苓校长推进学校的改革工作。1920 年 1 月，他组织领导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直隶工业学校、直隶女子师范、南开中学等天津爱国学生三千多人向直隶省公署请愿，被反动当局逮捕。出狱后，于 1920 年 11 月由南开大学"范孙奖学金"资助赴欧洲勤工俭学。

在旅欧勤工俭学期间，周恩来、赵世炎等发起组织旅欧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为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正式开始了他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生涯。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成立，周恩来出任总理。1945 年 9 月政务院改称国务院后周恩来继任总理。直到 1976 年 1 月病逝，周恩来担任了 26 年多时间的国务院（政务院）总理职务。

据明镜出版社的《温家宝传》一书描述，在南开中学求学生涯里，好学上进的温家宝对被誉为“南开楷模”、“后生风范”的周恩来一直怀有高山仰止的无限崇拜。当然，少年时代的温家宝虽时常被父母和老师教导要树立远大志向，但绝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第四代领导人，更不会预料到他温家宝会在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去世 27 年以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任总理。

细算起来，周恩来当年从南开中学毕业到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中间历经了 32 年多的时间。温家宝日后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到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任总理，中间也历经了 32 年多的时间。

温家宝因南开背景赢得邓颖超的好感和信任

发布: 2010-9-13 07:34 | 发布者: 推介 |

温家宝在走出南开校门 25 年之后，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时，还能背诵出在南开中学传诵的《周恩来同学中学毕业评语》。

1917 年周恩来从南开中学毕业前夕，按照校规，每班要编辑一册毕业同学录。大家一致推举周恩来为总负责。周恩来、常策欧分别为同学录作序。在同学录上，除刊印各同学的照片，还要附一篇各人小传，由相互熟悉、了解较深的同学执笔。周恩来的小传，便是由常策欧撰写的。

温家宝背诵着这段传记：“君字翔宇，号飞飞，浙江会稽人……十五来津门，遂入南开。初至英文非佳，嗣发奋攻读，始同趋步。而国文则早露头角……以善交游，到处逢人欢迎。曾为校风报总经理、演说会副会长、国文学会干事、江浙同学会会长、新剧团布景部部长、暑假乐群会总干事及班中各项干事。凡此均足证其学识毅力之胜于人也……班中事无不竭力，即此同学录之经营，君实为其总编辑焉。君性情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

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能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造成斯绩。殆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者欤！”

1985 年温家宝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报到时，即听说自己十分景仰的周恩来遗孀，此前刚刚辞去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仍继续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正在西南地区视察。邓颖超回到北京后，温家宝就在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的引荐下，到中南海西花厅拜见了邓颖超。

据杨德中后来回忆：温家宝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时，邓颖超曾对他说：“这个中办主任作风稳重，行事周全，有些方面很有点象当年的恩来。”

初次见面，温家宝便告诉邓颖超，解放以后，自己从在天津读小学到南开中学的十年时间里，从父母和南开教师口中，陆续知道很多很多关于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天津从事早期革命活动的感人故事。

比温家宝年长 38 岁的邓颖超，1904 年出生于地处中国南方边陲的广西南宁镇台衙门里，三岁的时候父亲弃官后丢职、家业破败，随母亲流离颠沛到广州、上海后，六岁时漂泊到天津谋生。从 1910 年至 1925 年邓颖超除中间在北京担任过两年小学教师，共在天津生活了 13 年，包括了她青少年时代的全部求学生涯。

1913 年，九岁的邓颖超考入了直隶（当时天津属直隶省）第一女子师范附属小学四年级，11 岁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直隶第一女师预科，12 岁顺利升入该校本科。

当时，南开中学是男校，所以邓颖超没有可能在这所学校读书。但是，当时的南开中学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如同兄妹学校，邓颖超在这所学校求学期间，校长是由南开中学校长、中国早期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代理。

比周恩来政治成熟更早，邓颖超从 12 岁就开始参与校内学生社团活动，15 岁已成为跨学校的天津市学生和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北京“五四”运动爆发的当月，邓颖超就与后来成为李大钊夫人的郭隆真等人发起成立天津妇女界爱国会，邓颖超被推举为讲演团团长。她与周恩来的初次相识，便是在南开中学礼堂向数百名该校男生们演讲天津各界派代表到北京请愿遭到政府无情镇压的情况。

后来，邓颖超在直隶第一女师毕业去北京教了两年平民小学后，又返回了天津，并成为职业革命家，领导天津市妇女界和教育界的左翼运动，并在

那里相继加入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直到 1925 年因为被北洋政府通缉才被迫离开天津，南下广州……

在与温家宝见面前，邓颖超就听说中南海新来的年轻人也是南开中学毕业，而且是在南开读中学时就加入了共青团，心里非常高兴。邓颖超曾经是共青团的前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天津最早的团员之一，于 1924 年 3 月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

见面那天，邓颖超还向温家宝愉快地回忆起自己 60 多年前在天津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仔细询问了温家宝出生和自幼生活在天津什么地方，父母双亲在天津从事什么工作。她还告诉温家宝，虽然自己原籍不是天津，但天津是她真正意义上的故乡。

在谈及自己的父母双亲均以人民教师为职业，谈及母亲严格的家教如何令自己受益终生时，邓颖超告诉温家宝，她的母亲杨振德在她九岁那年开始在北京的一所平民学校当教员，并给她起了一个学名叫邓文淑。因为自幼跟随母亲学文化，所以她在母亲做了小学教师之后，就直接插班进入了母亲所教的三年级学习。毕业之后，因为这所平民学校被迫解散，邓颖超的母亲就回到天津，靠同时给几个大户人家做家庭老师为生，邓颖超则进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附属小学读书。

邓颖超还告诉温家宝，她本人 16 岁那年在直隶女师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和天津两地做了五年的小学教师工作。她对温家宝说：我当小学教师的时候，不但你还没有出生，你的父母可能都还比我那时的学生们年龄小。不过，你父母在天津当中小学教师以后，肯定知道天津当时很有些名气的达仁女校。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那个时候和我一起在这所学校教书。你们南开中学的创办人之一张伯苓先生的妹妹张冠时那个时候在我们这个学校里教音乐。张冠时的丈夫马千里先生是我们这所学校的校长，当时也还在你们南开中学兼职。

高新在《温家宝传》中描写到：见邓颖超是那样兴奋地回忆起自己青年时期在天津的求学和从教生涯，对天津的教育发展历史如数家珍，温家宝也忘记了身为下级和晚辈的拘谨，话题越扯越长。当温家宝介绍自己的祖父温瀛士曾经是天津宜兴埠私立小学校长，还曾经开办了当地一所女子学堂，叔祖父温瀛阶当时也在天津担任过公立学校校长职务时，邓颖超更加兴奋，连连表示她对当时天津教育界的知名教师和教育家的身世大都比较熟悉，并对温家宝回忆说，她当年从北京回到天津以后，一边在达仁学校任教，一边积极参加过天津市和全国的平民教育活动，20 岁的时候即已担任了直隶省教育

委员会委员和天津市教育委员会执行委员。邓颖超还回忆说，1925 年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后，为声援上海，代表当时天津 80 多万民众的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邓颖超作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曾在 6 月 6 日的成立大会上号召“商人罢市、学生摆课、工人罢工”，温家宝祖父执掌的天津宜兴埠私立学校的爱国师生也曾积极参加……

第一次见到邓颖超，便与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的夫人找到了丰富的共同语言，使得温家宝与中共重要元老之一邓颖超之间立刻拉近了距离。从温家宝方面，自然是对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的崇敬之情更加深厚；从邓颖超方面，则是通过这第一次见面便对温家宝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

日后的温家宝在升为中央办公厅主任之后，对邓颖超的特别关照无疑是他份内的工作任务之一。《温家宝传》作者高新指出，但温家宝从内心里从未把对邓颖超的关照仅仅当成是简单工作任务，而是始终怀着后生的景仰和晚辈的爱戴之情对待邓颖超。

温家宝赢得邓颖超的好感和信任，也为自己在中南海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从而也使自己能在 1989 年那场政治风波中化险为夷。这是后话，本书后续篇章有更详细的介绍。

1992 年 7 月 11 日，邓颖超与世长辞。当时的温家宝作为中办主任，与杨德中一起全权负责对邓颖超丧事的安排，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向遗体告别的时间、顺序，遗体火化前的守灵人员安排等。而他本人，则是自觉自愿地每天到医院为邓颖超守灵一段时间。

7 月 17 日，温家宝又与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义子李鹏，长期在周恩来夫妇身边工作的杨德中一起，为一生没有子女的邓颖超洒泪扶棺至八宝山革命公墓。

温家宝早就擅长跑步用左手上篮

发布: 2010-9-14 07:55 | 发布者: 推介 |

2008 年 8 月 5 日，温家宝在北京五棵松奥林匹克篮球馆跑步上篮、大秀球技的报导，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眼球，更吸引了母校南开中学老师袁化的注意力，“总理读书时可就是个篮球高手！”

当时，正在天津档案馆举办的“迎奥运天津体育展”中，最醒目的展柜中陈列着这样一张照片，十几个年轻人站成前后两排，短衣短裤，对着镜头腼腆地微笑，其中最靠右侧的那个男生就是少年时期的温家宝！

“看到这张照片，就不难想象出总理为何直到现在都有这么矫健的身手。”这张照片的捐赠者是袁化，他曾经是天津篮球队的一名主力前锋，自 1976 年开始在南开中学篮球队执教整整 30 年。

获得这张照片，袁化也是几经周折，“必须要感谢我的同事、老前辈——温总理当年的篮球教练曹国玺老师。”他说，早在南开中学 90 周年校庆的时候，他偶遇曹老师，得以看到这张珍贵的老照片，“其实总共两张照片，是同一时期篮球队的合影，我特别想珍藏，但又觉得这不是夺人所爱嘛。”

“我那会儿正负责学校篮球队，每次带着学生们打球，都会想起年轻时的温总理。”收藏照片的念头一直在袁化的心中萦绕不散，但却始终没有机会再见到照片所有人曹国玺老师。

学生时代的温总理篮球打得好不好呢？

“这个问题我反复问过曹老师，得到的回答都是特别肯定的。”袁化说，温总理篮球技术非常好，而且还是左手。“曹老师说，使用左手的人，不容易被对方控制，而且绝对聪明。”更主要的是，年轻时代的温家宝还非常勤奋刻苦，每天的训练课风雨无阻，无论是投篮、运球、练习赛，还是基本体能训练，都从来不打折扣。

2009 年 2 月 28 日，温家宝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有网友提问：我们在新闻里看到总理会打棒球、打太极，打乒乓球，投篮的姿势也挺像那么回事儿的，而且是用左手上篮，您有时间锻炼吗？最喜欢什么运动？

温家宝回答说：其实我想回答的超出你问的范围了，因为我在中学受到

良好的教育。南开中学是一个非常重视体育的学校，在我上学的时候，我记得一下课，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抱着篮球占场地，以至后来我被选入学校少年代表队参加全市的篮球联赛获得了第六名。一所中学的棒球队竟然培养出六个国家级的运动员。

在官方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年少时的温家宝的确是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21 世纪经济报导》撰文称：温家宝从小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及中国儒家思想的道德熏陶，养成了为人谦虚的儒雅风度，对于个人家庭的事情，从不张扬。

1959 年调入南开中学任高三班主任的刘淑莲老师，夸奖温家宝是“有主见、守纪律、学习刻苦的好学生”。她回忆说，温家宝性格内向，但是很有主见；读书非常用功，恨不能把知识全“吃”进去。

代数老师张学聪说，在学生中之所以对温家宝的印象很深，一是他永远工整、明了的作业本，二是他从中学时代就表现出极强的自理、自律和自强精神。与温家宝同窗六年的周强介绍，温家宝喜欢体育，一直是班里的篮球队主力，曾代表学校的少年组参加过比赛。

温家宝 1984 年写过一篇文章《南开精神永放光芒》，叙说他在南开六年的生活，“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南开精神一直鼓舞着我在工作和生活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南开精神首先是革命精神。南开中学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我戴红领巾的时候，我就从校长、老师那里了解到敬爱的周总理早年在南开的革命活动，知道马骏等许多革命先烈的事迹，为母校曾经培育过这样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感到自豪。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南开中学是十分重视德育的。

学校的共青团组织充分发挥了团结、教育青年的作用，在青年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我清楚地记得，在中学学习期间，我们许多同学不仅努力学习文化知识，而且重视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关心时事政治，追求进步。可以说，中学时期是我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人生观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在南开中学所接受的思想教育，为以后参加革命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南开精神是严谨的治学和刻苦的学习精神。南开的教学质量—直是比较高的。南开中学有很多具有渊博学识和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也有不少解放后培养的又红又专的中青年教师。他们那种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和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南开中学的学生学习是很努力的，学校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南开中学不仅给我们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而且培养了我们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知识和技能至今在工作岗位上都还离不开。

南开精神是朝气蓬勃的精神。南开中学的课余生活是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学校非常重视体育。田径、篮球、棒球、棍棒操等体育活动开展得很普遍，常常在全市中学比赛中名列前茅。在团组织和学生会的领导下，学校有各种科技、文艺社团，如航模社、话剧队、合唱团等。周末有社团活动，学期有汇报演出。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增强体魄，丰富知识，活跃生活，陶冶情操。现在想起来、还使人欢欣，让人振奋。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校对我的培养教育是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多年来一直关注着南开中学的建设和发展，在官方媒体看来，是温家宝“对母校怀有眷眷的赤子情怀”的真实表现。

矗立在校园内，温家宝参与、南开校友 1999 年捐赠母校的座钟“情系南

开”，座钟树碑署名，“温家宝”位列第三排右数第五个；正像他所要求，名字不要靠前；当时，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在所有署名者中职务最高。

1994 年春，他为母校题词“南开永远年青”，现悬挂在教学实验楼二楼的一侧，激励着在校的学子们。

温家宝三次回母校都是其仕途重要转折点

发布: 2010-9-15 11:36 | 发布者: 推介 |

自 1960 年从南开中学毕业后，据官方媒体统计，温家宝共回母校三次，每次都是静悄悄地，既没有惊动地方领导，也没有惊动学校领导，有时是值班门卫师傅陪同。

高新在《温家宝传》中指出，从温家宝回天津探望父母和南开中学的特定时间里，更能够看出温家宝对父母的感恩和对母校的情怀。

据人民网记者陈杰的文章《温家宝，从一条小巷走出的大国总理》记述，温家宝从 1990 年至今，已经三次回天津探望家人后回到母校参观访问，一次是 1990 年 10 月 2 日，一次是 1997 年 10 月 2 日，第三次是 2002 年 9 月 16 日。高新强调说，温家宝三次返回母校的时间，都是他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

1990 年年中，温家宝奉江泽民之命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身份主持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起草小组的工作。在此之前，温家宝主持重要文件的起草小组已经不知有多少回了，但这一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入主中南海已有一年时间的江泽民对温家宝有了初步的政治信任，并在与温家宝等人讨论这份文件的过程中，不但对温家宝的能力表示欣赏，而且开始有了让温家宝涉足经济领域的想法。

这一年的 9 月，该文件的起草工作基本完成，等待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后便要提交到预定在年底召开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于是，总算长长松了一口气的温家宝利用“十一”公休假日回到天津省亲，一探父母双亲，二访母校南开。

10 月 2 日下午 2 点多钟，温家宝徒步沿着当年上学时的路线前往母校来到传达室。他微笑着和蔼地对值班的边大爷说：“我是南开校友，叫温家宝。我想进学校看看。”边大爷一听名字，再—看眼前这位身穿深蓝色中山服的温和的中年人，确实就是电视新闻节目里常看到的温家宝，他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忙说：“快请进。”

温家宝首先拜谒周恩来铜像，并回忆起 1957 年 5 月 4 日，周总理从北京给正在举行“红五月青年大联欢”的南开中学母校同学们来信时的难忘情景。当他看到眼前那熟悉而亲切的中楼、东楼、范孙楼、北楼，那绿色的长廊，那西后院操场，那五排灰砖平房宿舍和那巍巍的大礼堂后，一下子自己在这里生活、学习的情景，一幕幕清晰地展现在面前。

这时，正在校内值班的人事干部王德华以及当时也在校内的王志刚、封毓中老师得知温家宝到母校，请他到党总支办公室内稍事休息。温家宝询问了学校教育经费情况，又一一询问当年上学时老师们的情况。当听说这些老师绝大部分已离、退休了，便一再拜托在场的同志，一定代他向老师问好！

3 点 10 分，从中楼出米，温家宝参观校内的“周恩来同志青少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然后，来到范孙楼，在一楼严范孙的半身汉白玉雕像前合影留念。走出楼来，又在周总理题写的“我是爱南开的”匾额下合影留念。3 点 50 分，来到学校大门口，温家宝高兴地与在场的校工边、贾二位师傅及老师们合影留念，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母校。

1997 年 10 月 2 日午后，温家宝与家人静悄悄地来到母校。这是他第二次返回南开中学。一个月前，温家宝在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同时也在这次会议之前即已被内定要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高新在《温家宝传》中介绍，在此之前，外界很少有人知道温家宝其实是从 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开过之后，即已经被安排为不公开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职务。而十五大的人事安排，意味着温家宝从党务系统转行至经济领域的过程，已经从幕后历练开始转向前台，更意味着温家宝的人生道路和政治仕途步入一个的新历程。于是，温家宝再次利用“十一”公休假日回到天津，一谢父母亲生育教养之亲情，二谢母校南开培养教育之恩德。

如果不是因为考虑到江泽民要以中共党政军三个一把手的权威身份最后一次访问美国，中共十六大本来是要在 2002 年 9、10 月召开的。年初中共就已对此发出公告，称党的十六大将在 2003 年秋季召开。不过，大会虽然因为江泽民访美之需推迟到 11 上旬召开，但 9 月份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

已经将全部高层人事内容安排完毕，温家宝已经被正式内定为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在次年 3 月的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接替朱镕基的国务院总理职务。

此刻，势在必行的温家宝又正赶上 60 大寿，自然更加怀念父母双亲，更加感谢培养他的母校南开，同时也不免回想起了自己当年在雪山冰川、戈壁荒原里默念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艰苦岁月。于是，他通知属下，将自己最新一次基层视察的目的地定为甘肃酒泉，而后便从甘肃直飞天津老家......

2002 年 9 月 26 日晚l0 时许，一辆中旅车开进校内，停在范孙楼北侧，身着深色夹克衫的温家宝从车内走出来，对学校值夜班的人员说：“我毕业 40 多年了，今天来校园里看看，不要打电话，惊扰别人。”

温家宝等人从含英楼西口进入上到二楼，这时同学刚下晚自习陆续回到宿舍，当温家宝来到 204 室时，高一 2 班的三位同学见到温家宝，立刻起立鼓掌欢迎，温家宝连说：“坐，坐，坐。”招手让同学们坐下，他就势在临近门口的—把椅子上坐下，与同学们亲切交谈，微笑着问：“一屋住几个人呀？”“住八个。”同学们答道。温家宝说：“我上南开时，都住的是平房。那时我也住在 204 室，所以对 204 室有特殊的感情。”温家宝问其中一个同学：“你从哪来呀？”答：“从张家口来的，他是河北、山东省的。”他又问另外的同学：“你们呢？”“我从承德来。”还有的说自己来自秦皇岛、邢台等地，温家宝听后说：“好呀，南开大有发展了，四面八方的才子都到南开来了。你们—定要努力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时间大约过了 5 分钟，此时是晚上 10 时 10 分左右，温家宝问同学们：“晚上几点熄灯？”当听说 10 点半熄灯时，说道：“好了，我就不打搅大家了。”

离开宿舍楼后，他在校园内走走看看，值班的翟师傅陪着他，他关切地询问当年的教师身体情况，又请在场的学校工作人员转达他对校长康岫岩的问候。

此次温家宝回母校，原想在校外二纬路与四马路交口步行到学校。后经警卫人员劝阻，才乘车进入校园。

温家宝多次声称“对教师很有感情”

发布: 2010-9-16 10:17 | 发布者: 推介 |

温家宝的“发小”李溥回忆说，80 年代后期，温家宝已在中央工作多年了，有一天，温家宝的母亲杨老师若有所悟地向李溥说起当年温家宝说过的一句话：“有一天，家宝在学校听了一场报告后，回到家里，他很坚定地跟我：‘妈妈，长大以后我要为国家做大事！’”

在李溥眼中，温家宝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他虽然“官”越做越大，却不忘记从前的老师和同学。

“1968 年，已读完研究生的温家宝从北京地质学院分配到甘肃省地质局地质力学队，从事野外探矿工作，一干就是十一年。”“刚好也是这一年，我大学毕业后从天津被分配到塞外宣化部队农场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从此，我们彻底失去联系。1978 年，我从沧州地区的一所农村中学，调回天津南开中学母校任教。”

李溥有些兴奋地说道：“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 1983 年初秋的一天晚上，我正在灯下备课，忽然听见院子里有人喊我的名字‘李溥！’，我立刻推门出去，只见在皎洁的月光下站着一个既陌生而又熟悉的人，神采奕奕的，但我很快便认出了是温家宝。”

“他的突然出现，真让我喜出望外！我忙请他到我的 9 平米陋室里坐，他进屋后在我的下铺床边坐下。他那天穿了一件笔挺的蓝色中山装，非常精神。他微笑着告诉我，不久前他从甘肃省地质厅调到北京地质部做副部长了。”

“我自然为他感到高兴。他还关切地询问起我的工作情况与南开母校的情况。”

温家宝的到来，一下子使小院子热闹起来，李博的母亲、父亲、弟弟、妹妹都过来跟 温家宝说话，温家宝还像当年那样，亲切地与大家交谈。

“从南开中学毕业以后，温家宝很多年没有回到天津，那天他从北京回天津来看望父母，而看望的第一个南开校友就是我。从此我和温家宝恢复了联系，并常去温家宝北京的家中看望。”李溥不无自豪地说。

“温家宝总是念念不忘自己的恩师。每次去北京和他交谈时，他总是打听学校情况和几位老师的身体情况，并嘱咐我一定代他向陈东生老师、孙养林老师、乔慈忠老师、安同沛老师、刘铎老师、张思聪老师等问好。”

2003 年 11 月下旬，令温家宝敬重的南开中学的生物老师孙养林先生病重，住进了二中心医院。

李溥立即打电话向已出任国务院总理八个多月的温家宝报告这一情况。李溥说：“他让我代替他去医院看望孙先生，并要给孙先生送上一束鲜花儿，写上‘祝您早日康复’。我问‘落款怎么写？’他说，只写‘您的学生敬献’，提醒我

不要写他的名字。”

“我当然照办了，来到第二中心医院，带来了学生温家宝送给孙养林先生的鲜花。没过几天，11 月 26 号，孙养林先生的病情恶化，我又及时打电话报告给北京的温家宝。他听后，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如果孙先生不幸去世，你就替我买个花篮。’”

11 月 27 日，经抢救无效，德高望重，深受学生爱戴的孙养林先生与世长辞。在北仓送别孙养林先生的灵堂里，摆有不少花圈，但是一个写着：“恩师孙养林先生千古”“学生温家宝敬挽”的花圈格外引人注目。

2009 年 9 月 28 日，温家宝到天津南开区欣苑小区考察，遇到曾居住在达摩庵胡同的居民，问及“普育学校”。足见，“普育学校”在他的心目中感情很深。

2006 年 7 月，温家宝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听取教育专家的意见，他向专家们保证，“我能做到四条：第一，我有使命感，在我这一任政府要把教育摆在重要位置。第二，我对教育有热情。这种热情不仅基于我对它的认识，而且基于我一种特殊的情感。我的父亲母亲都做教师，几乎一家人都是教师。所以我说我有热情。第三，我有意志。我们问题存在很多，但是我们能够克服困难，把中国的教育一步一步地推向前进。第四，我对我们的教育家充满信任。”

2004 年 9 月 5 日，温家宝看望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退休教师霍懋征时说，“我对教师很有感情，我的爷爷、父亲、母亲都是教师。”他回忆说：“那时家里很小，夜里我睡醒了还看到他们在备课，我很敬重教师这个职业。”

新普育学校按照天津市恢复建设一批历史名校的规划，于 2007 年 11 月开工，在宜兴埠第二小学原址恢复重建，为九年一贯制学校，总建筑面积 3.92 万平方米，是一所教育教学设施先进、具有历史文化特色、校园功能臻于完善的新型学校。

新校及校史展也向宜兴埠的乡亲开放，温家在当地口碑甚好。“温瀛士一家最了不起的，是教人们读书，增长智慧，去除愚昧！”宜兴埠人、小学曾受教于温家宝父亲温刚的老新闻工作者王慰增如是说。

温家宝为何选择攻读地质专业？

发布: 2010-9-17 08:22 | 发布者: 推介 |

也许是当地理教员的职业习惯，温家宝的父亲温刚对地质学情有独锺。他搜集了很多地质书籍，其中就有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早年的许多著作。温刚曾多次对已考入南开中学的温家宝说过，中国地大物博，遍地都是宝藏，那些矿产资源需要青年人去勘探开采。

也许父亲的教诲打动了儿子，1960 年夏，南开中学毕业的温家宝果真下决心报考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建的北京地质学院（现为中国地质大学），被地质矿产一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所录取，从此与地质矿产结缘达四分之一世纪。

除了受父亲的影响，18 岁的温家宝选择学习地质，应该说还跟当时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形势密切相关。温家宝读南开中学时，正值中共建政初期，中国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官方媒体称，那时百废待兴，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对地质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重视，称地质工作为“建国之本”、“立国之纲”。

1950 年 2 月 17 日，毛泽东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接见中国留学生时，在留学生任湘的笔记本上深情地写下了“开发矿业”的题词，同时亦是对青年人的号召。

1956 年 3 月，毛泽东在听取地质部工作汇报时指出：“地质部是地下情况侦察部。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各方面要支持它，监督它。”

同年，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中指出：“必须继续加强地质工作，并且使地质普查工作和重点勘探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争取发现更多的新矿区和矿种，探明更多的矿产储量。”

1957 年 5 月 17 日，刘少奇在接见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生代表时说：“地质工作是国家很要紧的工作。要建设我们的国家，就必须要有地质工作……你们是建设新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并鼓励有志青年到祖国最需要的第一线，争做先锋尖兵。

在谈到这段历史背景时，报告文学《温家宝的平民情怀》一文描写称：第一代中央领导人重视和关心地质工作的谆谆话语都深深地印在温家宝的脑中，特别是南开校友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必须继续加强地质工作……争取发现更多的新矿区和矿种，探明更多的矿产品储量。”

也就是在周恩来讲话这一年的 5 月 4 日，他从北京给正在举行“红五月青年大联欢”的南开中学母校同学们寄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温家宝很受鼓舞，联想到总理对同学的希冀，他一下子钟情地质工作来了。他把老一代领导关心地质工作的指示全都收录自己的小笔记本上。后来在“谈理想”的命题作文中，他庄严地写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只有当个人理想与祖国需要结合在一起时，那才是青年人的正确理想，正确选择……”

这一年，中共中央同意地质部的报告扩建石油地质局，规划和管理石油普查工作，建立区域性、综合性的石油普查大队。

这一年，中国地质工作硕果累累：先是发现湖南林竹园大型白乌矿，而后探明了在甘肃省永昌特大硫化镍铜矿床，最惊人的发现就是东北大庆油田……这些都给予报考地质学院的温家宝以极大的鼓舞。

这一年，温家宝胸有成竹地走进考场，不考南开、天大、北大、清华等重点，而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他理想的也是一般人不愿报考的地质学院，据说这让他的班主任锁眉不解，但却令他教地理的父亲温刚心满意足，因为父亲

相信干地质是大有作为的。

这一年的 9 月，父亲温刚高高兴兴地把儿子温家宝亲自送到了地质学院。当温家宝戴上“北京地质学院”校徽出入校门的时候，父亲的脸上也露出由衷的笑容。事过半个世纪，当记者问起温家宝当初为什么选择地质学院时，他说“秉承父训——中国地大物博，矿产资源丰富，等待年轻一代去开发。”

应该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的温家宝，接下来五年的本科学习是不成问题的。据他的同学回忆：温家宝是一个谦逊，不满足的人。

1965 年温家宝读毕业班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本科毕业时他所得到的评语是“品学兼优”，并被批准留校攻读地质构造专业研究生。

宗海仁在《第四代》一书中评论称，从 1960 年到 1968 年，“北京地质学院的八年学习，使温家宝具备了发展成为一名地质科学家的良好条件。”

温家宝学地质，36 门功课 35 门优秀

发布: 2010-9-24 08:15 | 发布者: 推介 |

2007 年“五四”青年节当天，温家宝在中国人民大学探访青年学生时曾透露，在大学期间他喜欢读课外书，但学习成绩也十分优秀，“36 门功课，得了 35 门优秀”。

在探访中，一位同学提到温家宝总理常在谈话中引用诗文，有很深的文学造诣。温家宝笑说：“我在网上看到，沈阳有位教授曾把我几次记者招待会引用的古代诗文统计了一下，说我引用诗文 95%是教科书上没有的，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温家宝说，他引用的诗文都是自学的，引用主要是因势因时而用，“比如我们过去常讲忧患意识，为什么要有忧患意识？我读贞观之治，读唐书，它就会告诉你理由，你不知道所以乱，就不知道治。最近我在想，有些事情不

是不知道，‘人之云，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知道不是最难的，行动才是最难的，不仅行动是最难，善始善终才是最难的。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学校应让学生多读些书，多读些课外的书。”

温家宝还说，他在大学时 50%的时间读教科书，应付考试；50%的时间读课外书，36 门功课，他得了 35 门优秀。

在谈到在北京地质大学读书时，温家宝回忆说，“我把别人的睡觉时间拿来读书，晚上回宿舍，同学们都睡了，我总是读到最后熄灯。睡到半夜起床，又开始读书。那时候我没有手表，大约是早上两三点就起床了”。

温家宝接着表示，他不希望现在的大学生们都像他那样苦读书，但希望大家博览群书，多记点知识总是有用的。

温家宝还对同学们说：“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在对国情、历史、人民走过的道路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深刻的理解就不会产生深厚的爱。因此，希望同学们不仅在学校认真学习，还要走到实践中去，向实践学习，向人民学习。”

2010 年 5 月 4 日，温家宝在北京大学与学生交谈时，又谈起了在北京地质学院求学的经历。温家宝说，读大学期间，他不仅读地质方面的书，还广泛涉猎文学、历史、外语等方面的书。

温家宝还以李四光、钱学森的例子来说明文理兼通的重要性：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写下了中国的第一支小提琴曲；钱学森的画画得很好，他的音乐造诣对他的科学研究也不无裨益。温家宝还希望同学们“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

大学同窗：天生聪颖，记忆力极强

据温家宝当年同班的一位大学同学回忆，他们当时学制五年，大学二年级后又重新分班，温家宝当时学习成绩很好，后来考取研究生。

当记者询问她对温家宝的主要印象时，她机智地说：“你应该很清楚啊！”而当记者问同学对他的评价如何，她笑着说：“问问老百姓就知道了啊。”

她接着说：“我们的同学一般都不接受媒体在这方面的采访，他的生活、学习、为人等我们是很了解的。”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温家宝大学同窗都像这位女同学那样“不肯接受采访”或“谈论温家宝的生活、学习和为人”。范兴运——这位被称为“温家宝的秘密特使”的人，既是温家宝的大学同桌，又被网友们称为“温家宝的铁哥

们”——不但接受媒体访问大谈温家宝，而且还专门撰文介绍大学时代的温家宝。

我们先看看范兴运的头衔：温家宝的大学同班同学、中共《决策内参通讯》编辑部高级顾问、编审副主任、特别调研组长、全国诸葛亮研究会会长，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

此外，范兴运还是中国国内第一位公开正式出书“批邓反江”的人。他的“批邓反江”著作《剑竹丹叶》一书，荣获中国文艺金爵奖、文学最佳奖、当代文学卓越贡献奖、国际优秀作品奖，誉称“中国奇书”和“红色经典”。词条收入《中国摄影家大辞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摄影家全集》、《世界名人录》、《世界艺术家人才纪录大全》、《世界文化名人辞海》等权威辞书，事迹载入大型史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创业功臣大辞典》和《中华魂．优秀共产党员成就博览》丛书，“被誉称为：时代的先锋，民族的脊梁，中国当代杰出共产党人。”

范兴运 60 年代，在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 11603 班，曾与温家宝同班学习、同室生活五年。在范兴运眼中，学生时代的温家宝，生活朴实，衣着无华。学习刻苦，品学兼优，各门功课多是 5 分优秀（5 分制）。温家宝天生聪颖，记忆力极强。听课笔记，有条不紊，字迹端庄秀丽，非速记也能够记录老师的快速口述。

北京《风云》杂志的撰文说，温家宝和范兴运是同桌，教范兴运快速记录的方法，后来范兴运当新闻记者，受益匪浅。范兴运谈起当年与温家宝相处的往事，历历在目，如数家珍：

“在校期间，我和温家宝等同学，有幸近距离见过伟人毛泽东。大学本科毕业，我分配贵州工作，温家宝留校读研究生（后分配甘肃工作）。临别温家宝签名赠我方志敏着《可爱的中国》一书作念。这本书伴随我走上云贵高原，走遍大江南北和大半中国。中国可爱，可爱的中国！五载同窗一世情，这本书和温家宝的赠言，奠定了我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

“温家宝是一个重情义的人。温家宝亲临灾区指挥抗灾抢险，真情实意地慰问灾区群众，世人有目共睹。有些鲜为人知的‘小事’，也可以见其高风亮节和大家风范。”

“大学毕业几十年后，在北京同学聚会，温家宝有时间也一定以同学身份（不带警卫人员）到会。有一次我在京电话问道：‘家宝，同学聚会你去吗？’答：‘去！’专车先行到达。有个同学的夫人是工人，没有参加（列席）聚会，温家宝独自步行到家看望了她，谈话 40 分钟。有一次温家宝在河南某地考察，

得知一位在四川工作的同学老家就在此地，特意去看望其身为农民的父母。国务院警卫执勤的战士和我说过温家宝：‘首长很好，平易近人，上下班不让接送。我们在岗上下不来，首长还亲自给我们送茶水呢！’”

温家宝下乡劳动“肩膀都磨破了”

60 年代初，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生活极端困难。温家宝和同学们在京郊平西府村参加劳动，体验农村生活，和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给村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 多年后，同学们回京聚会，专程到平西府村回访。

2009 年 7 月，范兴运撰写一篇题为《平西府缘永垂青——原北京地质学院 11603 班老同学平西府村回访纪行》的文章，回忆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温家宝等同学到京郊农村与农民交往的往事：

2005 年 9 月 11 日，首都北京秋高气爽。通往八达岭的高速公路上，一辆旅行车在平稳地行驶，来自广西、安徽、江西、河南、山东、河北、京津等地的十几位老干部，谈笑风生忆当年，仿佛又回到了青年时代...... “十三陵水库”，毛泽东笔锋苍劲的草书石刻映入眼帘。车子向昌平区北七家镇平府村驶去。

这不是普通的观光之旅，而是来自各地原北京地质学院 11603 班的老同学毕业 40 周年特别聚会——专程去曾经劳动过的平西府村回访。

20 世纪 60 年代，高等院校参加生产劳动是学生的必修课程（每年有两次劳动）。当时适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村生活极苦。同学们身背行装，步行几十公里，到京郊平西府村和农民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社会调查，体验农村生活，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人到老年更怀

旧！难忘北京五年的校园生活，也难忘曾经劳动过的平西府村。

今日平西府，说“村”，然而已经城镇化了。市区公交车线路直达，交通十分方便。车在村头停下。“平西府村”楼牌，高耸矗立，给人们一种到了“南天门”离“天堂”不远了的特殊感觉。旧地重游，老同学们用摄像机、照相机记录着这平西府村的新貌。

来到当年第三生产队马大娘的新居，大娘不在。42 年的时差，当年 24 岁的马大姐马淑敏已经是花发老人了。马大姐热情地接待我们，特意为我们煮熟了爱吃的鲜玉米，还高兴地拿出当年的老照片给大家看，感慨万千......

当年，全班同学在平西府村参加劳动，是多家分。我拿出一张老照片请马大姐辨认。马大姐凭者记忆，带我去多家走访。几经周折来到当年三队李淑兰家。马大姐指着坐在门口的一位白发老人说：“这就是当年的三队妇女队长李淑兰！” 平西府村李淑兰同名者多，不好冒认。我拿出照片恭敬地说：“老人家您好！请认认一认这照片上的人。”李淑兰带上老花镜指着照片说：“这就是我呀！”老人抬起头神色凝重地端详着我。我和颜地说：“老人家，记不记得当年几个学生在你家住过？”老人家盯住我的脸看了许久，好象是在脑海里检索记忆。

“我叫范兴运，在嫂子家住过！”我躬腰说道。

“啊！范兴运——你怎么来了？”老人家一把握住了我的手惊喜地问道。

“陈朝胡、范兴运、温家宝、张幼勋、周万源、季茂政......”老人指着照片不假思索地说着。真想不到时隔 42 年，74 岁高龄的李淑兰老人还能够在一张小小的黑白旧照片上准确地叫出每个人的名字，记忆太深刻了！

李淑兰老人拿着照片站起来，喜泪横流，一把揽住我的头，紧紧地贴在她的脸上说道：“你们在我家住，扫地、担水，温家宝的肩膀都磨破了......”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然而此时此刻，我却禁不住两行热泪落了下来。

“嫂子！陈朝胡，还有很多同学都来了！”我说道。

“金玲，快推车来，带我去找陈朝胡他们！”老人急忙喊儿媳推车。儿媳王金玲年轻利索，骑上三轮车带着婆婆飞快地来到街上。李淑兰老人看见同学们，来不及下车就喊道：“陈朝胡——”同学们都围了过来，陈朝胡上前握住老人的手说道：“嫂子，我是陈朝胡！”

“陈朝胡，你们这些年到哪儿去了？走，都回家去，多住几天！嫂子给你们做好饭吃！温家宝在我家住过三年，爱吃嫂子做的饭。”（三年实为三个学期约几个月，这是老人的习惯说法——笔者注）老人紧紧握住陈朝胡的手久久不放和同学们照了一张合影。天若有情天不老，多么好的农村嫂子啊！这就是中国勤劳朴实农民的缩影，中华民族的脊梁！几个学期的农村生活，使我们这些学生比较深刻地认识了“农村、农业、农民”。

梦绕魂牵几十年，终生难忘平西府这段农村情缘。诗曰：

半世风雨识人生，白发无悔对铜镜。

诸事沧桑云烟过，平西府缘永垂青。

值得注意的是，范兴运在文章中特意强调了“北京地质学院 11603 班的老同学毕业 40 周年特别聚会”，作为同班老同学，温家宝参加了这个在北京举行的“特别聚会”，但他没有随同“来自广西、安徽、江西、河南、山东、河北、京津等地的十几位老干部”一起回到平西府村看望仍记着他的“农村嫂子”。

温家宝在学术上深受李四光的影响

发布: 2010-9-26 09:21 | 发布者: 推介 |

1965 年 5 月 18 日，温家宝作为北京地质学院应届毕业生代表之一，受到时任地质部长李四光的接见，李四光勉励温家宝等人要树立雄心壮志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为找出更多的矿藏和发展地质科学做出贡献。

从学术上看，温家宝当年所遵循的地质力学理论是李四光所创，李四光并用这一理论分析中国东部地质结构特点，为中国在大庆等地找到石油作出了贡献。

《温家宝传》的作者高新认为，温家宝后来在地质工作实践中作出的成果，是师从李四光的地质学理论。他曾有数篇学术论文在中国地质学界权威杂志《中国地质》上发表。如果他不是在 43 岁那年被调进中南海，最终很可能会成为李四光的学术传人，甚至成为中国地质界的泰斗级专家。

如果说温家宝少年时代考入的南开中学堪称中国第一，温家宝中学时代进入的北京地质学院也是该领域里的中国第一，那么大名鼎鼎的李四光无疑是地质学家中的中国第一。而后来温家宝在地质工作实践中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师从李四光的地质学理论。

出生于 1889 年的李四光，15 岁留学日本，16 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为创始会员之一。1913 年进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地质学，1918 年获理学硕士学位，1920 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培养了一大批地质人才。1928 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

1931 年获伯明翰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34 年赴英国讲学，主持伦敦、剑桥等八所大学举行的“中国地质学”讲座。1947 年获挪威奥斯陆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0 年，李四光自英国回国，先后任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全国地层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和古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原子能委员会副主任、地质

部地质力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地震领导小组组长、中国科学院地震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上世纪 50 年代中，还任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5 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8 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1969 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官方评论称，李四光毕生致力于地球科学事业。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注重实践，悉心钻研，勇于创新，写下了数百万言 140 余篇（部）科学论著，为发展地球科学和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环境治理等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并在多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创建的地质力学，提出构造体系新概念，为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地质工作开辟了新途径；他关于古生物蜓科化石分类标准与鉴定方法，一直沿用至今，为微体古生物研究开拓了新道路；他建立的中国第四纪冰川学，为第四纪地质研究，特别是地层划分、气候演变、环境治理和资源勘查等开拓了新思路。

为解决经济建设中能源紧缺问题，李四光运用自己创建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方法，组织指导石油地质工作，在分析中国地质构造特点的基础上，指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具有广阔的找油远景，上世纪 50 年代初提出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的"摸底"工作值得进行，为大庆、胜利、大港等中国东部一系列大油田的勘探与发现，为摘掉中国"贫油"的帽子和石油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李四光指导铀等放射性矿产勘查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发展中国核工业和"两弹一星"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四光还有力推进了中国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邢台发生地震后，他提出进行地应力测量和现今构造应力场分析，研究地震发生、发展的规律，为预测和预报地震指明了方向；他还把这些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区域地壳稳定性研究，在地壳活动带中寻找建设"安全岛"，以及各种灾害的预测与防治等。

1971 年 4 月 29 日，李四光逝世于北京。

温家宝在甘肃地质力学队的同事日后写文章回忆说：

"当时，在中国大陆的地质学界流行如下七种地质力学观点：一，黄汲清学说（苏联传统派）；二，张文佑（李四光弟子，留美学人）；三，板块学说（70 年代在欧美兴起的新学说）；四，李国达（时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地质矿物研究所研究员）的地洼学说；五，马杏垣（时任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原武汉地质学院教授，李四光弟子）的重力学说；六，张伯声（时任西北大学地质系教授）的波状镶嵌学说；七，李四光的地质力学。而温家宝在学术上则主要师从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观点。他曾有数篇学术论文在中国地质学最权

威的杂志《中国地质》上发表。”

由此可见，当年的温家宝如果不是改行从事党务工作，是很可能成为地质学术领域顶尖级专家人才的。

温家宝的硕士导师马杏垣劝学生停止绝食

1965 年，温家宝留校继续攻读构造地质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时，其导师是构造地质学家马杏垣教授。虽然马杏垣的名气没有在构造地质界独创自己体系的李四光、黄汲清、张文佑、张伯声、陈国达的大，但算得上是一个响铛铛的人物，而且年龄比这些大家小十来岁。

马杏垣在地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了大半生，可谓桃李满天下。他亲手培养的学生中，有的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教授，乃至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成员。1999 年在庆贺马杏垣八十寿辰时，温家宝亲笔写下：“贺马杏垣老师八十寿辰：老骥驰骋途千里，红杏光照春满园”。

1919 年 5 月 25 日， 马杏垣出生在吉林长春市，父亲经商，祖籍河北乐亭县。从少年时代起，他的求学道路，就像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一样，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1931 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刚刚小学毕业的少年马杏垣，就不得不流亡关内，先后就读于河北昌黎汇文中学和天津南开中学。

在 1935 年“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中，马杏垣参加南下请愿团，与大家一起卧轨拦截火车，后辗转抵南京，抗议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不当亡国奴，他辍学随一批革命青年和进步人士离开天津，途经烟台，辗转到了重庆。1938 年 5 月他加入了当时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地下党组织，并在八路军办事处接受培训。

1938 年马杏垣高中毕业，考取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从此走上了一生从事地质科学的道路。大学毕业后，他被留在西南联大地学系当助教。1945 年抗战胜利后，他考取了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出国留学，并于 1946 年 1 月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地质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于当代著名的地质学家之一Arthur Holmes（阿瑟?霍姆斯）教授。

1948 年 8 月马杏垣以优异的成绩和高水平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伦敦召开的第 18 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随后，告别英国回国，应聘到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任副教授。

从 1948 年底起的近 30 年里马杏垣一直从事地质教育，他先后在北京大

学任副教授、教授，北京地质学院教授、教研室主任、副教务长和副院长等职。中共建政后，作为“开路先锋”的地质矿产工作，急需大量人才，因而创办地质学院成为地质部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这时的马杏垣教授，团结自己的师长和学友，带领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和唐山铁道学院在校学生，投入北京地质学院的筹建工作。他组织年轻教员和学生到全国各地去采集教学标本；亲自讲授普通地质、构造地质课程，并到周口店建立教学实习基地。

随着北京地质学院的日益发展，他肩上的担子也越挑越重。为培育新一代的构造地质学人才而辛勤地耕耘着，他亲自开设《中国区域大地构造》课，主编了《构造地质学基础教程》。重视野外是地质科学的第一实验室，野外实习基地是培养地质专业人才的第一课堂。

马杏垣经常教导学生们说：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构造地质学家，首先必须掌握辩证唯物的构造观和方法论，这样才能驾驭不同尺度和不同层次的构造现象，才能在研究中国地质时防止出现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现象；其次还必须踏踏实实地在一些关键地区苦干几年、十几年，只有通过艰苦探索形成独到见解的基础上，才能全面铺开，多方面吸取营养，丰富自己，这就是他历来坚持的“一地起家”培养地质人才的道路。

马杏垣不仅创立了一系列的优秀教学思想，而且身体力行在北京西山建设天然实验室。他亲自组织过多次不同比例尺，以不同地质内容为重点的地质填图和调查，支持和鼓励他身边的一些青年教员，长期坚持西山的研究工作。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构造地质研究人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马杏垣受到严厉的冲击和批判，北京地质学院被迁出京城，10 年没有招生。粉碎“四人帮”后，他首先行动，面对原校已毁、新校未成的严重局面，忧心如焚。顶着“反迁校”的帽子和上边的种种压力，以他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代表广大教职员工，联合有关老领导、老专家，亲自上书，向中央领导多次反映意见，终于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支持，利用原北京地质学院校舍、设备和在京师资创办了地质学院研究生部。

虽然 1978 年之后，马杏垣去地震战线继续他对地球科学研究的追求，不过他对学校的关心和对他的学生们的指导却始终没有间断过。学校改名为“中国地质大学”后，又再聘他为兼职教授，仍然继续担任地质构造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官方评价称，马杏垣辛勤耕耘了大半生，为培养新一代地质学家作出奉献，用注重实践的优良学风，影响和教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和研究生。

他亲手培养的研究生有的现在已是研究所所长、教授、地学部门的高级研究人员，乃至中央领导成员。20 年来他培养了十余名博士，数十名硕士。从研究生的选题，野外工作，论据的获取，结果的得出、验证及论文的结构他都要一一过目，亲自指导，从不当挂名的空头导师。花甲之年他还带领弟子们去过燕山、阴山、秦岭、阿尔金山，考察甘孜地震、海原地震、鲜水河断裂带、红河断裂带、汾渭地堑、柴达木盆地、雁北高原、内蒙古高原及东南沿海地震带。

由于长期的奔波和繁重的工作，他的健康状况日益下降，严重的甲状腺机能亢进，导致了心房纤颤，使他数度住院。

2001 年 1 月 22 日，马杏垣因病去世，享年 82 岁。

网上一篇文章曾这样谈到马杏垣在八九学潮中的表现的：1989 年北京闹学潮，绝大多数人大常委、知名人物无一不是呼吁政府尽早和学生对话。当时只有五个政协委员则是联名呼吁学生尽快结束绝食，马杏垣便是其中的一位，当时大家觉得怪怪的。

接到导师来信，温家宝马上作指示

比校友温家宝大两岁的孟华（后改名叫位梦华）生于 1940 年，但考上北京地质学院却比温家宝晚了两年。两人都是马杏垣教授的学生。

位梦华 1962 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攻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1967 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从事地震成因及地震预报的探索与研究。1978 年归入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1981 年，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进修，并于 1982 年 10 月去南极，从此与两极结下不解之缘。

在恩师去世后，位梦华撰写的纪念马杏垣的文章，其中间接提到马老与得意弟子温家宝的关系：

当我考入原北京地质学院时，马杏垣先生是副院长。但他教的是地质构造，而我学的是地球物理勘探，所以无缘听他的课，只听说他是中国地质界的权威，因而肃然起敬。然而，他也正因为“权威”而倒了楣，“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关进了牛棚。马先生是做学问的，温文尔雅，从来没有遭受过那样的摧残与凌辱，所以想不通，便躲到湖边去自杀。结果被人发现，方才免于一死。

史无前例的年代过去之后，马杏垣先生调到国家地震局任副局长，我在

国家地震局地质所从事地震成因和地震预报的研究。有一次在黄山开会，地质界几位前辈都出席。劫难刚过，春天将至，老先生们都焕发了青春。就在那次会议上，马先生谈到了重力构造问题。在马先生的指导下，我们组成了一个小组，开始编写《重力作用与构造运动》一书，前后用了十几年，到 1989 年才终于出版。与此同时，马杏垣先生还作为主编，主持编纂了《中国岩石圈动力学地图集》，获国家地震局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作为一个地质学家，马杏垣先生对于构造运动的力源一直非常关注。他很早就提出了重力构造的概念，并且身体力行，自 60 年代起，就在河南嵩山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识别出了一系列的重力构造。

后来，马先生又调到国家地震局地质所任所长。有人觉得他的官愈做愈小，他却一笑置之说："我本来就不是做官的。"但他很快就发现，官其实愈小愈难当，吃喝拉撒睡都要管，每天杂事缠身，访客不断，实在是苦不堪言，最后只好退居二线。

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兴趣转到了南极和北极，有人说是见异思迁，不务正业，马先生却深表理解，总是给予关怀和鼓励。1995 年，当我为北极考察到处奔波，四处碰壁时，马先生却挺身而出，给了我以决定性的支持。他说："我给家宝同志写封信，为个人的事情我决不会去打扰他，但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的利益，相信他会支持的。"果然，温家宝同志接到他的信后，马上作了批示。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计划终于得以实施，并为我国加入国际北极科学考察委员会创造了条件。后来这一事件被近 400 名院士投票评为 1995 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之一，马先生见了报纸非常高兴。

光阴催人老，马杏垣先生很快就要八十了，国家地震局和中国地质大学等单位筹划给他庆祝八十大寿。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了他，便预祝他生日快乐。马先生笑了笑说："我不赞成祝寿，一祝就容易死。"当时只当是玩笑，谁知却不幸言中，不久他就病了，是肺气肿。

我暗暗祈祷，希望他能康复。就在匆匆之中，跨入了新的世纪，马先生却每况愈下，在蛇年到来之前，终于撒手而去。我站在他的遗像前，彼此默默对视，藏在心中的话，只有留待来世......

位梦华在《在北极，我将名字改成"位梦华"》的文章中，再次提到了校友温家宝对其北极考察的支持：

1991 年，我独闯北极，进入阿拉斯加爱斯基摩人聚居区时发现，北极对中国气候和环境的影响，比南极要多。在战略上，北极的石油和天然气对中国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当时，北极的资源已经被其它国家开发，我国对北极进行科学研究迫在眉睫。

于是回国后，我便奔走呼号，呼吁和推动中国尽快开展北极考察。1995 年，根据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的批示，经原国家科委批准，由中国科协主持、中国科学院组织的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队，进入了北冰洋中心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并于 5 月 6 日到达了北极点，进行了两极对比与全球变化的研究，极地环境、物理海洋、极地遥感、两极冰雪的对比与研究和极地生物与生态学的科学考察等。

温家宝对北京地质学院的感情，可以从他给恩师杨遵仪院士百岁华诞庆祝会的贺信看出。杨遵仪 1908 年 10 月生于广东揭阳，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52 年参与创办北京地质学院并长期任教，是中国古生物地层学教育的奠基人、古生物地层事业的开创者之一。

2007 年 10 月，中国地质大学按照中国在寿星 99 岁时庆祝百岁诞辰的传统举行庆祝会，温家宝向恩师发上贺信说，“47 年前您是我的老师，今天您仍是我的老师。我将永远以先生为榜样，像先生那样做人、做事、做学问。”

温家宝还对杨遵仪为中国地质科研和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先生是杰出的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从事地质学，特别是地层学和古生物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七十余载。科研建树丰硕，桃李满天下，为我国地质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先生博学笃志，格物明德，不畏艰难，勇攀高峰，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科学和教育事业。先生的渊博学识和创造精神受到地质界的广泛赞同；先生的高尚道德和优秀质量成为科技界的楷模......”

1952 年，杨遵仪参与创建了北京地质学院。先后担任地质学院的副总务长、专修科主任，水文系、石油系、普查系和地质系主任等职。曾任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地质学会地层古生物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地质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地科联地层委员会冈瓦讷地质研讨会会员，二迭纪、三迭纪地层分会及P/T界线工作组等单位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古生物学报》(前十卷)主编，《地质学报》副主编等职务。

1956 年，杨遵仪主导编着了中国第一本高等学校古生物学教材。1960 年，他和同事们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地层古生物专业”，1962 年，在国内首次

开设了“生物地层学”课程。杨遵仪培养了大批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其中有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殷洪福院士，中国探月计划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等。

被称为中国地质科学泰斗、中国地质学奠基人的杨遵仪，在百岁华诞庆祝会上，面对台下师生，依然思路清晰、谦虚礼敬。他说：“衷心感谢大家来为我庆贺生日，同时这也让我感到很不安，因为过去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当台下学生对此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时，杨遵仪竟颤颤地欲起身向师生们鞠躬致谢，令台下师生为之动容。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起师生们“桃李满天下”的称颂，杨遵仪连连摆手。他谦虚地说，“其实也没什么值得提的，我只是和学生们一起讨论问题的时间多些”，“是他们把我说得太好了”。

“我为学校走出了重要的国家领导人和数十名院士，为身在地大而感到自豪。”这是恩师杨遵仪在谈到学生温家宝时所说的话。

2009 年 9 月 17 日，杨遵仪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 101 岁。据报导，病重期间和逝世后，温家宝、李克强、刘延东、张德江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文革中的“逍遥派”温家宝慷慨解囊救同学

发布: 2010-9-29 07:27 | 发布者: 推介 |

1965 年以全优成绩在北京地质学院本科毕业后，温家宝便继续留在该院的地质构造专业读研究生。“文革”开始后，在“停课闹革命”的口号下，全国的大学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全部停止，温家宝当然也不能幸免。因此，温家宝读研究生实际上仅读完了一个学年。

中国地质大学校史“十年浩劫，学校蒙难”有如下记载：

1966 年 5 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由此在全国爆发了“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酿成了十年内乱。

北京地质学院也在劫难逃，教育工作遭到严重的破坏，成为“重灾区”，元气大伤。在苦度劫难的十年中，北京地质学院既有令人痛定思痛的严重教训，也有在逆境中愤起抗争的苦斗，含辛茹苦，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艰辛。

1966 年 6 月 1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6 月 2 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发表并刊载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从此，北京大学率先开展了“文化大革命”。

由于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夺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领导权，到处煽动师生“造反”，进行全国性大串连，冲击党政机关、军事部门、企事业单位，挑动资产阶级派性，“踢开党委闹革命”，造成“全面内战”，“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混乱局面。学校的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陷入全面瘫痪状态。

十年浩劫，学校蒙难，1966-1970 年五年间，学校停止招生。

1968 年 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单位发出《关于派工宣队进驻学校的通知》。8 月 25 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接管了学校的全部工作，进行大批判、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等所谓的“斗、批、改”，知识分子受到严重摧残，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从 1969 年 11 月 15 日起，千余名教职工举家带口、扶老携幼，被送往江西省峡江县仁和公社“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高等教育事业遭受一场浩劫。1970 年，北京市原有的 46 所高校中，有 13 所被迫外迁，其中以地矿、农林院校为主，我校为受害学校之一，使学校更加雪上加霜。自此，学校进入了动荡、颠沛流离状态。在仓促的搬迁中，仪器、图书数据、标本、教学文档等损失惨重，教职员工失去了稳定的安身立命之所，美丽的校园被蚕食、侵占。

不过，出身书香门第的温家宝并不愿意介入批斗师长的造反中，成为文革中的“逍遥派”。

曾在南开中学与温家宝同窗六年的老同学房世祚，曾对香港《大公报》记者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初期，自己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受迫害，无奈之下，身无分文的他顶着被刷了一头绿油漆的头发，步行一百多公里到北京地质学院找到了正在读研究生的温家宝。

高新在《温家宝传》中也提到，在那场运动的初期，如此形象是典型“牛鬼蛇神”，一般人自然唯恐避之不及，但温家宝不但热情地将他留宿，给他出主意，还慷慨解囊，给了他 20 元钱以解燃眉之急。在那个公共汽车车票只有三五分钱的年代，20 元实在是已经可以救人一命了。

《大公报》记者访问到的温家宝南开另一位六年同窗，也是他们班同学聚会的联络人周强说："我可以总结一下我们班同学的特点，我们有从事教育工作、法律工作、技术工作的，有当领导干部的，虽然工作分工不同，但都学有所成。大概是囿于时代的原因，我班同学中没有一个'大款'。'文革'期间我们班的同学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但没有一个参加'造反派'，我们不会随风赶时髦，只会按照南开教给我们的信念准则踏踏实实地做事做人。"

温家宝在北京地质学院的一位同年不同专业的同学曾对《温家宝传》作者高新说："这个人（温家宝）学习成绩优秀，但在同学里人缘很好。没有参加造反派是肯定的。但当时学院里的红卫兵组织虽然派别林立，但哪一派人也不会把斗争矛头对准温家宝。温家宝被分配到甘肃不是什么'发配''充军'，因为我们地质专业决定即使读研究生，实习地点也往往是自然和生活条件十分根基的地方。依温家宝的志向，如果没有'文革'，即使学院希望他在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他可能也会选择到基层地质队去工作。"

温家宝毕业时写了几份血书要求去西藏

到了 1968 年 2 月，"文革"红色海洋席卷中国时，偌大的北京似乎放不下平静的书桌。在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攻读研究生的温家宝被迫放弃学业，主动要求前往"边塞"甘肃.。

2009 年 2 月 15 日下午，正在天津考察的温家宝来到南开大学，谈论了大学生们普遍关心的就业问题，并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同学们到基层工作。

温家宝说："我大学是学地质的，毕业后就决心到西藏去，我当时就有一种理想，认为那地方山多，适合我这个专业。我甚至写了几份血书。"幽默的话语让在场学生不由笑了起来。

温家宝接着说："研究生毕业以后，我还有留在学校的机会，但是我还是到西北去了。我认为西北是我应该工作的地方。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也是我一生成长非常宝贵的一段时间，懂得什么叫艰难，人如何克服困难，怎么去生

活。”

“同学们，基层是大有可为的！我希望同学们把到基层工作同自己的事业发展联系在一起。除了有政府政策之外，还应该有正确的择业观念。但是不管怎么样，同学们的就业，政府是记在心里的！因为你们必定是祖国的未来。你们有信心，你们坚强了，你们有能力，中国就有希望！”

在介绍 1968 年温家宝面临毕业选择时，报告文学《温家宝的平民情结》有着一段很煽情的描写，却与温家宝曾写过几封血书的“情节”遥相呼应：

时间就到了 1968 年，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时，作为 26 岁的热血青年的温家宝，毅然决然地报了名，尽早实现他的“勘探队员”之梦。当时不少人已经认识了这是“文革发配”，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只要说出一条原因——有病或是父母无人照顾，便可以留在大城市。温家宝没想那么多。因为大学时的志愿已定，无须犹豫，他要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祖国大地——“头戴铝盔走天涯”。

校方最后的结果公布，他被分配到西北，去了甘肃酒泉地质队当队员。无独有偶，那时的胡锦涛，也于同年自清华大学的水利系，分配到甘肃省刘家峡水电站当技术员。

温家宝选择了西北，同时西北也选择了温家宝。从此他与祁连山相依相伴。也许是美丽的祁连山水动了感情，一位来自祁连山下，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的姑娘，悄悄地走近了温家宝的身旁，又是洗衣又是做饭......不久两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结成了“地质家庭”。那个俊姑娘就是张培莉，从事岩矿鉴定。

据说，初到力学队，温家宝因写得一手好字，被指派到批斗大会做抄写工作。有一次，“革命派”的批斗由文斗变成武斗，对被批斗者大打出手，温家宝看不下去，加以阻拦，因而被指同情“反革命”，被“发配”到偏僻的农场去干苦力，或牵骆驼、牦牛去野外作业，一干便干了一年。

此后，温家宝重返力学队当技术员，长年累月在祁连山一带勘探矿产，在荒无人烟的野外攀山涉水、风餐露宿，在大西北抵耐风沙和寂寞，在贫乏的物资中度过了 11 年，避开了无数政治风暴，也对中国贫困的现状有了深刻的体验。

中国地质大学的知名校友

2002 年 10 月，在前身为北京地质学院的中国地质大学校庆 50 周年前夕，温家宝回到母校看望师生，给地大提出了“品德优良，基础厚实，知识广博，专业精深”的人才培养方针和“建设地球科学领域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

在地大 50 多年的校史中，在校友的眼中，温家宝无疑是该校最知名校友。地大不但培养出 20 多名两院院士，也培养出一批像温家宝一样从政的毕业生，如前辽宁省委书记张文岳，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市委副书记王安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原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现任安徽省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海南省委常委、海南省常务副省长方晓宇等。

中国地质大学校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建校 50 年来，毕业生中有 20 多人入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在单科性院校中这样的成绩并不多见。先后当选两院院士的毕业生是：

刘宝珺（1931 年 9 月 13 日－），天津人，1953 届，1991 年当选院士，沉积学家。

马宗晋（1933 年 1 月 4 日－），吉林长春人，1955 届，1991 年当选院士，构造、**地震**地质学家及减灾专家。

孙大中（1932 年 6 月 20 日－1997 年 5 月 1 日），山东威海人，1955 届，1991 年当　选院士，寒武纪地质学家。

欧阳自远（1935 年 10 月 9 日－），江西吉安人，1956 届，1991 年当选院士，地球化学家天体化学家。

傅家谟（1933 年 7 月 14 日－），上海人，1956 届，1991 年当选院士，有机地球化学家及沉积学家。

张弥曼（1936 年 4 月 17 日－），江苏南京人，1991 年当选院士，古生物地层学家及古脊椎动物学家。

叶大年（1939 年 7 月 21 日－），广东鹤山人（生于香港），1962 届 1991 年当选院士，矿物学家。

李廷栋（1930 年 10 月 7 日－），河北栾城人，1953 届，1993 年当选院士，区域地质学家。

殷鸿福（1935 年 3 月 15 日－），浙江舟山人，1956 届，1993 年当选院士，地质古生物学家。

程国栋（1943 年 7 月 11 日－），上海人，1965 届，1993 年当选院士，冰川冻土学家。

秦蕴珊（1933 年 6 月 1 日－），辽宁沈阳人，1956 届，1995 年当选院士，海洋地质学家。

汪集旸（1935 年 10 月 11 日－），江苏吴江人，1956 届，1995 年

当选院士，地热学家。

汤中立（1934 年 10 月 30 日一），安徽安庆人，1956 届，1995 年当选院士，矿产勘察专家及矿床地质学家。

马瑾（1934 年 11 月 27 日一），江苏如皋人，1956 届，1997 年当选院士，构造地质学家。

戎嘉余（1941 年 12 月 7 日一），上海人，1962 届，1997 年当选院士，地层古生物学家。

胡见义（1934 年 3 月 25 日一），北京人，1997 年当选院士，石油地质学家。

金翔龙（1934 年 11 月 29 日一），江苏南京人，1956 届，1997 年当选院士，海洋地质、海洋地球物理学家。

卢耀如（1931 年 5 月 22 日一），福建福州人，1953 届，1997 年当选院士，水文地质学家及工程地质学家。

郑绵平（1934 年 11 月 7 日一），福建漳州人，1997 年当选院士，矿床地质学家及盐湖学家。

张彭熹（1931 年 2 月 5 日一），天津人，1956 届，1997 年当选院士，盐湖地球化学家。

张本仁（1929 年 5 月 28 日一），安徽怀远人，1956 届，1999 年当选院士，地球化学家。

钟大赉（1933 年 8 月 11 日一），山东青岛人，1954 届，2001 年当选院士，构造地质学家。

陈旭（1936 年一），江苏南京人，1959 届，2003 年当选院士，古生物与地层学家。

金振民（1941 年 9 月一），浙江温州人，1965 届，2005 年当选院士，构造地质学家。

杨文采（1942 年 10 月一），广东大埔人，1964 届，2005 年当选院士，地球物理学家。

马永生（1961 年一），内蒙古人，1984 届，2009 年当选院士，地质勘探学家。

莫宣学（1938 年 12 月一），广西融水人，1960 届，2009 年当选院士，岩石学家。

其它知名校友有：

温家宝：1968 届硕士毕业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总理。

赵鹏大：中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国际高等学校科学院院士，中国原中国地质大学校长。

张宏仁：1954 届毕业生，现任国际地质科学联盟主席。

欧阳自远：1956 届毕业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月球探测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研究员。

李久林：国家体育场“鸟巢”工程的总设计师。

张文岳：1967 届毕业生，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原中共辽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书记。现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寿嘉华：1965 届毕业生，原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兼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党组书记。

王安顺：1983 届毕业生，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市委副书记、市委政

法委书记。

孙金龙：1990 届毕业生，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原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现任安徽省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

方晓宇：1976 届毕业生，现任海南省委常委、海南省常务副省长。

黄诒纯：1968 届毕业生，现任甘肃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蒋承菘：1962 届毕业生，1998 年至 2001 年任地质矿产部副部长。

严宏谟：1957 年毕业生，1985 年 6 月至 1995 年 9 月任国家海洋局局长、党组书记。现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

张一伟：1956 届毕业生，原中国石油大学校长。

武能乐：1959 届校友、越南留学生，原河内矿业地质大学副校长

王富洲：1958 届毕业生，原国家登山队党委书记、现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李致新：国家级运动健将、中国登山协会常务副主席，1985 届毕业生，1988 年参加中、日、尼双跨珠穆朗玛峰并获成功。李志新是唯一登顶的汉族队员，也是中国地质大学第二位登上世界高峰的运动员，是中国征服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两位登山家之一。

王勇峰：国际级运动健将、中国登山队队长，1984 届毕业生，1993 年参加海峡两岸珠峰队登顶成功。他和李致新为中国目前仅有的两为征服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登山家。

佟璐：1985 届毕业生，1990 年登上了海拔 8012 米的西夏邦玛峰，成为中国第一位登上 8000 米以上独立山峰的汉族女性。

次洛：1999 届毕业生，1998 年 5 月登顶珠穆朗玛峰，成为中国第一位登顶珠峰在校大学生。

高崚：羽毛球运动员，2004 届毕业生，2000 年悉尼奥运会羽毛球混双金牌、女双铜牌，2004 年雅典奥运会羽毛球混双金牌、女双银牌。

袁复栋：2005 级大学生，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队员，参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珠峰火炬传递，并成功登顶珠峰，被选为 2008 年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

高山：1989 年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获博士学位，地球化学家，2009 年 11 月当 选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士。

康学增：中国地质大学产业经济学硕士，振华重工总裁。

曾玉康：教授级高级经济师，毕业于湖北地质学院石油地质专业，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郭清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环境学院副教授，2010 年被国际地球化学协会（IAGC）授予埃贝尔蒙奖，以表彰其在高温水热系统的水文地球化学研究领域取得突出成绩，是亚洲第一位获得该奖的学者。

温家宝告别父母，与祁连山相伴

在黄沙漫漫的大西北，温家宝从甘肃地质局酒泉地质力学队的一名普通技术员，一直擢升到甘肃地质局副局长。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毕业于兰州大学地理系的兰州姑娘张培莉。20 世纪 70 年代初，两人同结百年之好。

2003 年，温家宝当选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向与会者特别提到自己当年在艰苦地区的地质生涯。他说："我从大学学地质，后又从事地质工作，整整 25 年。这期间大部分是在非常艰苦和恶劣的条件中度过的。我深知人生的艰辛，也知道国家建设的艰难。但我也树立一种信心：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不畏艰险，勇于攀登，一定能达到光辉的顶点。"

"自已一生中生活和居住过许多地方，但就是对酒泉那个地方的生活印象特别深，回到那里，对每一处自已熟悉的地方都想再看一看，住一住。"

1968 年 7 月，在如愿以偿被"批准"去"边塞"后，温家宝回到天津向父母

辞行。当他告诉父母双亲，自己马上就要去报到的单位是甘肃省地质局地质力学队，该队设在酒泉地区时，一直当中学地理教师的父亲立刻走到墙上贴着的中国地图前，指着甘肃与新疆交界处，背诵了一首古诗："酒泉张掖近天山，大漠风云指顾间。莫道行边人万里，最西还有玉门关。"

《温家宝传》对当时的情形有精彩描述：温家宝则踌躇满志地告诉父母，他从小就诵读过"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著名唐人绝句，现在更知道那首著名唐诗"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中的轮台，就是自己将要去工作的地方。但具有最艰苦的环境，最恶劣的气候的地区，往往就是最需要地质工作者的地区。

就在儿子发出这壮志豪情的同时，收音机里播放出来的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瑞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找起背包就出发......"的"革命战歌"。

温家宝的母亲杨秀兰强作笑颜地把唐朝大诗人王维的那首著名的《渭城曲》中"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改了一个字，变成"劝儿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并叮嘱他们这位"温家的宝贝"珍重、珍重、再珍重。

那么，温家宝当初为何主动要求去甘肃工作呢？《温家宝在祁连山的日子》一文解释说：

他之所以要求去那里工作并非偶然，当他还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甘肃酒泉地区发现了被认为具有长期开采价值的铁矿床。来自全国各地的五万建设大军随后云集酒泉，开始了酒泉钢铁厂的建设。当时媒体关于这一事件的报导令立志地质事业的温家宝兴奋不已，并由此萌生将来去那里找矿的念头。

1968 年秋天，只读了一个学年研究生的温家宝生平第一次来到了甘肃，成为酒泉地质力学队的一员，从此与祁连山相伴，开始了长达 14 载的边塞生活。

在祁连山艰苦而又充实的生活是温家宝的人生历程中一笔宝贵财富，也成为他人生道路上一段永恒而难忘的记忆。

34 年后的 2002 年 9 月 1 日，已经被内定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接班人的温家宝赶在十六大召开之前，专程回到甘肃地矿局第四地质矿产勘查院，他事先要求该单位把自己当年曾经一起共事的老同志尽可能全部请到。

据甘肃第四勘查院的内部通讯记载，与老同事们见面时，温家宝一一询问他们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及工资收入，同他们一起回忆在极其艰

苦的地区一起工作和生活的日日夜夜。

温家宝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后，国土资源部也归他分管。他到地方视察时，地质工作是他关心的主要内容之一。

温家宝初到地质力学队，从背石头干起

前文曾提到，据说温家宝初到力学队，因写得一手好字，被指派到批斗大会做抄写工作。有一次，“革命派”的批斗由文斗变成武斗，对被批斗者大打出手，温家宝看不下去，加以阻拦，因而被指同情“反革命”，被“发配”到偏僻的农场去干苦力，一干便干了一年。

虽然此说法并未得到曾与温家宝一起工作过的同事的证实，但了解温家宝这段经历的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透露温家宝初到地质力学队时，的确曾在农村劳动锻炼了一段时间。不过，此次锻炼并不是因为他同情“反革命”而被“发配”到农村的，而是当时的相关规定——地质队的新人首先要接受劳动锻炼。

就这样，1968 年 8 月，温家宝到酒泉地质力学队报到后不久，便同几位新同事一起被派到酒泉市肃州区丰乐乡二坝村接受劳动锻炼。

现年 70 岁的杨虎学是二坝村农民，60 年代末曾担任过二坝村大队的革委会副主任。他对当年温家宝劳动锻炼的情景记忆犹新。

杨虎学说，记得那是 1968 年 9 月。温家宝和另外四个男同志及两个女同志来到二坝大队劳动锻炼。那时候运输工具少，运肥料主要依靠大车。杨虎学经常赶皮车，温家宝和其它几名地调队的年轻大学生就给皮车装肥料。对温家宝，杨虎学最突出的印象是：话不多，但干活很踏实。后来丰乐公社在台子沟修水渠，社员们给渠装背石头，温家宝和社员一样背，并不比当地劳动力背的少。

与温家宝再次见面是 1970 年 7 月，那时候，杨虎学在镜铁山二把哈垃领着社员修备战路。有一天，温家宝和地调队一位叫小米的同事拉着骆驼，路过二把哈垃，天快黑了，走的十分疲倦。杨虎学走出帐篷遇见温家宝和小米时，见两人嘴唇干裂。在这海拔 3000 多米的地方，见到丰乐公社认识的熟人，温家宝显得很高兴。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惦记着工作的温家宝和小米就出发了。

谈起这件事，杨虎学显得很激动，温家宝以及地调队同事们的吃苦精神令他今生难忘。

陈志丑是酒泉市肃州区丰乐乡三坝村五组农民，70 年代曾在酒泉火车站当过几年装卸工。这期间，他有幸认识了温家宝。对温家宝的印象，陈志丑概括了四个字：朴素，随和。陈志丑回忆说，当时他在火车站行李房干活。温家宝经常到火车站行李房，主要领取从外地调运来的地质、水文器材，每一次去温家宝都和和气气，跟装卸工人聊上几句，器材一到就亲自动手往车上装，时间久了也跟工人打成一片，与大家开玩笑、劳动。

在酒泉市丰乐乡二坝村三组的杨恒学家中，温家宝曾住过一段时间。时间虽然短暂，但温家宝的好学，给杨恒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杨恒学回忆说，温家宝是在 1968 年 9 月劳动锻炼时住到他家的。他们一起有好几个人，女同志跟三队的两位老大娘住在杨恒学家的伙房里，温家宝和另外几位男同志住在杨恒学家的北屋里。

刚来时正赶上生产队打胡麻，温家宝虽然不是太会，但还是很勤快地同社员们一起摊场，并学着扬场。打完胡麻，社员们都上祁连山一个叫台子沟的地方修水库，温家宝也跟着去了，同大伙儿一起挖渠沟，背石头。

杨恒学说，当时劳动强度特别大，温家宝他们在社员家里吃派饭。吃的最多的是苞谷面和小米饭。尽管生活条件艰苦，可温家宝一闲下来就裹着老羊皮袄看书，看完一本又一本，温家宝的生活也很有规律，每天总是早早起床，把院落打扫干净，再听收音机了解外面的世界。

如今，温家宝当年住过的房屋都还在，虽然历经几十年，房屋已破旧不堪，但杨恒学一只没拆，他说："看到这间房屋，当年那个好学的'温技术员'像又站在了我面前了。"

温家宝主动要求去甘肃是为追求爱情？

说起温家宝初到地质力学队就和几位新同事到农村接受劳动锻炼，其中还包括几位女生，便让人想起在中国地质界有一段关于温家宝的传闻：温当初主动要求去甘肃，是为了追求同校的一个女生......

旅居波士顿的"甲城老武"曾在 2008 年 5 月 5 日在网上发表一篇文章，说的是"听同事讲温家宝"。当年也曾在地质界"混了"多年的老武写道：

老武虽然和温家宝同在地质部门工作过，遗憾的是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他。他当地质矿产部副部长的时候，我在上研究生。当时，我经常在《地质报》上看见这位排在后面的副部长的名字，总觉得这个名字有点土气，但也好玩。我硕士学位完成后就留在北京的研究机构，这时家宝已高升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官比部长朱训大得多。

温家宝在读研的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未毕业便去了位于甘肃酒泉的甘肃地质局地质力学大队。有的同事说温家宝去甘肃酒泉是因为当时在地院追求一个女生，人家没有答应。那个女生后来去了兰州，温家宝便跟着去了兰州。到了兰州人家还是没有跟他，温家宝就干脆去了酒泉。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本人没有考证。

温家宝到了酒泉，桃花运就来了。地质队就有两个不错的姑娘追逐他，一个是江苏的，另一个就是现任夫人张培莉。温家宝的自身条件也非常好，其一是共产党员，其二是研究生学历，其三就是人长得也不错。温家宝原本对那个江苏姑娘情有独钟，但经不起张的糖衣炮弹，几个回合下来家宝就被张给捕获了。

张培莉在地质队有个外号叫"一阵风"，意思是做什么事都是风风火火，而且非常干净、利索。每次温家宝从野外回来，人还没进屋，张已经把洗脚水给他打好了。吃饭的时候，温家宝还没来得及动身去食堂，张培莉已经替他打好了饭。温家宝有一个毛病就是嘴巴把不住风，经常把队里的一些内部消息讲给老婆，老婆又把它传出去。

不管老武讲的这个"温家宝因追地院女生而主动要求去甘肃工作"的"故事"是真是假，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的确在到酒泉地质力学队工作没多

久，便“无心插柳柳成荫”，“抱得美人归”了。

从温家宝当时的政治表现、性格和为人来看，说他是为了追求女生而主动要求去甘肃工作，似乎不符合其温文尔雅的形象，可爱情的动力是难以估量的。据说，温家宝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的张蓓莉认识没多久，两人便喜结连理，比翼双飞了。

温家宝名如其人，跟队友亲如兄弟

在酒泉市肃州区丰乐乡二坝村接受近一年的劳动锻炼，到了 1969 年夏天，温家宝便和几位新同事一起返回了酒泉地质力学队。

回到地质队，温家宝就当上了技术员，工作主要是从事祁连山地区区域地质调查，也就是填出不同比例尺的地质图以供找矿使用。这是最基础的地质工作，也是最艰苦的一项工作。

温家宝从地质技术员干起，常年奔波在野外，用当年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的话讲，就是一年四季穿皮袄，没见过夏天。有关地质部门至今仍在使用的祁连山 1：20 万区调图就是在当年还是技术员的温家宝的参与下绘制完成的。

王志恒是当时地质调查队的工程师，由于是地质方面的专家，退休后又被返聘回甘肃第四勘查院（简称“四勘院”，即当年的力学队、地调队），提起当年从事野外地质调查的艰苦和温家宝参与绘制的祁连山 1：20 万区调图，王志恒比划着告诉记者，当时队里的区调工作主要集中在祁连山区，很多地方根本没有路，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牦牛和马。夏天进山，雪水融化，一天过三四次河是常有的事。那幅温家宝参与绘制的区调图是难度最大的一幅，就拿祁连山主峰来说，那里人迹罕至，几乎全部是冰川，测绘的艰难可想而知。

陈延京，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大陈家村人，1946 年生，比温家宝小四岁。1964 年底参军，在济南军区兖州某炮兵部队干气象兵。凭着“根红苗正”和突出表现，1971 年 3 月，复员转业的他和另外九名战友被选送到到甘肃地质局酒泉区域地质调查队，成了一名地质队员。且在那里一呆就是十

年。 1979 年底调回山东，仍从事地质工作，直到 2002 年正式退休。

当时的酒泉区调队 400 多人，大队下设分队，分队下设小组。分队 30 余人，小组五六个人。分组时，陈延京正好被分到了温家宝所在的第五分队地质普查组。当时他在这里任地质技术员，已经三年了。接下来的日子，朝夕相处、年复一年。虽然小组成员每年都有调整，但他俩作为党支部成员，一直固定不动，工作中相互配合，生活中亲如兄弟。

谈起第一印象，陈延京想了想说，那时的温家宝身子比较单薄，中等个头，圆脸，皮肤较黑。穿一身蓝色的工作服，虽然不是很新，但很整洁。话不多，但很谦虚、稳重，透着热情。之所以印象这么深，一是听说他是从北京地质学院主动要求来这里工作的研究生，当时可是个了不起的高学历，很崇拜；二是他的名字有特点，容易使人想起“温暖”和“饱饭”，很舒服，因此一下子就记住了。

区调队的任务是搞区域地质调查，即填出不同比例尺的地质图供找矿等用。这是最基础的地质工作，也是艰苦中的艰苦。工作范围涉及甘肃、新疆、西藏的部分地区，工区内有雪山、草原也有沙漠。每年 3 月份出发，先骑着牦牛到白雪皑皑的山中；10 月份后，天气变冷，就改骑骆驼，到沙漠里作业。通常 12 月底天寒地冻时才返回基地酒泉。工作中一般是以小组为单位集体行动。

在山上工作时，一般要爬到海拔四千多米的山，那儿的积雪常年不化，大家穿着皮裤皮袄出工，经常会冻得发抖。每天十几公里跑下来，脚都肿得厉害。回到宿营地，大伙便忙着取冰化水，生火取暖、做饭。简单的吃过后，一般人钻进帐篷躺倒行军床上倒头就睡。温家宝却常常睡的最晚，因为他负责技术，每天的资料要整理，后来他担任了小组负责人，还要准备明天的工作。几乎天天都要催促他好几遍，他才躺下。有时为了夜里起来扫帐篷顶上的雪，他还要穿着衣服睡。当时他患有较严重的鼻炎，遇冷经常发作，因为高山缺氧，厉害时常常晕倒在山上。每次醒来后，稍微歇息一会儿，爬起来再接着跑。他常说，当天的任务必须当天完成，不能因为自己耽误队里的工作进度。

在沙漠里搞勘查滋味也不好受。每次进去，都要用骆驼驮着大量的淡水，装在特制的半圆形大铝桶里，放在宿营地。为抓一个“早”字，每天天不亮，温家宝第一个起床，帮大家准备好简单饭食后，趁天凉快，抓紧去跑路线。常常是干着干着，太阳就火起来，脚下的沙子就烫起来，身上的汗就流出来、

粘起来。尽管背着十几斤的水，那天也喝不到黑。汗水边流边蒸发，最后的结果是，回到驻地，两手往脸上一抹，盐渍就扑扑簌簌往下掉。条件再艰苦，小组的工作年年是按时甚至提前完成。

温家宝沙漠大风、雪山洪水遇险记

在沙漠里工作，最怕遇到大风。大风飞砂走石，遮天蔽日，能把人活活埋掉。一天下午在内蒙，大家刚开始分头行动。突然大风打着呼哨，吹动着满天的风沙，像一堵墙从远处压来。温家宝见状，忙用地质锤敲击着铝壶，把小组的人员招呼到一起，围蹲在骆驼旁，进行躲避。风沙过后，工作继续。有时回来晚了，早到营地的队员就点起篝火，指引伙伴们归来。

陈延京回忆说，当时在野外，面食很少，主要是稀饭、米饭、咸菜，有时可以吃点罐头。过一段时间，队上就派车来送给养。这个时候，温家宝的夫人张蓓莉就常烙些大饼，再弄些别的吃食，让车捎来。温家宝总是把大饼等分给每个人，一起吃。在沙漠里，后勤人员偶尔也会送几只哈密瓜来，由于昼夜温差大，便常常“围着火炉吃西瓜”。

在大雪山中行动，最危险的是过河。一年夏天，早晨踩着石头过去的河谷，下午回来时变成灌满了积雪化成的洪水的大河，并眼见着水位猛涨。当时，大家都傻了眼，如果不尽快渡过去，在天黑前赶回驻地，结果肯定是在雪地里过夜，后果将不堪设想。

陈延京说，还是温家宝想出了点子：把绳子拴到两岸的树上，攀着绳子过河。他让大家原地等候，自己在腰里扎了根绳子放在战友手中，再背着一捆绳子，趟着齐腰深冰冷的河水一步步挪到对岸，拴好绳子再攀着返回。直

到队友和仪器都安全过去了，他才往对岸赶。谁知，他快到岸边时，大水突涨，“啪”地一声，绳子被上游冲下的石头划断，一下子把他冲出好远，幸亏腰间还系着绳子，大家慌忙把他从水中拉上来。

每逢中秋节、国庆节，队上送来的东西比较全，如花生米，有时还有点酒，大家便围坐一起，摆上酒、菜和饭，随后就是边吃边唱。唱的最多的是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有时高兴了，就用上级配备的用来照地质地貌的相机照相，在雪山骑上牦牛照，在沙漠骑上骆驼照，在草原与牧民照……这是一种难得的娱乐。

再一种娱乐就是打篮球，每次出野外，都带着篮球，平时自己拍打两下，碰上山民就找山民打，走到草原便同牧民打，曾号称“打过祁连山，打遍大草原”。 温家宝特别喜欢打篮球。有一年在青海桃来牧场跑路线时，正好遇上当地牧民搞运动会，报名参加篮球赛，同好几支藏民球队打。结果，获了个亚军，奖品是一只篮球。

回到酒泉基地，陈延京和温家宝住在一个大院，没事的时候经常互相串门，拉拉家常。记得一次聊天，温家宝说山东人很像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常猎户，憨厚、质朴，让人觉得很可以信任。

那时，温家宝家和其它地质队员的家没有什么区别，两间相邻的单身宿舍，中间开个门，一间放张床，再放个桌子、板凳就是一个家。唯一不同的，当时他们两口子都是大学生，也是队上少有的双职工，工资比别人高一些，因此有几件象样的东西，比如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张蓓莉是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的，在队上做岩矿鉴定工作，不用出野外，家里的许多事情都是她一手操持。她是个热心肠，做事也很直爽，也很利索，风风火火的，

同事们都爱称她“一阵风”，谁家有事需要她帮忙，说一声她一口就答应，不说，她知道了也会尽力去做。

有一年夏天，陈延京的家属带着孩子从山东过去探亲，当时陈正在野外，张蓓莉把她娘俩接到家中，并包水饺来招待。为消除她们的寂寞，还带她们到酒泉公园等游玩，直到陈回来。随后还把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生活用品送过来，让他们使用。陈延京的家属每次回山东，温家宝夫妇都会买些衣服之类的东西，让捎给老人和孩子。

说到在酒泉过大年，陈延京说：“1972 年春节前，我家属去酒泉探亲，当时张蓓莉已先行去看父母，温家宝因整理手头的资料，临到年根才准备启程。临行前我们与温家宝一起包水饺，他擀面皮的技术很好。吃了饭后，我用自行车送他去了火车站。”

“1974 年的除夕夜，是我们两家一起度过的，他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加上我的女儿一共七口，在一起包饺子、放鞭炮，过大年，其乐融融。那个时候，那个年月，在酒泉那个地方过年，真是别有一番滋味。记得当时烧煤球，下饺子需要急火，煤不好烧，温家宝就拿来蒲扇，半蹲在火炉前甩开膀子猛扇，那个场景我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

两个对温家宝感恩一辈子的女人

温家宝的“发小”李溥说，“2003 年，我有机会去甘肃探访老校友时，特意到了温家宝当年工作过和生活过的甘肃酒泉，寻访在那里温家宝曾经住过的平房里外间简易宿舍，寻访了力学队办公楼，还寻访了兰州市内的温家宝工作过的甘肃省地质局。走访了他曾经的同事，知道了温家宝的很多‘故事’。”

“在酒泉，有个对温家宝感恩一辈子的女同志，她是温家宝在地质队时一

位司机的孩子，因家里收入低，生活困难，读不起书。温家宝夫妇知道了二话没说，每个月从工资里拿出一部分钱，资助这个女孩读书，一直资助到女孩参加工作。”

李溥说，后来他到北京去看望温家宝的母亲杨秀兰老师时，跟她叙说温家宝在甘肃曾多年资助别人的往事时，老人家听后也有些诧异，因为她从未听儿子说起过这些。

实际上，对温家宝感恩一辈子的还有另外一个女人。

中国新闻社在温家宝当选总理的前夜发出报导说：在酒泉的地质力学队与温家宝共事 11 年整的一位老地质队员回忆起对温的印象，用简单的两个字概括：“好人！”

1970 年，该队指导员王德春去世，留下妻子和四个孩子，长女王有芹才 11 岁。王德春的遗孀无奈，想把两个年幼的儿子送人，温家宝和妻子张蓓莉再三劝阻，王的遗孀才答应带着所有孩子回山东农村老家。这一家孤儿寡母逢年过节，都会收到温家宝夫妇寄去的钱和衣物，一直到 1976 年，王有芹被招工，以“顶替”名义进入地质队当了工人。

这个故事在四勘院流传得更加详细：

王有芹的父亲王德春，曾任力学二队指导员，去世前任力学队政治处主任，与温家宝十分要好。王德春去世后，王有芹的母亲带着年仅 11 岁的她来到力学队，当时生活已经无法维持，许多人给王有芹的母亲出主意，让她把最小的当时只有两岁的小儿子送人。

温家宝夫妇得知后极力劝阻，并主动提出今后在生活上照顾她们。1976 年，王有芹被招工到地质力学队，来到了温家宝夫妇的身边。在一起工作生活后，温家宝夫人张培莉从不让王有芹花钱，而让她把工资全部寄往山东老家给母亲贴补家用。在工作上，温家宝对王有芹要求极为严格，经常向王有芹的领导询问她的表现。

“小时候，我只知道，甘肃有个对我们很好的叔和姨。”王有芹与记者谈起温家宝一家对她们的照顾，言语哽咽。

王有芹在农场锻炼两年后，又在野外工作了几年。期间，温家宝每次见到她，都要询问她的工作情况。“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严格要求。现在，张姨（温家宝夫人张培莉）还跟我联系，问问我的家庭、生活、工作情况。”

王有芹说，直到现在张姨还关心着自己的母亲，有一次出差时还亲自前往山东文登，看望她的母亲。“没有温总理夫妇对我们一家的帮助，就没有我

的今天。”王有芹动情地说。

温家宝迈入在官员梯队中上升最快的时期

发布: 2010-10-07 07:54 | 发布者: 推介 |

1976 年，36 岁的温家宝由队技术员调任队政治处干事，随后转为政治处负责人。

许多老同事对温家宝的评价是：有什么想法喜欢拿出来与大家积极地探讨。曾同温家宝在一个办公室共事的张子靖以及曾共事 11 年的楮腊元在学风方面对温家宝有着更细致的描述：在队机关上班时，他总是比别人来得早，走得比别人迟，坐下来就是看书、办公，除了休息时外出活动一下，其余时间都泡在书本里，从来不去别的办公室串门、聊天。

1977 年发生的一件事，让地质力学队的所有人对温家宝有了新的认识——他不但在业务工作上精益求精，为人也相当有风度，心里总是装着别人。温家宝已由队政治处负责人提升为副队长，恰逢省局下达了部分提升工资的指标。按说，温家宝由一般干部提升为队负责人，提升工资指标中肯定有他的一份，但当他看到指标有限时，硬是把这个指标慷慨地让给了其它同志。

冯俊国是当时力学队的党委书记，回想起这件事，也依然充满了钦佩。他说：“当时在会议上，大家都赞同给温家宝提升一级工资，但他当时就要求把这个指标让给其它的同志，会下他又多次找我谈话，执意要让出指标。这个举动当时在力学队反响很大。”

1978 年，温家宝升任地质力学队的党委常委、副队长，行政级别为副处级。随着大力培养和提拔“四化”干部政策的推行，以及中央在拨乱反正之后对地质工作的重视，温家宝迈入了他在官员梯队中上升最快的时期。

1979 年 9 月 13 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下，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撤销国家地质总局，设立地质部。在这一背景下，温家宝被从野外队副队长岗位上，平调至甘肃省政府直属的省地质局担任地矿处副处长，不久被评定为工程师职称。当时胡锦涛已经从水电单位调到甘肃省建委三年了，担任设计管理处副处长。

1980 年，地质力学队在总工王志恒的参与下做了一个磷矿筛选报告，并成立了生产组对报告进行讨论。温家宝作为省局地矿处负责人参加了这个生

产组，并任组长。在工区答辩时，温家宝发现有些问题处理得不是很好，提出了疑问。王志恒对此解释说，这些问题已经请示了局里，局里答复尽量做，实在做不了就算了。

作为组长的温家宝当时表态，不论请示了谁，一定要按规程办事。没有生产组组长的批准，这个筛选报告肯定过不了关。随后，报告被返工，并且一返就是半年多时间，在各项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后，这个筛选报告才得以顺利通过，这件事给王志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温家宝保存着一个做工精细的小木柜，这是他当时在地质力学队工作期间找工人王殿修制作的。温家宝从酒泉调任兰州后最初没有安排住房，一个人住在办公室里。一次，王殿修因要给受工伤的女儿看病，来到兰州，当时他经济状况不太好，温家宝知道后执意要王殿修和他吃住在一起，不要去住招待所。

温家宝对提携自己的第一个伯乐感恩至今

1980 年，胡锦涛升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一年后，温家宝升任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海外曾有报刊说温家宝步入政坛之初同胡锦涛一样，是被宋平在甘肃主政时所提携，这只是主观臆测。温家宝 1981 年年中被提拔为省地质局副局长之前，宋平已经离开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已换成冯纪新。

恢复成立地质部后，国务院于 1980 年 2 月批准：地质工作的管理恢复以地质部为主，与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双重领导。温家宝 1981 年被提拔为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时，就已经是由地质部发文任命，并向甘肃省委和甘肃省政府报备。

温家宝在甘肃工作时的业务成绩主要是编制出了甘肃省地质构造体系图。这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成果，整个甘肃大地的详细地质构造在这份图中一览无余，温家宝功不可没。

据《光明日报》刊登的《温家宝进京》的文章介绍，温家宝之所以能担任国务院总理重要职务，除他本人优秀，积极努力工作之外，是与他所工作过的甘肃省地矿局、国务院地矿部及中央办公厅等部门的领导慧眼识才和积极推荐分不开的。

所以，温家宝曾真挚地向别人讲：“我认为自己还算个人才，不过像我这样的，全国有成千上万。假如不是马万里局长（原甘肃省地矿局局长）把我调进局里，假如不是大光部长（国务院原地矿部部长）把我调进部里并向上

推荐，我不可能到中央，我可能如今还在山沟沟里。”

曾有评论称，这两个“假如”，充分反映了温家宝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也充分说明了一个人再有才干，如果没有他人尤其是所在单位主要领导者的精心阿护和培养，胸怀大局，出于公心，积极而大胆地提拔和向上推荐，光靠自己努力是难以成才的。

说起温家宝从酒泉地质队调到甘肃地质局的经过，尤其是如何受到上级领导的精心阿护和培养，沙仑无疑是最好的见证人。

沙仑是温家宝在甘肃工作期间的老领导，从 1976 年温家宝主动请缨，要求做业务报告时，这位当时才 30 多岁的年轻人就给沙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79 年，沙仑由当时的省地质局地矿处处长提升为副局长，处长一职空缺，局里开始考虑接任人选，当时选拔干部要求讲“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选来选去，年轻、又有研究生学历的温家宝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在经过省地质局马万里局长和沙仑副局长的专程组织考察后，在酒泉工作 12 年的温家宝调任甘肃省地质局地矿处副处长。

让温家宝感恩至今的马万里，其官方资料并不多，甘肃省地质局历届领导名单显示，马万里曾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担任局长，沙仑则在数位副局长中排位靠后。

温家宝在甘肃地质局当了一年多的副处长后，便于 1981 年升为副局长。在甘肃省地质局 80 年代初的领导名单中，温家宝是排在最后的副局长。

当时，沈克放是地质局政治部干事，他记得局里要求加强干部的思想政治学习，派他出去进修了几次，回来后给全局的干部讲课。当讲到资本循环的三种形态、三个阶段、三次飞跃时，为便于记忆，他将其称为“三个三”。课后，温家宝找到他，说这“三个三”还吃得不太透，请他再讲讲。

一位副局长向普通干事如此诚恳地讨教，至今仍令沈克放难以忘怀。

梁晓声回忆温家宝：那顶帐篷绝对不许烧掉

2008 年 5 月，著名作家梁晓声发表文章回忆了温家宝在甘肃地质局当副局长时的一段往事。

梁晓声说，80 年代初他曾改写过一部上下两集的电视剧本《荒原》，内容反映的是两名年轻的地质工作者艰苦的野外工作——它由中央电视台影视部直接组稿，形成初稿以后，请他再给“影视化”一下。该片的导演是黄群学，

女主角是当年因主演电视连续剧《外来妹》而深受电视观众喜爱的陈小艺。

《荒原》是在甘肃省境内拍摄的。拍摄过程中，受到了从地质部到甘肃省地质局的热情支持。地质局长专程从某驻扎野外的地质队赶回兰州接见了摄制组的主创人员，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就把地质局当成自己的家吧！遇到什么困难，只管开口。地质局能直接帮助你们解决的，我们义不容辞。不能直接帮助你们解决的，我们一定替你们尽力协调，争取顺利和方便。

梁晓声说，这位地质局的局长，亦或副局长就是温家宝，他给摄制组的主创人员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用导演黄群学的话说：他是一个真诚的人！还是一个特别注意细节的人。

导演黄群学当时打电话跟梁晓声说：摄制组将需要向地质局租借的东西列了一份清单。温家宝当着他们的面让秘书立刻找出来，亲自过目。清单上所列的东西中，包括一台发报机、一套野外炊具、几身地质工作服、一盏马灯、地质劳动工具和一顶帐篷等。

温家宝边看边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地质局有的，完全可以无偿提供给同志们。省下点儿钱用在保证艺术质量方面，不是更好吗？为什么只列了一盏马灯呢？玻璃罩子的东西，一不小心就容易碰坏。一旦坏了，那不就得派人驱车赶回兰州来再取一盏吗？耽误时间、分散精力、浪费汽油，还会影响你们的拍摄情绪，是不是呢，同志们？有备无患，我们为你们提供两盏马灯吧。再为你们无偿提供柴油。你们只不过是拍电影，不是真正的野外驻扎，无须多少柴油燃料，对吧？至于发报机，就不必借用一台真正能用的了吧？我们为你们提供一台报废的行不行？反正你们也不是真的用来发报，是吧，同志们？能用的万一搞得不能用了，不是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了吗？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份了，西部地区的野外很寒冷了。你们还要在野外的夜间拍摄，一顶单帐篷不行。帐篷也可以无偿借给你们，但应该改为一顶棉帐篷。你们在野外拍摄时冷了，可以在棉帐篷里暖和暖和嘛......"

于是温家宝亲自动笔，将他认为应该无偿提供的东西，都一概批为无偿提供了。一位在场的处长低声对局长说：后勤仓库里只剩一顶帐篷了，而且是崭新的，还没用过的——那样子，分明是有点儿舍不得。

温家宝沉吟片刻，以决定的口吻说："崭新的帐篷那也要有人来开始用它。就让摄制组的同志们成为开始用它的人吧！"

之后，在整个野外拍摄过程中，那一顶由地质局长特批的崭新的棉帐篷，在西部地区的野外，确确实实起到了为摄制组遮挡寒冷保障温暖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也正是因为那一顶崭新的棉帐篷，导演黄群学受到了甘肃省地质局长的批评。剧中有一段很重要的情节，就是帐篷失火了，在夜里被烧成了一堆灰烬。制片人员的拍摄计划表考虑得很合理，安排那一场戏在最后一天夜里拍摄。拍毕，全组当夜返回兰州。

导演忍不住给温家宝拨通电话，预报讯息。不料温家宝一听就急了，在电话里断然地说："那一顶帐篷绝对不允许烧掉！我想一定还有另外的办法可以避免一顶只不过才用了半个多月的帐篷被一把火烧掉。"

导演说那是根本没有别的办法可想的事。因为帐篷失火那一场戏，如果不拍，全剧在情节上就没法成立了。导演还说："我们已经预留了一笔资金，足够补偿地质局一顶棉帐篷的损失。"

温家宝却说："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另外的办法究竟想过没想过的问题。"

最后，温家宝紧急约见导演。导演赶回兰州前，又与在北京的梁晓声通了一次电话，发愁地说："如果就是不允许烧帐篷，那可怎么办？那可怎么办？""难以理解。说不定我此一去，就会因一顶帐篷和他闹僵了。反正帐篷是必须烧的，这一点我是没法不坚持到底的。"

然而，黄群新并没有和温家宝闹僵，反而又一次被局长感动了。

在简陋的办公室里，温家宝说出了如下一番话："我相信你们已经预留了一笔资金，足够补偿地质局的一顶新帐篷被一把火烧掉的损失。此前我没看过剧本，替剧组预先考虑得不周到，使你们的拍摄遇到难题了，我向你们道歉。但是和你通话以后，我将剧本读了一遍。烧帐篷的情节不是发生在夜晚吗？既然是在夜晚，那么烧掉的究竟是一顶什么样的帐篷，其实从电视里是看不出来的。为什么不可以用一顶旧帐篷代替一顶新帐篷呢？"

导演黄群新嘟哝说："看不出来是看不出来，用一顶旧帐篷代替一顶新帐篷当然可以。但，临时上哪儿去找到一顶烧了也不至于令您心疼的旧帐篷呢？找到它需要多少天呢？我们剧组不能在野外干等着啊！......"

温家宝说："放下你们的剧本，我就开始亲自打电话联系。现在，一顶一把火烧了也不至于让人心疼的旧帐篷已经找到了，就在离你们的外景地不远的一支地质队的仓库里。我嘱咐他们：将破了的地方尽快修补好，及时给你们摄制组送过去，保证不会耽误你们拍摄今天夜里的戏......"

温家宝随后又说出一番话：我们地质工作者的职业性质决定了我们不是物质产品的直接生产者。我们在野外工作时，所用一切东西，无一不是别人生产出来的。他们保障了我们从事野外工作的必备条件，直接改善了我们所

经常面临的艰苦环境，这就使我们对于一切物质产品养成了特别珍惜的习惯。你们也可以想象，在野外，有时一根火柴，一节电池，一双鞋垫都是宝贵的。何况，我们是身在西部的地质工作者，西部的老百姓，太穷，太苦了啊！你们若烧掉一顶好端端的帐篷，跟直接烧钱有什么两样呢？那笔钱，等于是一户贫穷的西部人家一年的生活费还绰绰有余。这笔钱由你们节省下来了，不是可以在别的一方面的社会经济中，起到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作用吗？我们中国目前还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我们中国人应该长期树立这样的一种意识--物质之物一旦成为了生产品，那就一定要物尽其用。不要轻易一把火把它烧掉了。而我们中国人做事情，尤其是做文化之事的时候，能省一笔钱那就一定要省一笔钱。中国的文化之事，理应启示我们中国人——对于中国，物质的浪费现象是罪过的......

梁晓声最后写道：当导演后来在电话里将地质局长的话复述给我听时，远在北京的我，握着话筒，心生出种种感慨。感慨之一那就是——中国委实需要一大批像那位地质局长一样的人民公仆。

温家宝感慨：假如没有大光部长提携和推荐

用温家宝自己的话说："假如不是马万里局长把我调进局里，假如不是大光部长把我调进部里并向上推荐，我不可能到中央，我可能如今还在山沟沟里。"

那么，这位改变了温家宝人生的"恩人"孙大光是谁？以下为官方公布的简历：

孙大光，1917 年生，安徽寿县人。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 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工作后，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1937 年后，在广东、重庆做统战工作。1945 年受党组织派遣任国民党长春市社会局局长兼教育局局长。1946 年后，任东北军区教导团教育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研室主任，东北交通部办公室主任、秘书长，东北航务总局局长，交通部北洋区海运管理局局长兼大连海运学院院长。1952 年后，任交通

部计划司司长、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兼党组书记。1975 年后，任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地质部部长、党组书记，地质矿产部部长、党组书记。

官方评论称：孙大光以独特的言传身教和实情实景培养考察人才，为国家培养选拔了大批优秀年轻干部。他富有远见卓识，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促成了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中兴，为发展中国的地质矿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85 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5 年 7 月离休。2005 年 1 月 13 日 10 时 10 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 88 岁。

那么，孙大光是如何发现温家宝这个人才，又是如何提拔了他并向上推荐的呢？

温家宝与孙大光

据官方媒体描述：1980 年初，当时的地质矿产部部长孙大光开始在全国地质系统考察干部，为部级后备干部选将。孙大光考察干部十分认真，他决定，部级后备干部，他逐一亲自考察；司局级后备干部，他也要熟悉和考察相当一部分。他的考察方法也很特殊，让组织部门陆续筛选一些年轻的、素质好的、懂地质专业的司局级干部，由他率领，赴各省地质局调研并解决实际问题，借此考察每个人的综合分析能力和战略认识高度。

1980 年下半年，温家宝作为甘肃省地质局的后备干部被推荐至地矿部，1981 年被批准任命为副局长，随后跟随孙大光部长赴黑龙江、吉林、辽宁调研。在调研中，温家宝思维严谨，作风稳重，才干超群，给孙大光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0 年 1 月 13 日，是孙大光去世五周年纪念日。当天，人民网发表温家宝撰写的《深切怀念孙大光同志》一文，不但回顾了孙大光“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共和国建设做出的卓著功绩”，同时也讲述了他与孙大光近距离接触的往事。温家宝写道：

我与大光同志于 1981 年 8 月第一次接触，从他的言行、举止中得到兼有领导、严师、益友的感受。大光同志对我和同期一批中青年干部的关怀、教诲和培养，情真意切，言犹在耳。特别是他对年轻人寄以厚望，委以重任，指明了方向就大胆放手，让他们去施展、开拓，这是很少有、也很难得的。大光同志的思想境界和工作能力堪称高超，但少有“领导高明论”；他驾驭全局往往挥洒自如，但并不恋栈、揽权；他悉心培养年轻干部，诲人不倦，却不指手画脚。

大光同志本不熟悉地质业务，到地质部门工作是“外行领导内行”，这是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的接替、转换过程中常见的现象。他首先以不畏难的精神接受这个挑战，下了不少功夫钻业务，同时“深感地质工作必须由内行来领导，如果自己不懂，工作起来就像是隔靴搔痒。如果一大批领导骨干不懂或不很懂专业技术知识，就会贻误整个事业的发展”。在我国，计划经济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外行领导内行”，或干部 “四化”以来的“内行领导内行”，都有领导得好或比较好的，也有领导得不好或不够好的，这有多种原因。大光同志对地质工作的领导应属前者之列无疑，一方面，他以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高瞻远瞩，控制全局；另一方面，重视和推进干部“四化”，依靠专业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把事业推向前进。大光同志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提高自我学习能力，由外行变为内行，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980 年地质工作的管理体制改为以地质部为主的双重领导后，大光同志

把注意力逐步转向选拔干部、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在创造性地完成这项“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中起了很好的典范作用。他从近年擢升为省局领导的中青年干部中筛选若干优秀分子作为考察对象，亲自带队赴基层做三四十天的流动调研。这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同行业小团队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谈一路，各抒己见，议论风生。大光同志在与大家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兼听各方意见，近距离以至零距离地观察、鉴别干部，从而获得比较系统的第一手数据，也对组织部门提供的考核材料进行验证，做到心中有数。从 1980 年开始，先后组织了五批这样的考察，涉及 30 多名中青年干部。我有幸参加了第二批和第四批考察，在大光同志的言传身教、年轻干部相互学习和向基层干部学习中获益良多、终身受用，也切身感受到大光同志为此的殚精竭虑。这样做，既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既有唯物论、又有辩证法，可谓“独具一格”，曾受到中组部的高度评价。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是这样从山沟里被选拔出来，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

大光同志选人唯贤，选人唯实，选人从严。不仅从既有的实绩选人，而且对选上来的人也静观其进，静观其变，把动态考察贯穿于选拔、使用的全过程。

大光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家。历来勤于学习，博览群书，特别钟情于史籍。他认为，政治是历史的积累，不懂历史就不懂政治。在“文革”中身陷囹圄的后两年，每天读书一万字，将马、恩、列、斯全集通读了两遍；出狱后一两年时间里，又读完了十大本《世界通史》等。与大光同志共过事的人，无不佩服他谙史于心、博古通今，这是他作为政治家、懂政治所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跟大光同志一起工作过的年轻人常感叹，弄不懂他有多大的知识，跟着他永远有学不完的东西。实际上，大光同志作为终身学习者，

是生命不息、学习不止的。

“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大光同志的睿智、思想和品格将与我们同在。

“甘肃活地图”温家宝是这样调到北京的

不过，知情人士曾披露过更多的细节。据温家宝当年的同事回忆：温家宝刚刚当上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几个月，时任地质部长孙大光到甘肃视察，省局局长业务外行，当时几乎是以恳求语气推出温家宝救驾，向部长汇报。温在孙面前滔滔而言，博得部长高度赞赏，当面称赞温家宝简直就是一幅“甘肃活地图”。当时，孙大光就认为时年 38 岁的温家宝符合干部“四化”标准，就有了提拔他的想法。

宗海仁在《第四代》一书中也谈到了孙大光与温家宝的“特殊关系”：1980 年，孙大光部长到甘肃考察，温家宝全程陪同。在不到十天的工作接触中，温家宝如数家珍地向孙大光介绍甘肃省地质矿产资源的分布及开采情况，这是孙大光第一次如此全面清晰地听到这样的汇报。

在这次考察中，温家宝还就如何切实有效地勘探、保护、管理好各种地矿资源，如何建设一支高效的地质资源管理队伍谈了自己的看法，并且与孙大光探讨了进行地质勘探成果商品化、地质勘探单位企业化以及如何实行矿产资源有偿开采的可行性。温家宝简练的谈话，宏观的思路，鲜明的观点，扎实的地质学理论功底，深深打动了这位年逾花甲的老部长。

宗海仁指出：甘肃之行，对孙大光来说，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温家宝这个人才，于是下决心调温家宝入地质矿产部。为此，孙大光回京后主动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推荐，要求调温家宝到地质矿产部，并亲自到中组部地方干部管理局介绍他对温家宝的印象。同时，他还征求时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即将调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的宋平对温家宝的意见。

宗海仁还指出：宋平虽然并不像熟悉胡锦涛那样熟悉温家宝，但对温家宝还是了解的，1981 年温家宝从副处长一下子越级提拔为副局长，就是宋平支持肯定的结果，因此，对孙大光的征求意见，宋平给予了满意的答复。

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地方干部局协同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对温家宝进行全面考察，在征求各方面意见后，给予温家宝非常高的评价。终于，温家

宝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列入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

有关“孙大光一手提拔温家宝”还有另一种说法，就是“孙大光提议，下面直接推荐”，而且温家宝得到不少人支持。

据媒体报导，1982 年，经孙大光提议，由地矿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的职工直接推荐副部长人选。各司局和地质科学院等单位分成五组进行讨论，与会者可以各抒己见，任意提名。结果出现一个意外的集中：不少人都推荐了时任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的温家宝。政策研究室是因为看到温家宝的文章和总结写得好，有深度，有力度，不可多得；政治部考察过甘肃局的干部，认为温家宝德才兼备，卓尔不群；计划司司长王炳坤到甘肃局去过，了解到温家宝谦虚诚恳，团结同志，很有才干，也很有威信……不久，孙大光便把温家宝调到地矿部，任政策法规室主任，实际是为副部长过渡。

不管怎么说，温家宝能在 14 年中从当初地质队的一名技术员，升任中共地质矿产部党组成员、地质矿产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除了受到马万里和孙大光这两位“恩人”的呵护和提拔，主要还是靠他自己的努力，虽然一直在边远省份的基层工作，但他那出众的才华很快崭露并被发现，随后才被推举到领导岗位，从副职到正职，从下到上，一步一个脚印地稳健地走了上来。

1982 年初春，温家宝告别了生活整整 14 年的甘肃，离开了祁连山麓。

14 年，相当于五千多个日日夜夜，在人生的道路上，这是一段并不短暂的时间！甘肃对他来说是第二故乡也好，说他是个半个西北人也行，一点都不过分。

14 年，包括他的皮肤和脸色都已西北化了。初尝世态炎凉，直面中国最艰苦的西北人的民生疾苦，他与这里的一切已经融为一体了，若不是调离，那一定是难舍难分的。

温家宝进了地矿部：“希望你手把手教我”

1982 年 4 月，温家宝调回北京到地质矿产部机关工作。这比胡锦涛进京，要早八个月。

当时国务院刚刚批准了在原地质部基础上组建地质矿产部，下属区域地质矿产地质司、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司、石油地质海洋地质局、矿产开发管理局等 12 个司、局级机构，从地质部的下属机构及各地质局抽调了一批干部充实各级负责岗位。温家宝被任命为在原地质部政策研究室基础上组建起来的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同时被安排为部党组成员。

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时批准孙大光为党组书记，朱训为党组副书记、第一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同年 9 月，孙大光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中央委员，朱训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温家宝与朱训配合十分默契，朱在温不在场时向部下夸赞温家宝年轻有为。

1983 年 10 月，温家宝被提升为负责办公厅事务及部党务工作的副部长。温家宝升任地矿部副部长后，分管计划和财务等工作。

上任初期，温家宝曾对计划司司长王炳坤说："王司长，我的情况你都知道，搞野外地质出身，对计划财务工作完全是门外汉。今后，希望你手把手教我......"

这是一种难得的推心置腹，也是一种上级对下级少有的尊重和平等。王炳坤是个聪明而又能干的人，据说他能看得上眼的人并不多，温家宝这番坦诚的话打动了他，后来他对温家宝的工作非常支持，主动配合，彼此都感到愉快。

温家宝工作勤谨，待人谦和，思维缜密，作风稳重，在地矿部口碑甚佳。他调到部里后，每年春节都去看望北京地质学院的老师，不是坐车去，而是悄悄地骑着自行车去，毫不张扬。

尽管温家宝调回北京，用老同志的话说是"官越做越大"，但他却从未忘记过昔日的同事和老友。

老同事赵生贵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温家宝担任地矿部副部长后，有一次，赵生贵去地矿部出差。当时正逢部机关在院子里做操，温家宝就站在队伍的前排。当他看到曾共事过的赵生贵从面前走过时，赶忙从队伍中跑出来，走到赵生贵面前热情地打招呼、握手。"当时我心里真激动呀，人家已经是副部长了，还能主动与过去的同志打招呼。"赵生贵说。

前文提到的曾与温家宝一起干地质的队友陈延京曾向媒体透露说，那一年他在邹平出野外时接到了温家宝的来信，知道老队友当了地矿部的副部长。当时队上正好有人去北京，陈延京就在当地农村买了点土特产，想略表心意，因为他知道温家宝爱吃花生米。想当年，在甘肃酒泉，花生米可是最好的下酒菜呢......

也许是任期太短的原因，温家宝在地矿部当副部长期间留下文字数据并不多，官方媒体在谈到这段经历时往往也是一笔而过——1983 年至 1985 年，地质矿产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1985 年 4 月，中共中央内定由朱训接替孙大光的部长职务，便先由中

组部发文任命朱接替孙的部党组书记，温家宝同时被提升为该部唯一的党组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温家宝无疑是被作为地质矿产部部长接班人选培养的，但实际上还没有来得及熟悉政治部工作，便于当年 5 月被中组部“借调”至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筹备组工作。

温家宝赴江西矿区调研：把酒肉都撤掉！

就在温家宝被“借调”到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筹备组之前的一个月，即 1985 年 4 月，他最后一次以地矿部副部长的身份到江西省地矿局视察、调研。

1985 年 4 月 3 日，温家宝与两名技术人员由北京抵达南昌后，在江西省地矿局局长颜美钟的陪同下，从赣南到赣西，从赣西到赣北，先后到江西省地矿局所属的 908 大队、909 大队、赣南地调队等地调研。

4 月 8 日上午 10 时，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颠簸，温家宝一行到达贵溪县冷水镇。912 大队一分队分队长杨木松、党总支书记余秀华早已在此等候。他们一天前就已接到大队通知，说有部领导、局领导来调研。

“是不是先休息一下？”待温家宝与杨木松、余秀华握过手后，颜美钟局长征询地问着副部长。

“不用了，到各个点去看看。”据当地媒体描述，虽然长途跋涉，此时的温家宝仍然精力充沛。温家宝在一分队简易的招待所换上胶鞋后，步行来到鲍家、下鲍、银路岭等矿区。　所到之处，温家宝都与工人们握手，还非常内行地与技术人员问起非常专业的话题。

中午时，温家宝来到一分队职工食堂，这是一幢简易得不能再简易的工棚式的平房。

“把酒和鸡、肉撤掉！”一进入餐厅，温家宝见饭桌上摆了二瓶红酒，还有鸡、肉、鱼之类，温家宝态度坚决地说。

一伙人手忙脚乱地将红酒、荤菜撤下。要知道，这些东西是队里一天前专门派人到贵溪县城叶家塘菜市场凭票购买的。在这深山沟里，鸡、鱼、肉全是到县城采购的。因为一分队 340 多名职工及 70 多名家属的户口全部都是在县政府所在地雄石镇。

“这是第一次，不能怪你们。下一餐再这样，我可要批评你们了。”温家宝微笑着对一分队的干部说。

吃过饭后，温家宝径直向厨房走去，握着炊事员和切菜员的手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炒春笋很香，很好吃！”几位厨房工作人员激动万分，他

们万万想不到副部长如此平易近人。

接着，温家宝一行先后到地表组、综合组、行政组和家属区看望和慰问了干部职工和家属。在地表组，普查勘探员董绍芳轻轻拍了一下温家宝的肩膀，正欲说什么，被队长杨木松止住了。杨队长还责怪似地瞟了董绍芳一眼。

“没有什么，我们是校友，同学之间无大小。”温家宝微笑着说。刚才在交谈中，温家宝没有想到，在 912 地质大队一分队，竟然邂逅校友，心情格外欢畅。紧张的杨木松、余秀华这才想起，技术员董绍芳 1957 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比温家宝早几届，是“师哥”。

当天晚上，在没有卫生间的矿区平房招待所内，温家宝与分队长杨木松拉着家常。杨木松回忆说，温家宝就坐在木板单人床上，一边用热水泡着双脚，一边跟他交谈着。聊了一会儿家常后，杨木松见副部长毫无官架子，就“单刀直入”地说：“温部长能不能弄两个钱来，我们这里苦得要命。”

“基层困难、辛苦，我们都知道，全国各地都差不多。”温家宝微笑地答道。

“我还有两件事，一‘公’一‘私’，请温部长帮忙”，“资金”的问题见没有着落，杨木松接着话茬说。

“说吧！”

“第一是我们已接到 912 大队的通知，全国银矿工作现场会下个月将在我们银矿召开，我们已经在着手筹备，我们想请您到时能参加这个会，好给我们脸上沾沾光。”

“这个，我恐怕就来不了啰！”

“第二件事是我想调回家乡广东，虽然现在还不算老，但中国有句古语，叫‘叶落归根’！”

“我看你就不要走了，这里的工作刚刚起步，有基础，而且前景非常好，你对这里的情况又了解熟悉。”

杨木松最终还是没有离开一分队，后来他带领全队干部职工，创下一年施工钻探 20000 多米进度的江西省最好的记录，在全省地矿系统第一个建立了标准化机台，有六台大型钻机。1989 年，杨木松和江西省其它各条战线的 30 多名先进人物一道，因找矿业绩突出，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胡耀邦钦点温家宝进入中南海

从江西调研返回北京后，温家宝便被“借调”到中央办公厅，从而也离开了整整工作了 25 年的地质战线。

官方文字数据和海外媒体在介绍温家宝进入中南海中央这段历史，都谈到了胡耀邦对温家宝的“提携”。

《第四代》一书作者宗海仁对温家宝在地矿部的表现评价很高，并认为温家宝在地矿部所受到的好评，为其进入中南海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宗海仁说：温家宝是属于那种不事张扬、作风踏实、埋头实干、不会邀功的人，就像一颗埋在地下的金子，没有人发现他，他很可能默默无闻地过完一辈子。一旦被发现，他的价值就会被充分发掘出来。

据宗海仁介绍，地质矿产部的几年，温家宝的领导才能、组织协调能力、政策理论水平得以充分发挥，在 1982 年、1983 年、1984 年连续三年的部机关民意测评中，温家宝深获广大机关干部好评，没有一人指责他，对他提出批评意见。大家对他的评价是：思想解放，作风民主，工作扎实，身体力行，办事高效，清政廉洁。这一评语，为温家宝的进一步上升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1984 年初，根据胡耀邦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命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并在合适的时候晋升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为了便于王兆国更好地开展工作，并在合适的时候接替王兆国晋升后留下的岗位，中央决定从现有的省部级干部中物色一名“年轻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作王兆国的助手。

《解放日报》和《21 世纪经济报导》也曾发表文章介绍说：1985 年春，中央准备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需要新鲜血液参与筹备工作。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钦点了三个来自不同部门的年轻副部长参与筹备，温家

宝名列其中。

“胡耀邦选干部不任人唯亲，他很重才干。1985 年前后，他特别委托中央组织部考察干部，主要是省部级干部，希望物色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合适人选。当初我知道的挑选标准有四个：副部级以上、年轻、学历较高和有才能。”2002 年 2 月 27 日，一位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近十年、作为温家宝直接下属四年多的人士说，“中组部考察时，发现他各方面才能很全面，人品也好，而不仅仅是个只懂技术的干部。”

经过几轮筛选，那次选拔只留下三个干部，其中之一就是温家宝，另一个是吴邦国，时为中共上海市常委。还有一位吉林省的高级干部。

随后，中央让他们三人参加了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文件起草、组织协调等，职务是大会副秘书长。“这实际上是对他们的考察。后来中组部向胡耀邦提出温家宝和吴邦国两个候选人名单，在征求所在单位意见时，上海领导表示希望吴邦国留在上海发挥更重要作用，而在问到地质矿产部意见时，部领导和党委表示服从中央安排，并为本部能为中央输送高级人才而自豪。”这位曾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人士回忆说。

就这样，1985 年的春天，成为温家宝仕途的关键转折点——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成为王兆国的助手。

胡耀邦之子：挑选温家宝的不是我父亲

对于外界普遍认同的“是胡耀邦钦点，温家宝才进入中南海”的说法，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却持有不同看法。胡德华强调，父亲胡耀邦并不认识温家宝，是王兆国和中组部挑选了温家宝。

2010 年 4 月 15 日是胡耀邦逝世 21 周年的纪念日，温家宝撰文《再回

兴义忆耀邦》刊于《人民日报》，怀念当年陪同胡耀邦考察贵州的经过。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电话采访说，胡耀邦任总书记的时候，胡启立离开**中共中央**办公厅，由王兆国接任主任，后来因为工作需要，增加了一位中办副主任，就是温家宝。

胡耀邦和温家宝此前并无任何历史渊源。胡德华说，温家宝和胡耀邦也不是认识的朋友，“没有任何关系”。

胡德华回忆了他的父亲生前与温家宝的交往经历时说：“家宝同志 1985 年到中央办公厅，他跟我父亲只一起工作了短短两年，并不是父亲提拔了他，他才对我父亲非常好。在这两年，我父亲的工作作风、对人民的这种热爱，深深地感动了家宝同志，所以他对父亲，有发自内心的热爱。”

胡德华指出，温家宝到中央办公厅之前，跟他父亲并不认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王兆国当时正寻找适合人选担任中办副主任，曾问过胡耀邦意见，当时他表示要选一个非常优秀的干部，但最好是他不认识的。

同一天，胡德华在接受《东方早报》记者专访时也强调称：“温总理在到中央办公厅之前，跟我父亲是不认识的，他当时是地质矿产部的副部长。”

胡德华详细介绍说：“关于温总理的这段故事，王兆国同志跟我讲过，当时兆国同志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就跟我父亲提出来，说：‘中办还要有一个副主任，耀邦同志你看选谁好？’父亲就说：‘中办这个岗位非常重要，你要选一个非常优秀的干部，最好选一个我不认识的干部，要选你认为最优秀的。’这是因为如果选他认识的，将来一些原则的问题不好处理。这样，兆国和中组部专门挑选了家宝同志。”

说起王兆国，海外媒体曾形象地形容他是“起大早赶晚集”的人，这位当初最被看好的第四代领导人，却成了最早被淘汰出核心圈的人。

出生于 1941 年 7 月的王兆国，河北省丰润人。因生活所迫，王兆国读书较晚，到 20 岁时才有机会进入大学校门。1961 年，王兆国和中共第十六、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成为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友，王兆国入读动力机械系涡轮机专业，而李长春则攻读电机系的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受“文革”的影响，已经毕业两年的王兆国和其它同学一样，直到 1968 年才被分配工作，到建在湖北十堰地区的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简称“二汽”）下属车桥厂担任技术员。

在“二汽”工作的前十年时间里，王兆国担任过车桥厂的共青团委副书记、总厂团委书记，总厂党委常委、厂政治部副主任兼车箱厂党委第一书记等职；他还曾兼任过“二汽”所在城市——十堰市的中共市委常委。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人事政策的调整，王兆国很快就被提拔为第二汽车制造厂副厂长、兼党委书记。除了业务过硬之外，王兆国“政治可靠”的突出表现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拒绝在他主管的车箱厂组织“批邓”活动。1980 年，当邓小平到“二汽”视察时，该厂的主要负责干部特别向邓强调了，当年王兆国拒绝在车箱厂组织“批邓”的难得表现。

在受到邓小平的赏识后，王兆国被擢拔的速度就更快了。在 1982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41 岁的王兆国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两个月后，王兆国出任属正部级职务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中央团校校长；1984 年，转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在这期间，胡锦涛、温家宝都曾先后做他的副手。

在任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时，王兆国受到了胡耀邦、乔石等人的赞许。

在 1985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44 岁的王兆国和乔石、田纪云、李鹏、郝建秀等一同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也因此，王兆国曾一度被视为，是未来中共党务工作的理想接班人选。

王兆国自己似乎也想有番作为。于是，他试图要把“端正党风”、“廉洁自律”的工作，从党内高层抓起。特别是在“取消中央领导人生活‘特供’”的议题上，引发了中共退休元老们的强烈反弹，也为其后来遭到“流放”埋下一个“祸根”。

温家宝遭“四大罪名”状告仍升中办主任

温家宝刚一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时，有人就以“四大罪名”状告他，据说中组部四次派人来酒泉调查取证。让中组部调查人员没想到的是，温家宝的老同事们纷纷保护他，匿名信的内容全部站不住脚，因此没有把他击倒。

对中国官场曾经流行的这种告状的怪现象，社会上有句顺口溜概括的很精辟，说是“八分钱（从外地寄往北京的邮票钱），查半年，有事没事‘黄’了算”。有评论称：温家宝幸亏没有被“八分钱”莫名其妙的被搞“黄”掉，否则中国就丧失了如今的这位总理了。

进入中南海后，温家宝一如既往地秉承他的尊重领导和平易近人的一贯作风。据他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温家宝在日常工作中对每一位领导都很尊敬，他对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依旧保持着平易近人的风格。温家宝出掌中央办公厅后，他的务实作风受到了各方好评。

其中，当时广为传播的就是温家宝对人和善、没架子，对自己要求很严。那时，地矿部领导们经常去中央汇报工作，温家宝送他们出来的时候还和司机打招呼，还常常关心、问候从前的司机。

至于温家宝是如何接替王兆国升任中办主任的，宗海仁在《第四代》一书中披露一段不为外界所知的中南海政治争斗的内幕：

1985 年 9 月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在中央办公厅主任岗位上工作了一

年半的王兆国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兆国升任书记处书记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有意调整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分工，想让王兆国杯葛邓力群，迫使身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两职于一身的邓力群交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一职，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完全改造成胡耀邦能够控制的改革班底。为防止胡乔木、邓力群等书记处成员对这一人事调整的阻挠和反对，胡耀邦决定先让王兆国辞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而后再由王兆国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去夺取邓力群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职务。

在这一计划部署下，1986 年春，在中央办公厅工作刚刚一年的温家宝顺利接替王兆国，成为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继杨尚昆、汪东兴、姚依林、胡启立、乔石、王兆国之后的第七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共中央办公厅是中共中央的神经中枢，掌握着中国党政军最核心的机密，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以及中共中央各部门、中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向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都必须经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公文处理，反之，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以及中共中央各部门、中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发出的报告也必须经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受理程序。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还负责保卫中共中央机关、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安全的职能，中央警卫局就直接归其管辖。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有权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政治局甚至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很大程度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比一些中央政治局委员掌握更多的核心机密。

宗海仁强调指出：温家宝能够获此重任，除了他能够积极协助王兆国工作，获得王兆国的信任、支持外，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习仲勋的支持，也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乔石、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的支持分不开。

不过，高新在《温家宝传》中对《第四代》的一些说法给予“纠正”，尤其是有关“胡耀邦安排王兆国向邓力群夺权”这一点，高新指出：把王兆国当年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说成是胡耀邦主动安排，意在依此向邓力群夺权的说法，实在是贬低了胡耀邦的政治智商。

温家宝能够成为“政治不倒翁”秘诀何在？

温家宝在中办主任这个位置上谨言慎行，埋头苦干，任劳任怨。

但也有评论指出，温家宝是个极有城府的人，在中办主任这个位置上先后服务过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三位中共最高领导人，无论政坛顶峰如何更换“大王旗”，他都能岿然不动，成为中南海核心圈子中周旋的不倒翁，不得不让人称奇。

事实上，温家宝能够成为“政治不倒翁”，并非他的权术和心计多么高明，而确实是因为他敬业尽职到难以让任何人挑剔的地步，以至于最后谁都有点离不开他，而且也不愿这种人离去而伤到自己。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几乎没有节假日，无论对上级还是对下级，都保持尊敬谦虚的态度，对任何人都一样，既不过分也不欠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他作风始终如一，只公干不私交。所以政治风波来临，他总能不偏不倚的面对一切是非，之前不见风使舵，之后也不会势利从事，以不变应万变。所以，温家宝的一身正气，竟似武林高手中的无招胜有招，让对手根本找不到破解的招数，最终站稳脚跟成就一番霸业。

总结其历程可以这么说，温家宝的脱颖而出，成功秘诀就在于善于抓住机遇，也很会以谋制胜。

1986 年 5 月，只当了不到七个月中办副主任的温家宝，就接替王兆国升任主任。此时，温家宝还不满 44 岁。然而，这一年中南海发生的权斗，已让温家宝感受到中国政治争斗的残酷性，尤其是目睹了自己的“恩人”胡耀邦下台的整个经过，他只能如履薄冰地应对着中南海难以捉摸的政治风云变化。

对于胡耀邦的下台，香港《亚洲周刊》这样评论称：在中国拨乱反正、平反冤狱、改革开放的史册上，胡耀邦作为有功之臣、有恩之人，是当之无

愧、毫无疑义的。中国民众都不会忘记，在“四人帮”垮台、“凡是派”当道、政治情势阴晴不定的时刻，为争取邓小平复出、为背负“叛徒”污名的彭真、薄一波等中共元老伸冤，胡耀邦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更冒着党内任何人都不曾遇到、危及政治生命的巨大风险。

但是，在 1986 年底及 1987 年初，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却与薄一波、彭真和王震等连手，将党总书记胡耀邦赶下台。邓小平、胡耀邦这对延安年代的师生、战争中的上下级、文革时的难兄难弟、拨乱反正的并肩战友，最终在中共是否要落实民主政治的争议中分道扬镳。

导致胡耀邦下台的原因虽然复杂，但据中国著名记者胡应南研究发现，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是“邓小平是否全退”的争议。问题是，胡耀邦当时的总书记地位是在中央全会上产生的，要罢免，也应按正常程序，由中央全会作出决议。可是，胡耀邦的政治命运却由师出无名、所谓的党内“民主生活会”、几个政治老人拍板决定，党内产生质疑，许多党员都认为不合法。

被禁出版的官方《胡耀邦传》透露，1986 年 5 月，邓小平约胡耀邦到家中谈论中共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说：“我已年过 70 了，十三大一定要下来。”邓小平说：“我、陈云、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而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

同年 8 月 22 日，邓小平过 81 岁生日，在北戴河摆了几桌酒席，表示在两年后的中共十三大上全退。胡耀邦信以为真，在与香港记者陆铿交谈时将邓要退休的消息透露了，不料引起轩然大波。

同年 10 月，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党中央领导班子要不要年轻化，已不再是口头上讨论的问题，而是必须马上着手实行。如果说过去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含糊，不太明确，容易使人产生误会的话，那么，

今天我就十分具体和坦白的讲，我赞成小平同志带头退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头。只要小平同志退，别的老同志的工作就好做。我的总书记任期满了，也下来，充分给年轻的同志让路。”

胡耀邦讲话后，邓小平没有任何表示，但神情严峻。胡耀邦的讲话得到了人大委员长万里、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得志、人大副委员长聂荣臻、倪志福和国家副主席乌兰夫的赞同。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还在会上发表了支持胡耀邦的专门讲话。

但中共元老王震却被激怒，说：“你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权威，承认不承认小平是我们党的最高权威。”

万里这时插话说：“王老啊，你不要激动。要小平同志掌舵，我没有意见。我只是想纠正一下，我们要树立权威，不是个人，而是集体。民主才是我们的最高权威。”事后，邓小平曾问万里：“耀邦为何偏要我下？”万里答：“可能是失言。”邓小平说：“要树自己。”万里说：“耀邦不是那种人。”

从此以后，胡耀邦的权力开始被削弱，他失去了中共十三大的人事主导权。这个人事权居然交给了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在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邓小平安排由薄一波等七人组成的小组，分头找有关人员等征求十三大的人事安排意见，尤其征求对总书记胡耀邦的意见。

同年 11 月，由安徽中国科技大学开始的学潮蔓延至北京。12 月 23 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千多名学生与校长、党委书记辩论民主问题，并且上街游行。学潮有扩大的趋势，给中共高层“倒胡耀邦”行动找到了借口。

12 月 30 日，胡耀邦打算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书记处拿出的关于处理学潮的意见。邓小平不同意开会，并要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点谈话。邓认为学生运动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

果”，并责问胡耀邦“你难道没有责任？”胡耀邦回答说：“我保留我的意见。”

邓小平说：“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马上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邓还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仅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

1987 年元月初，北京学潮进一步发酵，北大学生烧了《北京日报》，指它为“造谣”的报纸，这一场面激怒了不知反思自己的中共“左派”。10 日，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主持的“民主生活会”在中南海召开。薄一波一上来就要胡耀邦作检讨。

薄一波说：“胡耀邦整天到处乱跑，全国两千多个县，你都快跑遍了，你是党的主席、副主席、总书记中能跑的最高纪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玩水，哗众取宠。”

杨尚昆说：“胡耀邦，你如果想要亡党亡国的话，你就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结成联盟吧。”王震则说：“你胡耀邦要是不愿意和我们走的话，你就不必呆在这里了。”宋任穷说：“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胡耀邦对待邓小平的态度。”

有充分准备的邓力群对胡耀邦作长达五、六小时的批判发言。连续多天的“生活会”上，发言者矛头都指向胡耀邦，斥责他只讲“反左”，不讲反右。薄一波、彭真要求胡耀邦辞职，王震表示：“薄一波、彭真代表了我们大多数的意见。”面对如此场面，习仲勋忍无可忍，指着薄一波等人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吗？”说着说着，习仲勋激动起来，说：“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违反党的原则。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做法！”胡耀邦没让习仲勋说完，就站起来劝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

1 月 15 日最后一次“生活会”散后，胡耀邦出门坐在台阶上大哭。田纪云

默默站在旁边，久久不愿离去。万里回到家也难抑心中不平：“耀邦没有错。”为了安慰胡耀邦，万里叫厨师炖了一锅胡最喜欢吃的狗肉送到胡家。“生活会”开过不久，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他回家对夫人李昭说：“我没有错，顾全大局，我只能辞职。”

其实，胡耀邦对罢免总书记并非无精神准备，提醒者也不乏其人。1987年的元旦来临，邓小平在家中与薄一波等人商量。听到风声后，习仲勋对胡耀邦说：“耀邦，我为你担心啊。”

赵紫阳也提醒胡耀邦“还是马上找小平同志谈一谈，向他承认错误。检讨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争取主动为好”。胡耀邦说：“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我检讨什么？”赵紫阳急了，“你还是尽快向小平同志认个错，越快越好，过几天就晚了”！

胡耀邦终于听了赵紫阳的劝说，于第二天来到了邓小平家。邓先是为耀邦评功摆好，大讲成绩。谈到思想分歧，邓摆摆手说：“那是工作的正常范围，我们没有必要再纠缠了。”

邓小平继续说：“我打算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有什么问题，大家摆在桌面上摊，好好沟通一下思想嘛。”临走时，邓小平的手和胡耀邦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但这一刻他们彼此都明白：这是政治上最后的道别！

胡耀邦下台，温家宝为何未受牵连？

在胡耀邦下台赵紫阳接任总书记职务后，在元老威逼下，赵紫阳只好对胡耀邦的组织路线进行一定规模的调整，待陈云亲自提名的宋平接任中组部长职务后，立刻以“补充地方领导工作经验”的借口，王兆国被外放到福建省，离开了中央权力核心。

那么，胡耀邦下台，温家宝为何未受牵连？据认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和陈云等政治老人认为，温家宝长期以来一以贯之具有敬业精神，源于对"党"忠诚而不是源自对胡耀邦个人的忠诚。

《温家宝传》作者高新在追踪温家宝的过程中，听一位被访问过的人士透露他知道的情况：在书记处会议上先就温家宝接任中办主任职务的建议统一了意见，向杨尚昆"征求意见"，杨表示他本人认为"是个合适的人选"，也表示要把书记处的意见向小平同志汇报一下。从邓小平那里的回话的大意是：可以试一试，如果称职就继续做下去，这个岗位的负责人最好不要像前几年那样换得太勤。

温家宝当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时，王兆国还保留着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先后担任中办主任的杨尚昆、姚依林、胡启立、乔石也都是中共十二届政治局委员或书记处书记，也就是说，从温家宝取代王兆国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 1986 年 5 月，至 1987 年 10 月中共十三大召开之间，温家宝的六位前任，除了汪东兴已成为"党内路线斗争"的牺牲品，另外五位都是党中央在位的领导成员，温家宝接任中办主任职务之后，对包括汪东兴、王兆国等人的工作得失、政治教训，自然也会作为自己的借鉴。

中办历任主任中多半都只是为一位党的领袖服务，只有汪东兴服务过两任党主席，而温家宝历经过三任党的总书记。高新曾分析过，在中办主任岗位上为一位以上党的最高负责人服务过，是温家宝与汪东兴唯一的共同点，"而他们之间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汪东兴当年所服务的两任党主席之间是继承和被继承的关系，而温家宝所服务的三任党总书记，都是以后任对前任的政治否定为就职前提"。

也有评论认为，温家宝并未因胡下台而受连累的另一关键原因是，温家

宝并非在拥戴胡耀邦“称帝”的基础上产生，而是因邓小平成为中共领导核心之后产生的，所以温家宝这位中办主任自然对邓小平不具政治上的威胁性。如果把邓小平搬倒华国锋过程中对中央办公厅的清洗比喻成“清君侧”，那么日后“废胡”过程中之所以没有必要“清君侧”，说到底，是因为胡耀邦根本还不是“君”。

毛泽东、华国锋时代的中办主任平时工作都围绕着党主席一人，而整个邓小平时代，总书记并不是党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这就决定了中办主任的服务对象不会集中在总书记一人身上。

中办人士评价温家宝：在主管中办期间，份内的工作能完成得让人无可挑剔，份外的事情不但能做到绝不插手，而且不该过问的绝不过问。温家宝之所以能够安然度过七年时光，他对杨德中的充分尊重和在工作中从不越位，无疑是重要因素。

邓小平时代，顺应最高决策层的“党”“枪”畸形关系，整个中办系统传统上的“文”、“武”两大部分也被截然分开了，“文”的部分属于中办主任的权限范围；“武”的部分则由中央军委任命的杨德中负责，只听命于中央军委的指挥。编制设在中央办公厅的中央保健委员会、中央办公厅下属的与保密工作有直接关联的机要局、机要交通局、中央档案馆等部门，事实上都划到“武”的一边，被杨德中以第一副主任身份所掌握。

此外，温家宝虽然位居中办主任，但下属机构能够由他掌管的只是秘书局、中直管理局、人事局、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特别会计室等部门，其权力范围远不像外界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朱厚泽遭贬，赵紫阳看中了温家宝哪一点？

朱厚泽，胡耀邦亲自指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在胡耀邦倒台时首先遭到处理。

提到朱厚泽，这位被称为得到胡耀邦真传的“三宽部长”，一直赢得舆论的称赞。朱厚泽（1931 年 1 月－2010 年 5 月 9 日），贵州织金人，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 年在四清运动中被开除党籍、下放劳动。1978 年平反后，曾任中共贵阳市委书记等职。1983 年任贵州省委书记，负责经济建设。

明镜出版社《外参》月刊创刊号刊登高瑜《他才是胡耀邦的传人——送别朱厚泽先生》一文回忆说，朱厚泽是胡耀邦担任党校第一副校长时期青干班的学员，是经过当时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青干局局长李锐考核、推荐，1982 年十二大被胡耀邦选择的西南诸侯，从市的副书记位置直接提拔到省委书记处书记，1985 年担任贵州省一把手。李锐是被陈云安排在中组部的重要职务上的，交代给他的任务是监视胡耀邦，结果成为胡耀邦的挚友和好助手。1985 年 7 月胡耀邦把朱厚泽带到北戴河，对党的婆婆和中央大员们说：“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宣传部长。”朱是接替“左王”邓力群的。

朱厚泽把来北京当中宣部部长比喻为“跳火坑”。他低调，谨慎，半年之后提出“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就遭致邓力群的四处围剿。“三宽”受到理论务虚派和整个知识界的热烈欢迎，朱厚泽立刻有了“三宽部长”的美名。但是乔石给他打来电话：“厚泽，你那个‘宽’的文章不要再做了。”

胡耀邦刚一下台，紧接着朱厚泽便遭到处理，他在王兆国、邓力群等的

陪同下，向中宣部全体人员告别，他向大家表示感谢，他说："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无法工作。"这位中共历史上最短命的中宣部长没有检查，最后的话："至于对我这一年多来所做的工作怎么看，让历史去作结论吧。"赢得潮水一样的掌声。

十三大之后，赵紫阳调朱厚泽到总工会担任一把手，代替倪志福。朱厚泽主动推辞，只当了二把手——第一书记。1989 年学生运动中，全国总工会向北京红十字协会捐了十万元，当时是倪志福决定，朱厚泽外出。六四之后审查，责任落在朱厚泽身上，他没有分辩，承担责任，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实际是保护了倪志福，使得他又当了几年政治局委员。

学者丁东听说，胡耀邦生前最后的讲话中说过："我辞职对于自己没有什么，主要是对不起两个人：朱厚泽、白纪年。因为朱厚泽是可以当总书记的一个人。"可见胡耀邦对朱厚泽的器重。白纪年是陕西省委书记，该省曾是胡耀邦搞党内民主选举的试点，白纪年作为副省长，在全省厅局级干部民主评议中得票最高，十二大之后就直接提拔到省委书记位置，胡耀邦下台之后他也下台。

高瑜指出，胡耀邦中意培养的还有一个人是吴明瑜。胡耀邦看重朱厚泽的是思想能力，看中吴明瑜的是实干能力。吴明瑜是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时候就选中的人才，很年轻就提拔到局级干部，为中国科技发展，知识分子问题作了很多工作。

胡耀邦所看中和提拔的人，在其下台后纷纷跟着"遭殃"，但温家宝却是个例外。

宗海仁在《第四代》中强调：温家宝是由胡耀邦提名任中办主任的，尽

管他不来自共青团系统，不像王兆国那样有特别浓厚的“胡派”色彩，但不少人仍然认为他是胡的亲信。

与王兆国和朱厚泽等“胡派”大将相比，温家宝的地位依旧。为什么？据宗海仁披露，在批评胡耀邦的民主生活会上，温家宝几乎没有对胡耀邦进行指责，而是着重强调了他自己应该如何提高认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温家宝的此番言论，并没有引来各方面的批评。即使像胡乔木、邓力群这些“左派”人物，也对温家宝没有意见，查阅温家宝的讲话以及所参加的一些活动，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言论和倾向。更何况，在日常工作中，温家宝几乎对每一位政治局成员、书记处成员都表示了足够的尊敬，他不仅对胡耀邦、习仲勋好，对胡乔木、邓力群也很尊重。

同时，温家宝对中央办公厅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表现出平易近人、不摆架子的作风。一个平常从未树敌，又有深厚群众基础，工作又从未被人抓住把柄的人，是很难被人击倒的。因此，胡耀邦事件不仅没有使温家宝“自毁前程”，反而稳固了温家宝在中央办公厅的地位。

宗海仁指出，赵紫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温家宝继续留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一方面表明了赵紫阳的政治智慧，另一方面也说明，赵紫阳从胡耀邦下台中看到了温家宝的忠诚，更看到了温家宝恪尽职责、坚守岗位的踏实作风。

这期间，温家宝参加了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工作，参与设计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温家宝参加了中共十三大的筹备工作，参与了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主持工作，并以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副秘书长的身份负责大会的日常事务。1987 年 11 月初，距胡耀邦被迫辞职不到 10 个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温家宝升任中共中央书记

处候补书记，同时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

在追随赵紫阳的日子里，温家宝眼光敏锐、作风稳重、工作勤奋，平易近人，对经济工作和自然科学的兴趣不减，经常思考一些宏观的、长远的政治经济问题，捕捉、分析并回馈一些重大信息。所有这些，令赵紫阳非常满意。

王兆国下台是因与胡耀邦“距离太近”

胡耀邦倒了，与胡耀邦关系亲近的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审查——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习仲勋又过起了比较清闲的生活，没有多少事可以管了；

王兆国，这位胡派亲信，不像胡启立那样态度坚决地与胡耀邦划清界线，被外派福建。

1987 年 8 月，此时还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兆国到福建省委报到，陪同前往的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向省委和省政府的干部大会宣布中央任命：王兆国同志为福建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1987 年 9 月，中共中央宣布将时任福建省省长胡平调离，任命王兆国为福建省副省长、代理省长。

高新指出，此时，离中共十三大召开仅有一个月的时间，凡熟谙中共高层人事运作规律的人，一眼就看明白了王兆国此时被调离中央机关，主要原因就是让比较体面地在十三大上“自行中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在中共执政史上，如此安排在政治上失意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方式，已经不是第一回。

“文革”前夜，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常委第一书记杨尚昆被彻底打倒之前，先是被贬至广东，屈就了几个月时间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有趣的是，时隔 21 年之后，正是这位杨尚昆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传达了邓小平的旨意：“王兆国的职务看来是要动一动了”。

1987 年 10 月 25 日中共十三大召开，王兆国和温家宝均被安排为大会主席团成员，王兆国还有幸与邓小平等全部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及书记处书记一同被安排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但是，大会主席团的副秘书长中有温家宝的大名，王兆国却不在其列（秘书长为胡启立）。

接下来，王兆国只是被安排为十三届中央委员，未能再进中央书记处。

在中共十三大上，上届中央书记成员中，除了确因年龄关系“退居二线”者，只有王兆国和郝建秀的政治地位被降格为普通中央委员，还有邓力群是因为在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过程中落选，其它则悉数进入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而郝建秀被政治降格的原因同样是与胡耀邦“距离太近”，或“眼里只有胡耀邦”的缘故。

1988 年 1 月，王兆国在福建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会议上正式当选为福建省省长。

王兆国在十三大召开之前黯然离开中南海勤政殿（中央书记处办公地点）后，当然就不再行使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书记的职权。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并没有特别宣布免去他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书记职务，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已经内定要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改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简称中直工委），作为中共中央派出机构，领导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的工作。后者与前者相比，表面上看是只多了两个字，但重要区

别在于前者如同各地方党委一样，其领导成员正常换届时是采用代表大会的选举形式，而后者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负责人是采取任命制。

1988 年 2 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改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为温家宝。

就在王兆国离开中南海的第二个月，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于十三大召开之前的 1987 年 9 月 14 日宣布撤销邓力群兼任主任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十三大召开之后的 1987 年 12 月，宣布成立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任命鲍彤为研究室主任，周杰、贺光辉为班主任。

如此一来，就如同不需要特别宣布免去王兆国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职务一样，也就不需要特别宣布免去邓力群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职务。

温家宝得到胡启立、乔石的信任

如果说十三大之前的温家宝还是处在被考验阶段的话，那么他在十三大上进入中央领导层，标志着已经顺利通过了对他的政治考验。他能在十三大上进入中央领导层，除了邓小平、陈云等政治元老，以及代邓小平在台前“摄政”的杨尚昆的因素，胡启立、乔石等人所起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邓小平对温家宝，没有多少直接接触，他对温能从认可到信任，杨尚昆、王瑞林及杨德中所起到的作用可想而知。

高新在其《温家宝传》一书中，特别点出乔石对于温家宝晋升的重要作用。他说，作为中央书记处的候补书记，温家宝是在胡启立领导之下，但胡启立在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同时，在政治局常委会内的分工是主管意识形态，乔石在政治局常委会内的分工则包括了中央党务系统的几大部类。如此一来，温家宝在日常工作上应该是与乔石之间的直接往来更多一些。而二人之间除工作之外共同语言之一，便是他们曾经先后为其挥洒过汗水，奉献过青春的甘肃省酒泉地区。

高新指出，温家宝还在天津就读南开中学时，甘肃酒泉地区发现的铁矿

床即被认为有长期开采价值，陆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万建设大军云集，开始了酒泉钢铁公司的基础建设工程，原在鞍山钢铁公司担任技术处长的乔石奉命前往，出任酒泉钢铁公司设计院和研究院院长。

1959 年开始大饥荒，酒钢坚持到 1961 年初，上级终于命令下马。乔石先是到西安担任酒泉钢铁公司陕西工程管理处党委书记，1962 年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即被他 40 年代在上海从事学生地下党工作的老上级吴学谦举荐进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陆续升迁至副局长、局长，副部长、部长。1982 年 9 月，他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出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从此进入中央决策层。

温家宝除工作能力和水平给上司和同事都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稳重"让此前几任中办主任，包括杨尚昆、姚依林、胡启立和乔石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信任。乔石当年在酒泉地区工作的时间不足温家宝一半，对工作条件的艰苦已有了深刻体会。而温家宝当年在那里任劳任怨，坚持工作了十几年，乔石对此非常感慨。

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时代，乔石和胡启立都被认为是胡耀邦提拔的人，而温家宝从进入中办到接替王兆国的职务，也曾被认为是"耀邦的人"。但事实上胡耀邦倒台后此三人均晋升。

不过，宗海仁指出，曾被胡耀邦视为可靠接班人的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在胡耀邦倒台时，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仕途，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上，公开批评指责胡耀邦，成为当初批判胡耀邦态度最坚决、旗帜最鲜明者之一，为此胡启立保住了自己的职位。

1929 年 10 月出生的胡启立，50 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机械系学习；并在大学毕业后留校，从事学生、共青团委工作；曾出任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胡启立的工作，受到时任团中央负责人胡耀邦的赏识。1955 年 8 月，在当选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后，胡启立又受到毛泽东的接见；翌年，他即被调入共青团中央联络部工作；曾担任驻捷克布拉格国际学生联合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1961 年，在胡耀邦的推荐下，共青团九届三次会议破格增选胡启立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在 1966 年 8 月曾严厉批评共青团中央，称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等负责人犯了错误。胡启立随即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直到 1972 年才被恢复工作。此后，他历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

县委副书记，中共固原地委副书记，宁夏自治区委办公厅主任等职。1977 年，胡启立被调回北京，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一年后，又回到共青团中央，出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

1980 年，随着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启立迅速成为当时中国政坛上的一颗新星。他于 1980 年 6 月出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市长；1982 年 4 月，升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同时，在当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后又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正式进入中共领导层。在 1985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中共高层人事大调整，一批元老退休，胡启立、田纪云、乔石、李鹏等"新秀"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胡耀邦下台后，胡启立不但未受到影响，反而在 1987 年 11 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在五位常委中，排名第四；同时还兼任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媒体评论认为，当时年富力强的胡启立有力成为中共的第三代接班人。

1989 年六四事件前后，因同情学生运动，胡启立与阎明复、芮杏文等中共高级领导，随总书记赵紫阳下台。胡启立被免去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但仍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资格。

六四前温家宝紧跟赵紫阳身后扮演什么角色

1989 年六四事件发生时，温家宝成了中南海最忙的人，每天平均只能睡两三个小时。除了亲自在第一线参与指挥，还要挤时间参加各种不同场合的会议，更要及时处理一些最敏感的信息。他协助赵紫阳参与处理了 5 月 20 日宣布北京戒严前一些最重要的工作。

杨韵、方延鸿在《内阁新三角》一书中指出：当时人们为什么会对温家宝抱以莫大的期望？是因为那一个历史的瞬间——

1989 年 5 月 19 日凌晨，全中国、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都看到那个令人灵魂颤栗的场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看望已经绝食数天的学生。赵紫阳手举着一只半导体喇叭，喉咙嘶哑地苦劝着学生爱

惜身体，停止绝食；而他的身后，是默默无言、一脸严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

当时的报纸上都注销了这张历史性的照片。不仅广场上大学生和新闻界人士，而且许多中共党内人士也都认为，这意味着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在中共高层的分道扬镳中毅然作出了生死选择：站到了赵紫阳一边。

其后形势急转直下：六四清场以后，邓小平、杨尚昆和李鹏凭借武力战胜了党内对手，镇压了学生运动，赵紫阳被撤销党内职务并软禁，他的部下要么"抓进去"，要么"逃出去"，人们很自然地捏了一把汗：温家宝这次也会"倒大楣"了！

但是让人们惊诧不已的是，温家宝居然安然无恙——既没有锒铛入狱，也没有摘去乌纱。虽然后来的仕途有点坎坷，但是在那场政坛地震中基本上可以算是全身而退。这是怎么回事呢？

很长时间人们没有解开这个疑团；不过，也从那个永世难忘的场景，而对温家宝留下了一份希冀。有人甚至认为，"蒙混过了关"的温家宝，将来会有一天为他的首长赵紫阳平反、恢复名誉。

这当然是彻头彻尾的误解。直到中共高层人事专家高新的《温家宝传》出版，披露当年这一段幕后秘辛，人们才恍然大悟。

高新说："殊不知温家宝这次陪同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给他布置的任务。当时，政治局常委会刚刚结束，因为赵紫阳坚持要到广场看望学生，政治局常委会才临时决定李鹏也去。于是，当晚列席常委会的中办主任温家宝负责陪同赵紫阳；国务院办公厅秘书长罗干负责陪同李鹏。"

也就是说，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温家宝随同前往，并不表明他在党内势不两立的争论当中选边站，支持赵紫阳的态度；而是一种职务行为——身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责要求必须陪同中共中央总书记。

当然，赵紫阳和李鹏在广场上向大学生们讲话的口气，截然不同。人们因此而同情赵而憎恶李，更因之而对前者就爱屋及乌，对后者也难免“恨屋及乌”。不过政治人物不像市井小民，高新认为，就象李鹏的强硬口气并不一定就代表罗干一样，邓小平等人也不会因为赵紫阳当时在广场的“纵容动乱”的态度而迁怒于温家宝。

高新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需要强调，那就是 1989 年春夏之交的学潮和“动乱”过程中，当中共中央出现了所谓“两个声音”的时候，温家宝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身份，两次主持拟定反对动乱的紧急通知，要求中央直属机关的各党委认真组织学习李鹏和杨尚昆的重要讲话，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迅速结束动乱的指示，并将不准参与示威，不准搞声援活动，甚至不准上街围观的通知精神迅速通知到每一个共产党员，并认真检查贯彻执行情况。

《温家宝传》中写道：如此及时表态，使得六四之后的李鹏等人即使真如外界所传对温家宝极不感冒，也没有将政治清查对象波及到温家宝身上的过硬把柄。

赵紫阳录音回忆披露温家宝劝阻赵开会反击

事过多年之后，更多的事实披露出来。

据熟悉中共高层内情的人士透露，六四以后，温家宝为了自保，还写过一些对赵紫阳不利的揭发材料。事后看来，这些材料是“大可不必写”的。

赵紫阳的某位亲属曾经说过，他们家人对温家宝没有什么话好说：在赵紫阳被软禁期间，温家宝从来没有为他遭受的不公境遇说过哪怕一个字；直到赵紫阳病重、逝世，已经当上中共第三号人物的温家宝，从来没有亲自来看过一次，或者委托人来看过一次，更没有为赵紫阳的政治名誉、为他和家人改善境遇出过任何力——赵紫阳毕竟曾经是他的顶头上司啊。知情人感慨地说，温家宝能毫不犹豫地握住艾滋病人的手，却不能来握住他的前任、他的老上级赵紫阳的手——赵紫阳比艾滋病人还可怕啊！赵紫阳的亲属对温家宝感到寒心。

党和国家的“利益”高于私人感情，或许这就是中共“革命队伍”中的常态，赵紫阳及其家属在党内外残酷斗争中经历过几十年，应该司空见惯，大可不必寒心。不过，即使如此，如果与同样是“革命队伍”中的人相比，他们还是感到温家宝态度如此之冷如铁石，令人费解。要知道，即使是与赵紫阳势同水火的政敌邓力群，在赵紫阳去世之后还第一个亲自前往吊唁，表示哀悼之情呢。

在赵紫阳的问题上，温家宝的得分甚至还比不上习近平——当年与赵紫阳同处改革派阵营的战友习仲勋的遗孀齐心女士，在得知赵紫阳逝世后立即给赵家送去花圈，挽联上写着“携子女同挽”，“子女”就包括了习近平，至少习近平是没有表示反对的。

正是从与这些政敌和战友（及其亲属）的对比，赵紫阳的不少亲属对温家宝很难谅解。

在胡耀邦去世之后，香港《明报》曾有一篇报导援引一些知情人士的话说：温家宝初到中办，甚受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赏识，提拔温家宝接任中办主任，可以说完全将他当成自己人。但胡耀邦被免职后，按照有关规定，其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和保卫待遇都要随之降低规格。1987 年 1 月，"正是温家宝代表中共中央向胡耀邦一家宣布中共高层的有关决定。据指出，温家宝的表情相当冷漠，令胡家人十分反感。胡耀邦在 89 年 4 月因心脏病突发去世，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中共高层决定低调处理，亦是温家宝奉命到胡家宣布中央的有关决定，其表情也一如 1987 年时的冷漠，全无任何同情表示，胡家人也因此觉得他简直不近人情。"

温家宝对赵紫阳在天安门学生绝食事件中的态度，对赵紫阳受审查软禁期间的态度，与温家宝本人的价值理念，这二者虽然有联系，但并不能完全画等号。温家宝对于以民主、自由和法治为标志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究竟抱什么态度呢？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们必须从温家宝的人生起伏和政坛沉浮中寻找答案。

根据赵紫阳生前录音自述整理出版的回忆录《改革历程》2009 年 5 月面世。书中首次披露 1989 年 5 月 19 日北京戒严后，尚未被撤职的赵紫阳与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的一些互动，透露了当时温家宝的一些无奈，以及他劝阻赵紫阳召开政治局会议的过程。

这本厚达 384 页的回忆录，详尽披露很多 1980 至 1990 年代中共内部的权斗秘辛，也完整呈现了 1989 年六四前后中共内部各种纷争和角力。

赵紫阳于回忆录披露，1989 年 5 月 19 日凌晨探望学生后，他因拒绝出

席同日宣布戒严的大会，请假三天，其间既无人通知他被免职，亦无人找他联系工作，“重要的信息管道被切断了，把我和外界隔离了”。

赵紫阳通过其它管道听说，时任总理李鹏、国家主席杨尚昆、副总理姚依林和中央组织部长宋平等人分别召开各部门会议，召集各地方领导人进京“打招呼”，宣布赵的“罪行”等。赵紫阳认为这“都是违反《党章》的”，因此他找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建议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

“当时温家宝说，中办实质上已被撇在一边了，现在所有这些部署都没有通过中办，一切活动都是李鹏、杨尚昆另外安排的，并不通过中办。如果我一定要开会，中办也可以发通知，但他感到后果会很不好，希望我慎重考虑”。后来赵紫阳就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尽管如此，后来在赵紫阳的罪名中，还是有一条“分裂党”。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并未提及温家宝在那次探望绝食学生的表现，但提到了李鹏实际上也有一同去到天安门广场，“但他当时非常害怕，到广场不到一会儿就溜之大吉了”。自 5 月 17 日在邓小平家中开会决定调兵进京戒严后，李鹏就有许多不正常举动，“无论是去医院慰问还是去广场看望学生，他一再阻止我去。我去了一起下车，他一反惯例抢先走在我的前面。他还让人给摄影记者打招呼（事后有人告诉我），叫记者不要拍我的镜头，说以免人事变动后被动。从 5 月 17 日晚到 19 日，有关戒严的事什么情况也没告诉我。19 日李鹏和学生对话，我是看电视才知道的”。

由此可见，从 5 月 17 日邓家会议之后，赵紫阳已被实质夺权了。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还披露了已故国家主席、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对待戒严的反复态度。在赵紫阳访问朝鲜期间，政治局常委碰头讨论学潮时，曾有人提出过戒严问题，“当时受到杨尚昆的严厉批评，说首都戒严，如何向全世界

交代？”赵紫阳感觉在邓小平决定戒严以前，杨的态度是较温和的。但在 5 月 17 日邓小平家开会时，杨的态度又出现 180 度变化，“他说廖汉生（退役上将，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主张戒严，是不是可以考虑戒严？本来尚昆一直是反对戒严的，这时他转述廖汉生的主张，实际上他改变了主意”。赵紫阳指杨尚昆“在这个问题上起了不好的作用”。最后邓小平拍板调兵进京，实施戒严，最终酿成六四惨剧。

温家宝对曾庆红的分工让江泽民很满意

江泽民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温家宝像对待两位前任一样的对待他，既不紧跟，也不疏离。宗海仁说，在江泽民熟悉工作的前半年，温家宝总是如影随形地跟着他，带他去拜访中共元老，陪同他到中央各部门视察，详细地向他介绍中共中央各部门的机构职能，主动地与国务院进行工作沟通，等等。当然，最重要的是温家宝处理好了与曾庆红的关系。

库恩在《江泽民传》中提到了 1989 年 8 月初，江泽民当上总书记后不久就前往上海视察，由朱镕基、吴邦国、陈至立陪同。后来，所有这些人最后都去了北京，在中央担任显要职务。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江泽民作了第一次职务任命，将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曾庆红任命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副部级）。这是个起协调作用的关键职位，具有很大影响。

库恩认为，江泽民的这一选择非常明智，曾庆红具有机智的政治敏锐感、完美的政治背景以及个人关系：他的父亲曾是军队指挥官、党的高级领导和政府高级官员，在华东很有影响，尤其在上海。汪道涵也是其父的门生之一。他的母亲曾是一位早期的党的工作，是参加过长征而幸存下来的少数女性之一，并曾任一所幼儿园园长，许多高干子女都曾在这家幼儿园就读。事实证

明，不论是在行政工作还是在政治策略上面，曾庆红对江的帮助都是无可估量的。

曾庆红是江泽民就任总书记时唯一从上海带入中南海的人。《第四代》介绍说，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除了杨德中、周杰、王瑞林外，还有徐瑞新。当时徐瑞新 48 岁，是所有副主任中最年轻的，也是温家宝最主要的助手，直接分管中央办公厅最核心的部门中办秘书局。徐自参加工作以来就一直在中南海工作，一度在杨尚昆办公室工作，与杨尚昆有着非常紧密而亲近的关系，1984 年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1987 年提升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庆红到任后，如何协调好徐瑞新、曾庆红的关系，直接涉及到温家宝与杨尚昆、江泽民的关系。

当时的杨尚昆一言九鼎，倍受江泽民尊重，所有重大事务江泽民都请示他。更重要的是，杨尚昆作为任职时间最长的老中办主任，对中央办公厅的日常运转了如指掌，更何况还有他极为器重的徐瑞新直接分管着中办秘书局。因此，协调好徐瑞新、曾庆红的关系需要温家宝拿出足够的政治智慧。

曾庆红比徐瑞新年长不足两岁，提升副部长的时间也比徐早不到两年，为了使徐、曾在工作中不发生冲突，温家宝对两人的工作分工作出了非常清晰的划分，徐瑞新继续分管中办秘书局，曾庆红负责中央办公厅的机构编制人事工作，主要协助江泽民展开工作，按照任职时间，让曾庆红排名在徐瑞新前面，但不是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尽管当时没有明确中央办公厅的常务副主任，但从工作性质看，徐瑞新实际上主持着中央办公厅的日常工作，而曾庆红则占了排名在徐之前的优势。因此，曾徐两人对此安排都表示满意，工作中也没有发生任何冲突。曾庆红通过分管机构编制人事工作，对中央办

公厅内部的机构运转有了清晰的了解，更由于将主要精力放在协助江泽民展开工作，使曾庆红与江泽民之间的交情已非任何人能够离间。温家宝对曾庆红的分工，令江泽民满意。

温家宝是明智的，他清楚地意识到，无论是曾庆红还是徐瑞新都将在时机成熟时接替他。他必须考虑新的出路，他越来越关注于经济事务了，渴望从党务中解脱出来。1992 年，对温家宝来说又是一次大的政治考验，先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不指名地严厉批评江泽民，警告江“不改革，就下台”，接着则是江泽民成功地发动“倒杨事件”，保住了自己在中共十四大的中央总书记职位。

无论是杨尚昆陪伴邓小平警告江泽民，还是江泽民最终迫使杨尚昆离开中国权力中心，温家宝总严守岗位，不参与任何一个圈子，既不偏杨也不偏江。像 1987 年中共十三大时一样，温家宝参加了中共十四大的筹备工作，参与了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主持工作。当 1992 年 9 月中共十四大召开之时，明知杨尚昆已失势，徐瑞新不久将被调离中央办公厅，但根据原有分工，温家宝仍然将大会秘书处的日常工作交由徐瑞新负责，对徐瑞新充满信任。虽然中共十四大使江泽民得势，但作为江心腹的曾庆红没有获得任何好处，曾既未负责筹备这次大会，也没有被列入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

在宗海仁看来，温家宝那种绵里藏针，含而不露，举重若轻，恪尽职守的鲜明性格特征，成就了他历经三任总书记而不倒，反而进一步上升。

温家宝与曾庆红相互尊重相得益彰

温家宝与曾庆红在中央办公厅共事的三年，用寫了《第四代》的宗海仁

的话描述：两人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得益彰。三年中，温家宝一直是曾庆红的领导，他为曾庆红创造了非常宽松的工作环境，给了曾庆红更多自由发挥的天地。

温家宝比曾庆红小三岁，深知曾的机警和胆魄，温认定曾是能干大事之人。曾也深谙温，认为温历经三任总书记而不倒必有过人智慧，所以，曾也非常尊重温。

因为工作关系，温家宝、曾庆红都得追随江泽民，一同随江泽民外出视察，一同随江泽民出席各种不同的会议。温家宝清楚，尽管自己位高于曾庆红，但曾庆红毕竟是江泽民最信得过的人，所以，与江泽民接触，温家宝始终保持着一种适当的距离，既让江泽民感觉到工作做得周到，又让曾庆红体会到并未与江泽民过于亲近。不管是外出还是开会，温家宝总有意使自己离江泽民远一些，让曾庆红与江泽民挨近些，在专列或者飞机上，温家宝更是如此。

比较温、曾两人的性格，最主要的共同点是：胸怀韬略，足智多谋，举重若轻，深谋远虑。

两人又有以下不同点：

温家宝思维严谨，思考缜密，处事周全，敢于礼让。曾庆红思想超前，思想解放，谈吐机智，富有幽默；

温家宝善于抓主要矛盾，善于化解矛盾，经常身体力行，处理问题对事不对人。曾庆红敢于冒险，富有胆识，不怕得罪人，敢作敢为；

温家宝谦虚谨慎，待人真诚，循规蹈矩，为人宽容；曾庆红胸怀城府，含而不露，厚此薄彼，难以捉摸；

温家宝博览群书，最终从党务转入政务；曾庆红精通明清历史，得治国之要览，以“治人”为第一要务，乐于政治权谋；

温家宝性情平和，甘于寂寞，看到老百姓困苦会当众落泪，极富同情心。曾庆红性格率直，愿与三教九流结为朋友，富有号召力、感染力，有相当一批追随者；

温家宝按规则行事，主张有序改革，考虑问题比较实际。曾庆红敢于违背传统，不安于现状，逆向思考问题，看问题切中要害；

温家宝忠厚老实，善于协调，宁折不弯，设身处地，在不损害重大利益

前提下，敢于作出让步或自我牺牲。曾庆红为人圆滑，处事精明，能屈能伸，为了达到既定目标，可以不惜一切努力去追求，决不轻易放弃；

温家宝没有野心，从不拉帮结派，是比胡锦涛还要少帮派色彩的人，广为各方所接受。曾庆红被看成是“上海帮”的主要成员、“太子党”的头领，他的身上的确具有浓厚的“派系”色彩，有人非常喜欢他，有人则对他恨之入骨。

从那几年党内的一些民意调查来看，似乎温家宝更受人喜欢一些。但是，比起温家宝，曾庆红的确更有闯劲、更有胆魄、更不怕得罪人。因此，宗海仁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不仅需要温家宝这样的务实者，同样需要像曾庆红那样的改革家。

江泽民时代温家宝“明升暗降”？

而温家宝和江泽民的关系，则是我们认识温家宝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

江泽民和温家宝是同一天进入党中央领导集体的——1987 年 10 月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作为诸侯代表，以上海市委书记身份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温家宝则被安排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每次政治局开全体会议，都是由温家宝领导下的中办秘书局会议处安排通知诸侯中的政治局委员，来自北京之外的政治局委员，也都是由中办安排接送和住宿。

这一迎来送往的杂务，按说温家宝若安排手下中办副主任甚至局长去张罗，江泽民等人也不致于“挑理”。然而凡事亲力亲为、力求万无一失是温家宝的特点，何况被接待的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所以，当时江泽民每次进京开会，温家宝只要人在北京，都尽力抽出身来亲自接送，其作风扎实细致，态度的谦恭随和，让江泽民印象深刻。

而江泽民之所以对温家宝给予政治信任，在高新看来，是因为党内高层

新一轮的政治斗争中，与温家宝完全不沾边。1992 年邓小平南巡，给江泽民带来政治危机，而后江泽民绝地反攻，利用邓小平担心六四翻盘的心理，一举在当年十四大上搞掉“杨家将”，在这整个过程中，温家宝都没有见风使舵。

众所周知，温家宝担任中办主任期间，中共高层安排了王瑞林以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解放军军纪委书记等身份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其用意，是为了政治局常委会与邓小平这位实际上的“领导核心”之间联络畅通。王瑞林的工资并不在中办领取，温家宝这位中办主任与王瑞林这位副主任，从来也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邓小平的整个南巡过程，完全是杨尚昆和王瑞林通过中央军委办公厅系统着手安排，而不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出面安排。正因为王瑞林从来不是温家宝的下属，他在温家宝面前无须受所谓“组织原则”约束，副主任有权不向主任请示和汇报。中办系统如此扭曲的人事结构，反而成全了温家宝，使他与江泽民之间不致于有任何芥蒂。

在十四届一中全会结束，江泽民连任成功、稳住阵脚之后，人事布署从党内到军内同时开始。

在这次全会上，温家宝的头衔，去掉了一个“候补”，又增加了一个“候补”——他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被安排成政治局候补委员。1993 年 3 月，中共中央作出了让人感觉不无唐突的决定：“温家宝同志不再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同时也宣布免去王瑞林中办副主任职务。在十四大上连中央候补委员都没有被安排的中办副主任曾庆红，接替温家宝担任中办主任。

这年 3 月八届人大刚刚开过，中共中央又宣布，由温家宝出任朱镕基任组长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显然，这一突如其来的高层人事变动，是在十四大召开之后才作出的，

绕开了全体党代表，否则无法解释，何以在十四大上对曾庆红连个中央候补委员也不安排？在中共历史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居然连个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是很少见的——虽然温家宝在 1986 年 4 月接任办公厅主任时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但当时有个特定条件：前中办主任王兆国栽了跟斗。（《温家宝全传》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温家宝"靠边站"是给曾庆红腾位子？

我们无从揣度温家宝当时内心感受如何。外界各种分析中，占主流的一种意见，是认为这是给江泽民的大红人曾庆红腾位子，温家宝从此失势。

也难怪外界会这么想。温家宝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好像是受到重用，却又被安排从事一项没有公开职务的工作，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明升暗降"是最常见的策略之一，"取实予虚"更是十分有效的制胜之方。这种中共执政史上超乎寻常的工作分配方法自然启人联想。

在中共政权的最高层领导机构内，有一大堆常设和非常设的委员会、领导小组，比如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中共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等等。具体名称前面冠以"中央"二字的"领导小组"，均是党的系统的常设机构，政治位阶实际上要高于党中央机关的各个部，特别是由党的总书记或其它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组长的几个领导小组。这一类领导小组的常设机关——某某领导小组办公室，均是正部级单位。

温家宝任新职的奇特之处还在于，中共党内这些领导小组，无论是成立时间还是其负责人的更迭异动，从来都不对外宣布，但温家宝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后，官方媒体却受权宣布他以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兼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另外，这类党内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从来都是由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人兼任，比如江泽民当时就兼任外事领导小组和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职务 1994 年交朱镕基兼任），胡锦涛兼任党建领导小组组长，等等，还从来没有过由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不干别的，专任副

组长的。

让各界人士纳闷的更是：既然声称"进一步重视农业"，何不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内找一名熟悉农业，至少是在其从政资历中接触过农业的人，出任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而这一届班子中，没有比温家宝与农业更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了：他出生于大城市，专学地质，对农业从未有过半天的接触。

还有一条说不通的，是没有在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安排温家宝出任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这次会议上产生的国务院领导班子，李鹏是总理，朱镕基是常务副总理，主管全盘经济要务，钱其琛分管外事，邹家华分管工业口，李岚清分管对外经贸以及科、教、文、体、卫；八名级别相当于准副总理的国务委员中，也没有一人是分管农业。这实在不合情理：中国是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成堆，国务院却没有一名副总理专管农业，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温家宝，在国务院内却没被安排任何职位。

不管怎样，温家宝干一行学一行，着手钻研农业了。1993 年年初至年中，《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的数篇关于进一步重视农业工作的文章，都由温家宝主持起草。

又过了一年，1994 年，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双双上调中央书记处，次年双双增补为国务院副总理，前者分管工业，后者分管农业。姜春云的党内职务被安排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排名在温家宝之前。

如此之多的迹象，怎么能不让外界相信：交出中办主任大权之后的温家宝，实际上处于"靠边站"境地？（《中国最具争议的人：温家宝全传》)

"明降暗升"是江泽民对温家宝的栽培？

《温家宝传》作者高新说，他以前也有江泽民对温家宝"明升暗降"的看法，直到后来得知温家宝以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在党内兼任的另外一项重要职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才恍然大悟：江泽民不但没有在政治上冷落温家宝，而是把他安排到另外的工作领域加以重用，"江泽民对温家宝的栽培过程似乎应该被概括为'明降暗升'"。

原来，温家宝先是被江泽民安排为重新组建后由他本人亲自兼任组长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秘书长，然后才是被安排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而同时被安排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的，便是江泽民的亲信，从大学毕业后第一天便在江泽民手下工作，后来当上十六届中央

政治局委员，温家宝内阁中主管财经的副总理曾培炎。

江泽民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身份正式“过问”经济工作之后，立刻下令筹备恢复该小组过去曾经有过的下属常设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并于十四大召开之前即安排曾培炎担任该小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接下来，江泽民先在党内宣布温家宝由党务系统“大管家”转行至经济工作领导层，以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身份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不过此事还有蹊跷之处：为何外界多知道温家宝的后一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职务，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前一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职务？官方公布的温家宝简历，都不提及他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之后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以及后来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兼秘书长。

到 1997 年 10 月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温家宝不但继续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在政治局内的规格又升了半格，从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外界这才相信：温家宝不但没有被边缘化，反而又向中枢进了一步。

不久，他的职务又有了两项更动：其一是接替姜春云，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其二是与吴邦国并列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他的这一党内兼职，一直到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后才被改变，取代 1994 年接任该组组长的朱镕基，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该组组长。

1998 年 3 月召开的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温家宝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高新感叹，没想到江泽民为栽培温家宝用心良苦，设计了另外一条迂回迈向中共权力顶峰的道路：从经济领导工作的助手到经济和行政工作的最高负责人。

高新认为，这一安排的好处，是让温家宝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相对超脱的位置上，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从事经济工作的基层考察和专项研究，脚踏实地地一步步积累经济工作的决策能力的领导经验。假如温家宝在离开中办主任之后没有这五年的过渡，而是直接在 1993 年八届人大上被安排为国务院副总理，“那么一线行政和经济领导岗位上的无数琐碎事务，加上温家宝事必躬亲的工作作风，很可能会令他因无暇‘充电’而难以摆脱没有过地方党政一把手指挥和决策经验的局限”。（**《中国最具争议的人：温家宝全传》）**

温家宝与江泽民在性格上是两种人

宗海仁认为，温家宝之于江泽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果说中共元老钦定了江泽民，温家宝则是江泽民进入中南海的引路人。江泽民从上海到北京，温家宝以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身份去机场迎接。江泽民在中南海的家，由温家宝亲自安排并布置。也是在温家宝的陪同下，江泽民先后拜见李先念、陈云、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在熟悉工作期间，江泽民几乎所有的事务都离不开温家宝。

江泽民掌权的前三年，也就是从 1989 年 6 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到 1992 年 9 月中共十四大这三年多时间，李鹏气势逼人，江泽民处处让着他。很多次，李鹏命国务院起草的文件却要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江泽民说的话不算数。有些报告，江泽民批了，还要送李鹏再审阅。有时候，李鹏将一些重要事项压下了，江泽民那边焦急万分，这种情况下，往往温家宝亲自到国务院，先找罗干，实在有必要再亲自找李鹏。

宗海仁概括说，在协调江泽民与李鹏的工作，处理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的关系上，温家宝做得极为周到。所以这些，江泽民应该说是不会忘记的。还有，温家宝在曾庆红的工作安排上，充分尊重江泽民的意见，让曾庆红完全按照江泽民的意见开展工作，并让曾庆红全面熟悉中央办公厅的工作，这一点也是令江泽民难以忘怀的。

江泽民在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为什么不更换温家宝？而要等上将近四年，才让曾庆红接任温家宝。主要原因是：一，江泽民本来就是“弱势”上台，在中南海毫无政治根基；二，胡耀邦下台后，赵紫阳继续启用温家宝，江泽民没有弃用的道理；三，温家宝在中南海的好名声，以及温处事的风格令江放心；四，最重要的是，江有意栽培曾庆红，而当时曾庆红的条件不成熟，所以江必须留用温家宝。

从性格上说，温家宝与江泽民是两种人：

温家宝性格内向，勤于思考，在西北工作的 14 年养成了他更加务实、能吃苦的作风。江泽民生性开朗，思维活跃，没有在中国落后地区的工作经历，对中国社会基层缺乏真切的体验和了解，富有浪漫色彩；

温家宝只知道埋头工作，从不夸耀自己，为人低调，办事干净利索，善于与各种人打交道。江泽民善于表现自己，很多情况下办事议而不决，决断力不够，喜欢吹拉弹唱，爱与文化界特别是文艺界人士打交道，不善于与普通老百姓结交，用毛泽东的话说，“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

温家宝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不因外界对他的看法改变而改变，对外交政策上，强调以我为主，不让对方牵着鼻子走。江泽民注意外表形象，经常因

为外界对他的看法改变而改变，在外交政策上，过于看重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在国内局势有利于他时，中美关系就缓和，一旦国内局势不利于他，中美关系就趋于紧张；

温家宝思维开放式，善于从大量的信息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处事坚决，不推卸责任。江泽民先对某一问题定性，再从大量的信息中筛选他认为有用的东西，爱务虚少务实，善于转移视线、推卸责任。

我们再来看看李鹏与温家宝关系。在温家宝于 1985 年春天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后，便开始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打起 10 多年的交道。（**《中国最具争议的人：温家宝全传》）**

李鹏一句话阻止温家宝当副总理

我们再来看看李鹏与温家宝关系。在温家宝于 1985 年春天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后，便开始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打起 10 多年的交道。

李鹏不喜欢温家宝，温家宝同样不喜欢李鹏。如果说，李鹏不喜欢温家宝是看得见的，能够让人感觉到的。那么，温家宝不喜欢李鹏则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表露出来过。

在宗海仁看来，李鹏生性古板，缺乏灵活性，不善于与人打交道，待人爱憎分明。也许是性格使然，因为不喜欢胡耀邦、赵紫阳，李鹏也就不喜欢胡赵喜欢的温家宝。

前文谈到 1989 年赵紫阳失势时，李鹏立即对温家宝严加防范，不让温家宝接触一些敏感信息，而让罗干替代温家宝，一时间温家宝将随赵紫阳倒台的声音传遍国务院。

当 1992 年温家宝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人选考虑时，又是李鹏的一句话阻止了温家宝的脚步。所有这些，温家宝都心知肚明。但是，温家宝不像胡锦涛，他不怵李鹏，相反因为工作关系，他总是主动地与李鹏接触。与李鹏打交道，温家宝把握住的唯一分寸是，只谈工作，从不与李鹏开玩笑。温家宝从未因工作失误被李鹏抓住任何把柄。

温家宝与李鹏性格中有相似之处吗？有。办事认真，工作执着，敢于负责。这大概是两人最大的共同点。

两人性格中最大的不同是，李鹏不善于与各种人打交道，喜怒哀乐写在脸上。温家宝则善于与各种人打交道，从不表露自己的感情，比李鹏要深沉

得多。

像江泽民一样，李鹏在中国一直处于比较优越的社会地位，即使“文革”期间，李鹏的生活也比普通老百姓好得多。不了解中国农村，不了解中国的中西部落后地区，决定了李鹏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不可能有真切的了解。温家宝出身普通人家，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又奔赴中国最落后的西北地区，并长期在野外从事勘探工作，这些苦是李鹏从未体验过的，所以，温家宝比李鹏更了解中国社会，更理解普通老百姓的疾苦。

李鹏任国务院总理两届，一直没有足够的经济学知识功底，缺乏宏观经济思路。而温家宝后来从党务自觉地转入政务，靠自己的刻苦具备了比较扎实的经济学功底，具有很清晰的宏观经济思路。

李鹏不善于表达，却喜欢到处讲话。温家宝思路清晰，讲话精练，善概括，少废话，不喜欢出头露面到处讲话。

李鹏不好书法，却喜欢到处题词，批阅文件字体潦草，不时有涂改或错别字。温家宝字体工整，字迹清楚，批阅文件无错别字或辞不达意之处，从不题词。

李鹏喜欢游山玩水，喜欢一大群新闻记者写他的报导。温家宝出差就是工作，不游山玩水，更不喜欢新闻记者写他的报导。

无论是中共十五大选举还是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温家宝的得票率都在最高五人之列，李鹏总列于最后五名之列。

可以说，李鹏与温家宝的恩恩怨怨一直持续到今天。2008 年 5 月，海外媒体披露称，京城政坛出现另一个热议耳语，是关于李鹏的。李鹏为儿子向温家宝要官，其行径在官场圈内落下话柄。

李鹏自己是搞水电出身，在他的鼓励之下，一子一女也都进入电力系统，1961 年出生的女儿李小琳从 2008 年元月 1 日起担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董事长；她大两岁的哥哥李小鹏担任中国华能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书记，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被海内外某些媒体谄媚地称为“传奇人物”，未来的“亚洲电王”，有记者写道：在电讯业的竞争上，有过“双李之争”，即李嘉诚的小儿子李泽楷和新加坡李光耀的儿子李显扬；在电力工业方面，也有“双李之争”，那是李嘉诚的大儿子李泽巨和李鹏之子李小鹏。

在大型国企编制中，李鹏之子李小鹏属于中央副部级官员。按说，这对于 40 多岁的他来说，已算不低。但李鹏不这么看，在父亲眼里，他不是“小鹏”，早已翅膀硬了，应该鹏程万里。

因此，李鹏就去向温家宝提出儿子应该升为正部级，温家宝一段时间以来与胡锦涛加强沟通，关系紧密，很有底气，婉拒了李鹏提出的要求。一个月后，也就是 2008 年 6 月，正值六四事件 19 周年之际，李小鹏被任命为中共山西省委常委，随后又当上山西省副省长。

到了 2010 年 4 月，香港媒体又披露，在湖南省长周强升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之后，李鹏之子李小鹏已获内定接任省长职务。香港《明报》指出，李小鹏已于 2010 年 4 月获升为山西省常务副省长，在副省长中排名第二，他到湖南会先出任湖南省委副书记、代理省长。

不过，到目前为止，李小鹏内定为湖南省委书记的传闻，尚未得到官方证实。（**《中国最具争议的人：温家宝全传》）**

李鹏扶植姜春云让温家宝空闲起来

前文提到，温家宝曾一度被江泽民考虑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但却被李鹏给否定了。

李鹏否定温家宝担任副总理的主要原因，据宗海仁撰文介绍，是李属意让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来担任此职，但李调姜进京计划又遭曾经分管农业工作的万里、田纪云的强烈反对。万、田等均属意当时在党内被誉为“深谙农村工作的专家”的国务委员、曾协助田纪云分管农业的陈俊生升任此职，因陈俊生被视为赵紫阳的人，而遭江李的共同反对。

各方争执不下，最后搞了一个折衷方案，温、姜、陈三人均留任原岗位，让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朱镕基分管农业，温家宝、陈俊生分别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协助朱镕基分管农业。温家宝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专事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书记。

朱镕基主持全国农业和农村工作后，通过工作接触，温家宝的能干、机敏、务实、低调、细致、好学和尊重人的作风给朱镕基留下了深刻印象，为此，朱镕基放手让温家宝去抓农业，并在后面坚决支持。

1995 年 3 月，李鹏瞅准时机，调姜春云任国务院主管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副总理，名义上仍由温家宝、陈俊生协助姜春云分管农村工作。实际上农业大权已由姜春云一人独揽。温家宝成了中央书记处中最空闲的成员，陈俊生干脆被李鹏削权为只分管全国农村扶贫工作、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可姜春云进京不久即发生震动全国的“泰安腐败大案”，使其名声一落千丈，在全国农业系统难树权威。

宗海仁指出，李鹏与姜春云的热络关系始于李鹏担任国务院代总理的 1988 年。当时，全国政协在对山东农村考察后给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中心意思是这几年农村改革不如 80 年代初期，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剪刀 差呈扩大趋势，农民收入有所减少。田纪云阅后，将这份报告批示给李鹏。因为此前李鹏一直认为全国农村形势是好的，农民收入是稳定的，还特 别举过山东的例子。李鹏看了政协的报告后，很不高兴，要求山东省组织专门调查并向国务院报告。于是，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姜春云立即亲自出马，组织人员进行选择性的调查，并向李鹏递交了一份报告，此报告的中心意思与全国政协的报告意思正好相反，结论是：近几年，山东农村的剪刀差现象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山东农民的收入逐年稳步提高。这一结论鼓舞了李鹏，也令一些熟悉中国农村情况的领导人深感担忧。也就是这件事，确立了李鹏与姜春云亲密关系的基础。

为了扶植姜春云这一识事务的追随者，李鹏刻意栽培他。为此，李鹏煞费苦心地将与姜春云搞不到一起的省长李昌安调入国务院，继而又将与姜春云合不来的马忠臣调往农业部，并竭力支持姜春云推荐的、时任分管文教工作的副省长赵志浩升任省长，使姜春云成为改革开放后山东历任省委书记中最有实权者，从而达到姜春云彻底控制山东全省的目的，为姜春 云日后晋升中央铺平道路。

六四事件以后，李鹏的权力达致顶峰，姜春云紧随李鹏亦步亦趋。在全国性的会议上，李鹏动不动就搬出姜春云来，要求全国学山东，姜春云终因名扬全国的"山东经验"而于 1992 年开花结果，在中共十四大晋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4 年秋，李鹏又煞费苦心调姜春云进北京，先是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协助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抓农业，紧接着于 1995 年春，增补姜春云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成了李鹏最得意的心腹之一。（**《中国最具争议的人：温家宝全传》)**

姜春云名声不彰给温家宝升起创造极好机会

就在姜春云春风得意之时，山东后院起火了。先是姜春云一手扶植的中共泰安市委书记胡健学腐败案曝光，接着是姜春云的又一个亲信、日照市委书记夫妇贪污受贿、走私贩私被揭发。这两件事都与姜春云有关。胡健学不仅是姜春云在山东省亲手树立的一面旗帜，更是姜春云家中的常客，极讨姜春云的欢心，胡健学孝敬姜春云及其家人胜过孝敬自己的父母。为此，姜春

云在省委全会等多种场合表扬胡健学，要求年青干部以胡健学为榜样，并预言胡是“山东的一颗政治新星”、“未来的山东省省长”。 想不到就是这个胡健学在姜春云拍屁股离开山东之后犯案，胡健学率泰安市党政前八位官员一起因巨额贪污受贿被判以重刑、投入牢狱。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共官场腐败中第一个一锅烂的例子。胡健学除了贪污、受贿、行贿、养情人，还在家里私藏毒品！胡健学审讯中的傲慢态度，更让人联想到胡健学与姜春云难以理清的特殊关系。

胡健学案的曝光，使姜春云寝食不安，生怕因此而牵连。经过一系列至今仍令人捉摸不透的幕后运筹，姜春云的手下人终于将胡健学的毒品问题从案子中拿走，变成胡的女儿私藏毒品，胡根本不知此事，同时，胡被认定的贪污受贿金额也大大缩水，这样就保了胡健学的一条小命。

日照市是姜春云在山东树立的又一个样板，姜曾在介绍所谓的“山东经验”时总要把日照搞活经济的例子端出来，想不到这个经验很快被揭穿了，原来日照的搞活经济靠的是发走私财，比起以后的湛江走私案、厦门远华走私案来，日照案可说是先行一步的样板。

泰安案、日照案的相继发生，使刚刚晋升为国家领导人的姜春云名声一落千丈，在国务院系统难建威信。泰安、日照两案曝光后，姜春云坐不住了，几次三番向李鹏讨主意，李鹏又一次救了他。李鹏是这样在中央和国务院的几个会议上说的：“不能因泰安案、日照案的发生而否定山东近几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不能以偏概全，否定姜春云同志在山东工作时的成绩。”李鹏还告诉中纪委负责人：“要果断地处理山东这几个案子，尽快结案，不要搞得人心惶惶。”也是经与李鹏商量，1996 年春节，姜春云携夫人专程从北京杀 回济南过节，并出席省委省政府组织的春节团拜会，这次不寻常的亮相，就是为了应付群起而攻之的“姜春云已被卷入腐败案”的难堪局面，向人们证明“我姜春云还在，我没有腐败！我老婆也没有被抓进去！”

1996 年下半年，在李鹏的默许下，姜春云大力倡导派工作队到全国农村进行扶贫攻坚。这一做法实施不到两个月，就引起了各地的普遍反感。朱镕基了解此事后，不论是到地方考察工作，还是在中央、国务院的会议上都予以公开反对。在 1996 年底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朱镕基再次不点名地严厉批评姜春云的做法。朱镕基说，“对农村扶贫攻坚 ，派工作队的做法，有很多弊端。现在我们搞的是市场经济，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如果把扶贫奔小康责任压在工作队身上，那么当地党委、政府负什么责任？这样一来会造成瞎指挥。有的工作队下去了，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又没带钱又没带物，但

又吃吃喝喝，群众非常不欢迎，把风气搞坏。”并说，“派出的工作队搞花架子，打乱了原来党委、政府的领导系统。工作队下去，人多七嘴八舌，越帮越乱，实际上也包干不了什么责任。”在朱镕基的公开抵制下，劳民伤财的农村扶贫工作队终于不了了之，自行终结。此事，使姜春云面子丢尽。在姜春云分管农业的三年里，中国的农业形势是改革开放以来最糟糕的时期之一。

1998 年新一届政府组成时，朱镕基坚决不要姜春云继续留任国务院副总理，于是，姜成为 90 年代中国最短命的只干了半届的副总理。幸好，有李鹏在，就跟着去了人大，但在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长、副委员长选举中，只有李鹏和姜春云二人得到了超过百分之十以上的反对票。

姜春云的名声不彰无疑给温家宝的升起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中国最具争议的人：温家宝全传》)**

温家宝皱起眉头，当即从口袋掏出 500 元钱

姜春云的名声不彰无疑给温家宝的升起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机会，经过几年来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进一步熟悉，温家宝对全国农村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温对全国农村工作的清晰思路更得到朱镕基、田纪云等的一致认可。

也就是从姜春云成为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后，协助其工作的温家宝便频频出现在党报和官方媒体上，内容多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相关。

例如，1995 年 3 月 22 日至 29 日，温家宝在广东汕头、梅州、揭阳、潮州等地农村调查研究，了解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情况，与基层干部和群众共同探讨农业发展问题。温家宝在潮州期间，视察广东金鳗集团公司归湖养殖场、潮安县龙湖镇和磷溪镇水稻生产基地以及铁铺镇铺埔管理区的茶园。29 日下午，温家宝在潮州召开了农业农村工作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温家宝说，要认真贯彻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统一认识，加强领导，狠抓落实。确保农副产品有效供给，农民收人持续增加和农村社会稳定，这对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当前，要着重抓好以下工作，一是保护耕地，保护各种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这是农业发展的基础。要抓紧建立基本农田、粮田保护区，不得占用粮田挖鱼塘、栽果树，对弃耕撂荒的耕地，要复耕还田，要认真执行土地管理法，严格控制非农用地，严禁乱占耕地。二是加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切实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重点是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以抵御自然风险；

加强农副产品的储运、加工、流通设施建设，以减少市场风险，加强科技、教育、信息设施建设，以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三是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人，调动农民务农和种粮的积极性。通过支持和保护农业，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使农民务农、种田也能致富。

温家宝还在调查中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和战略作用是不可代替的。沿海发达地区要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建设发达的农业，这是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当务之急是要切实保护耕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调动农民务农的积极性。

同一年的 6 月 14 日，温家宝赴甘肃永靖考察，并到陈井乡的木厂村木厂社，看望和慰问了贫困群众，并鼓励群众发展生产，重视科技教育，争取早日脱贫致富。

“作为群众的领头人，你首先要治穷致富。”温家宝了解完木厂社的基本情况后握住社长张德福的手说，“现在，你既是生产队长，又是工作队长，希望你把社里的集体生产，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等各方面的工作搞好。”

当地媒体报导说，李保福是个痴呆人，妻子张道花双目失明。温家宝握住张道花的双手，一一询问家里的粮食生产、经济收入、子女上学情况，然后对她说：“今天所有的书记都有，包括你们村上的、乡上的书记，还有省上的、州上的、县上的，你有什么困难就说。”

张道花拉着温家宝的手说：“我眼睛瞎了一辈子，啥也看不见。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的女儿能上学，能上希望小学，她这辈子可不能当睁眼瞎啊。我的女儿她很想念书，可家里穷，拿不出钱供她上学。”

听完张道花的话，温家宝皱起眉头，当即从自己口袋里掏出 500 元钱，亲手交到张道花手里，“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这 500 元钱就当作孩子的学费，一定要让娃娃们上好学，念好书。”

随后，温家宝对陪同的领导叮嘱道：“农村要脱贫致富，没有文化是不行的。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你们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些贫困户的娃娃们能上起学，念好书。”

2003 年 9 月 19 日，已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上，讲了他“放心不下的三件小事”，其中的第二件事谈的就是对农村教育的感受：

“我走到一户农家，主妇双目失明，丈夫是个痴呆人。她身边有个六七岁的女孩儿，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位主妇拉着我哭个不停。我问她有什么困难，她说，我希望我的孩子能上学，上希望小学。我瞎了一辈子，就希望

孩子能上学，不当睁眼瞎。她看不见这个世界，但对社会的进步很有眼光。她希望下一代能够上学，就是希望摆脱长期的贫困、愚昧、落后。”

随后温家宝继续讲道：“......执政为民，就要想着广大群众，想着八亿农民，想着一亿六千万儿童的就学问题。现在，农村的情况让我们关注，农村的教育让我们关注，农村的孩子能否上好学，更让我们关注。”（**《中国最具争议的人：温家宝全传》）**

温家宝主持起草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

像中共十三大、十四大时一样，温家宝参加了中共十五大的筹备工作，并负责主持起草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

1996 年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据新华社报导，12 月 11 日，江泽民同起草小组作了第一次谈话，就报告的主题、框架、主要内容、基本思路作了明确指示。

此后不久，十五大报告产生了第一稿，其基本框架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得到肯定。为了进一步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任务，1997 年 1 月 17 日，江泽民对起草小组作了第二次谈话。

长达 10 个月的起草工作，一直是在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在温家宝的主持下进行的。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各单位对报告稿的主题、基本框架和基本观点，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的论述，一致表示赞同。同时，也提出许多好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起草小组对这些意见和建议逐条逐句进行研究，又对报告稿进行了严肃认真的修改，共修改 800 多处，其中涉及内容修改的有近 300 处。

在十五大政治报告起草期间，有关依法治国引起法律专家的高度关注。当时，著名法学家李步云和王家福、刘海年商量，怎样通过这次党代会把“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为此，他们给中央送了几份材料，其中一份就是江泽民 1989 年 9 月 26 日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那段“我们一定遵循法治的方针”的讲话。

“十五大报告起草时，还有人写信反对把刀‘制’改为水‘治’。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出的 16 字方针规定的已经很全面了，动态的、静态的含义都有了，为什么一定要用水‘治’呢？但中央最后采纳了学者的建议，将‘制’改为

‘治’。”李步云说。1997 年 9 月 12 日通过的十五大报告，正式确定“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李步云撰文指出：人们形象地把“制”称为刀旁制，而“治”则为水旁治。“法制”与“法治”这两个词，乍一看来似乎大同小异，事实上具有本质区别。刀者，专政工具；而水，寓意“平之如水”，后者才是法治的精髓所在。法制指一个国家的法及其法律制度，它可以存在于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任何社会形态中；法治强调一个国家处于依法治理的一种状态，它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凝聚着人类智能，为各国人民向往和追求。

从“法制”到“法治”，虽仅一字之差，却是治国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在中国法治建设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 30 年的法治改革，走的就是一条从人治到“刀”制的法制，政策之治，到法治之治转型之路。（**《中国最具争议的人：温家宝全传》）**

温家宝亲自在十五大报告中写上自由和人权

2008 年 5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学生们的邀请来到中国政法大学，与大家一起共度青年节。温家宝在与学生们交谈时也提到了自己负责起草的十五大政治报告，并谈到了依法治国：

“今年是我国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十周年，这是党的十五大提出来的。当时我负责组织文件起草工作，关于用‘法制’还是‘法治’是经过再三斟酌的。虽然一字之差，但意义大不相同。因为光讲制度的‘制’，只提到制度建设这个层面；而治理的‘治’，就提到了治国的层面。中央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完整的提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今年正好是十周年。”

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高尚全，也参与了起草十五大政治报告。他曾撰文回顾了报告中所提出的“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要致力于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等建议被吸收进十五大报告的过程。

高尚全撰文说：起草十五大报告时，他负责所有制改革部分。十五大在所有制理论上有创新，创新点是什么呢？第一，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过去讲是方针，但十五大报告作为基本经济制度，而且跟初级阶段相联系，就是一个长期不能随意改变的制度。第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该而且可能多样化。第三，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讲是有益的补充。第四，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我讲过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百分之百的国有，另外一种是国有的在每个企业只占 20%。哪一种模式的控制力强？高尚全认为是后一种控制力强，因为前者控制一个企业，后者控制五个企业。第五，提出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

另外，十五大也提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这部分由另外两位同志负责起草。高尚全提出“这一部分怎么没有把‘自由’和‘人权’写进去？”他们说：“没地方了。”后来起草小组开大会的时候高尚全发言说：“我建议要把‘自由’和‘人权’写到十五大报告中去。”并讲了三条理由：第一，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问一下自己，你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权？我相信如果不说假话的话都要，都要人权，都要自由。说假话是另外一回事。第二，《宪法》上讲到有这样那样的自由，为什么十五大就不说呢？第三，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我们不要回避它。要老百姓继续跟着共产党走，就必须把这个旗帜举得高高的。

高尚全说，他的这个建议得到了主持起草小组工作的温家宝的赞同。所以温家宝亲自在十五大报告中写上了“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2007 年两会期间，温家宝在回答记者问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高尚全称，这是温家宝多年来形成的重要观点。（**《中国最具争议的人：温家宝全传》）**

朱镕基安排温家宝副总理分管部门最多

在 1997 年中共十五大上，温家宝顺利晋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于 1998 年 3 月任国务院副总理。这样，胡锦涛和温家宝分别成为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的接班人选，在中共内部已经成为基本上确定的培养方向。

1998 年 3 月的九届全国人大召开之后，人们发现温家宝在国务院的职权远不止从姜春云手中接过的农业一项。3 月 15 日，在两会闭幕后的中国总理记者会上，意气风发的朱镕基特别请记者们给初任副总理的温家宝鼓掌鼓励。

朱镕基不只一次地说，“温家宝此人能驾驭矛盾、总揽全局。善于抓全局性、关键性的大事。”无疑，在朱镕基的眼里，温家宝是最适合的国务院总理人选。

是分管部门最多的副总理

1998 年 3 月 22 日，朱镕基在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上宣布并讨论通过了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的工作分工。温家宝被授权分管以下工作：

一，负责农业、农村和环保方面的工作，协助分管发展计划和金融工作；

二，兼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全国绿化委员会主任、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

三，分管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土资源部、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家林业局、国家知识产权局。

四，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地震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相比李岚清、钱其琛、吴邦国三位副总理，温家宝分管的部门最多，工作范围最广。这也充分说明了朱镕基对他的器重。

1998 年 6 月下旬，中共宣布成立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由温家宝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党、政双重身份，兼任该委员会的书记。此外，科学技术、防汛救灾、城镇建设等，均是温家宝在国务院内分工负责范围。如此一来，整个国务院系统内，除了总理朱镕基，就属他公开露面的机会最多。

温家宝任副总理后，出色地领导了农业和农村工作，同时，积极协助朱镕基成功地化解了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持起草了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负责设计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成功地指挥了长江、松花江等流域的抗洪救灾，负责制订了《2001－2010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提出了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永续利用的战略设想。（**《中国最具争议的人：温家宝全传》）**

美媒看好温家宝：不一样的领导风范

深受朱镕基器重的温家宝，在担任副总理后的第一年就让海内外舆论刮目相看。朱镕基在担任总理一年后，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与朱镕基担任总理期间备受争议形成明显对比的是，作为其得力助手的温家宝却被海内外媒体普遍看好。

美国《远东经济评论》2002 年 3 月发表评论文章称，作为下一任中国政府总理的热门人选的温家宝，与现任总理朱镕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朱镕基上任以来，其强悍秉直的个性给中国政商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比而言，温家宝的性格较为内敛。当温家宝接替朱镕基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国内外人士开始讨论未来总理的施政方针和风格，国内各界纷纷暗示相信温家宝上台之后必将有所作为，而外国的投资者和关心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家尚未就此进行清晰预测。如何争取外国投资者的支持和信任，以确保中国作为世界头号外商投资目标的地位将成为下一届政府面临的首要挑战之一。

中国四个副总理之一的温家宝，为人稳重得体，从未当着更低一级干部的面，批评直属干部的不是。尽管他竭力支持朱镕基反对工作效率低下、偷税漏税和虚报统计数字的不正之风，他却并没有给人留下强硬派的印象。另外，他也从未在公开发表言论的时候发明某些简洁的政经用语，比如朱镕基总理常说的“豆腐渣工程”。

温家宝的公众言论通常显得没那么吸引人，“先节水，然后转移水源，”2001 年 9 月在一次关于南水北调的工程的会谈中，温家宝这样告诉官员。同一个月，他又告诉农业部的官员，“我们必须让农民得到尽可能多的实惠，多予少取。”

大多数的评价认为温家宝善于在领导群中调和矛盾，寻求一致，说话不多，善于聆听。正如一位话语尖酸的西方外交官所评价的那样：和朱镕基不同的是，“温家宝不认为作为领导，就有必要摆出一副有些吓人的架势，也没有必要动不动就诉诸法制，表现得像一个发号施令的人”。如果温家宝当上下一届政府总理，这位驻京外交官表示，北京政府将更具理性，其决策过程也将更加团体化。

这与可能将取代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一职的胡锦涛的执政风格不谋而合，此外，如果温家宝主持政府，他将在一系列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大局的关键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其中包括农业、扶贫、金融以及环境问题。

文章称，已经 73 岁的朱镕基总理将在 2003 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移交总理一职。在政府总理候选人名单上，有三个比较有竞争力的人选：温家宝、另外一个副总理吴邦国以及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温家宝的胜算最大，部分

原因是因为他与朱镕基合作比较密切，是朱心目中合适的继任者。

温家宝已经在中共领导高层活跃了 17 年，长期负责政府工作，特别负责农业和金融管理，同时还兼管扶贫、防洪抗洪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工作。从 1998 年开始至今，他一直主持中央委员会金融工作委员会以及中共农业工作领导小组。《远东经济评论》还对温家宝给予极高评价，称其是当之无愧的农业问题专家，而不少人认为一位专门负责农业的政治家成为下届政府总理的有力竞争者，明显反映了中国政府准备花大力气解决农业经济停滞的问题。

分析家们认为，如果温家宝成为新总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成员条款将会有效促进他的国内政策。其首要职责将是确保中国达到世贸的要求，同时尽可能减小实现这些承诺对国内经济利益的损害。为实现这一职责，下届政府需要下大力气继续改革，重组工业结构，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谈到温家宝的民众支持率颇高时，《远东经济评论》分析说，这位副总理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他的施政纲领，因为由于信息覆盖率和透明度的限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没有机会透彻了解某位总理政策的来龙去脉，所以，决定他们是否喜爱这位总理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执政风格。温家宝留给民众们的印象是工作勤奋、诚实而且实事求是。某位中国政府官员回忆说，有一次，温家宝出行北京郊区，并在途中亲自与街边的路人谈话，完全出乎工作人员的意料。

温家宝有时还会稍微“违背”中国的官场文化。一般来说，在正式的大型会议上，领导人发言的时候都是照着写好的讲稿念，然而 2001 年 11 月，在一次会见陕西省各市市长的会议上，温家宝一开始就有言在先：“我们能不能不要念自己的讲稿？作为市长，你们应该有能力用 20 来分钟，即兴讲讲自己辖区的情况。”然而，某位在场的人事后透露说，第一位发言的市长在整个讲话过程中都十分紧张，他装作没有看自己的讲稿，但却无法做到完全脱稿。

总的来说，温家宝的执政风格可以被概括为避免冲突，比较温和。这与不少中国精英阶层人士的希望相符合。某位金融记者撰文表示，自己非常敬重朱镕基总理，但是却不得不承认总理强硬的性格特征和言行，使不少总理身边的政策顾问不敢就某些政策发表反对意见。

当然，这样评价朱镕基并不完全公平。四年来，以他为首的中国政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通过打击走私和偷税漏税，为中央政府加强了国家的金融基础，并将军事和经济区分开来；尽管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花

费了巨大的开支，朱镕基仍然设法保持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此外，朱镕基还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个人魅力和政治技巧，赢得了大众及世界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

在国外政界和媒体中，朱镕基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人们关注他的个人魅力往往多过他的政策。在无数次与外国首席执行官们以及政府官员的会晤中，朱镕基以其直率的话语和自嘲的幽默让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决策人对他整顿中国经济的决心和真诚深信不疑。朱镕基人格的巨大引力让这些具有一流头脑的政商人士坚信他能够成功，所有承诺了的政策都能——实现，于是，外商投资像洪水一样流进了中国。

在与外国访客会面的时候，温家宝的态度总是让人放心。一位在 2001 年见过温家宝的外国商人表示温很爱"提问题，但是，有时候他的问题却提不到点子上。"也就是说，这位外商补充道："他问我们怎样才能让外国人到中国去投资，而不是问怎样才能让外国投资者们在中国成功投资。"

不言而喻，温家宝会见外宾的风格与朱镕基总理的风格大相径庭。"他的气质尊贵，"这位与温家宝面谈过的外商表示："但是，在他的话语中没有特别值得一提或是令人吃惊的成分，这与朱镕基总理的表现很不一样。"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认为温家宝是所有竞争总理职位的人选之中比较具有个人感染力的人。2001 年 9 月 12 日，正值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第二天，温家宝在参加一次小组会议的时候发现人群中有一名美国人，他当即走上前去握住他的手，表达自己对在灾难中死难的美国人的哀悼。事后，这位美国人异常感动，他说："温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他握住我的手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发自他内心的对生命的关切。"（**《中国最具争议的人：温家宝全传》）**

温家宝对农村有独特的情结

温家宝对深入农村研究和调查有着独特的情结，特别是对农村问题。

2002 年 3 月 6 日，温家宝参加辽宁省人大代表团的分组讨论，原九届人大代表、朝阳市市委书记王大操，现在担任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向记者回忆说，温家宝非常关注 "仓借粮"政策，听说辽西去年旱情严重，向一位来自基层农村的人大代表询问过受灾情况和政府相关救济措施后，又连续询问他，"你们市去年向农民'开仓借粮'了吗？借了多少？""发救济粮了吗？发了多少？""有三个数，一定要搞清楚。一是开仓借粮的数，要保证灾区农民

有饭吃；二是救济粮的发放数；三是农民通过打工、亲朋互助等办法自救解决的数。这三个数搞清楚了，对缺粮人口的情况就心中有数了。”温家宝当面告诫王大操。

王大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回想起来，温家宝看问题真细致，当时我对于这些数字心里也有笔账，才不至于出丑。”

九届人大代表、原河北省丰宁县委副书记依然清晰地记得在 2002 年 3 月 7 日，温家宝参与了河北省人大代表分组讨论时的情形。“当时会场一早便挤满境外记者，温家宝抵达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场时，全体代表起立，掌声经久不息，温家宝微笑着与坐于前排的代表一一握手，态度甚是谦恭。对他印象很好，特别欢迎他。我的发言引起了温家宝很大的反应，当时丰宁遭受了连续三年的旱灾，政府正发放粮食帮助农民。”

这位代表说，当自己汇报丰宁政府按照乡村逐级汇总统计上来的数字发放粮食时，话被温家宝打断了：“这样做不行，只靠统计数字做事不行，我们必须眼光向下，只有亲自下去调查，一户户查，一家家问，才能真实了解受灾情况。”

一些有机会接触温家宝的政府官员对媒体说，温家宝到基层调查，一向要求不要事先安排行程和特殊待遇，他总是按照自己的计划，甫下飞机便赶到预定地点，亲自向当地群众了解情况，希望了解最基层民众的想法。如果当地官员已经作出安排，温家宝也会体谅对方，但还是要临时改变行程，随机进行调查，对于特殊待遇则一概谢绝。基层官员普遍感觉温家宝对问题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2002 年山东大旱，国务院原本打算派出水利部官员视察，但随着山东旱情的不断加重，最终温家宝亲自赴鲁。

山东民政厅救济减灾处刘其顺处长对温家宝印象尤其深刻。实地到受灾最严重的聊城等地考察两天，9 月 26 日，召集山东有关领导进行研究，温家宝当场表示，由财政部和水利部向山东省调拨 8000 万元，其中 2000 万元用于救灾，3000 万用于紧急水利工程建设，3000 万用于解决人畜饮水问题；从黄河中上游龙羊峡、刘家峡等水库陆续向山东调拨 15 亿立方米黄河水。

作为长期处在一线的中央主要财经官员，可以通过温家宝的思维片断，把握其经济观念。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缓解民困，从而保持经济高成长并稳定社会，是温家宝的经济观之一。而健全金融系统的中央垂直领导，是温家宝经济观的第二个内涵。1997 年以来，温家宝在朱镕基领导

下参与应付亚洲金融危机，并于 1998 年组建中央金融工委。

失业率居高不下、市场疲弱及银行坏账、呆账庞大，被称为中国最难克服的三大难题，而当务之急的则是金融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将金融改革定为 2003 年四大改革项目之一，即说明解决金融问题已变得十分迫切。"金融体制已成中国经济发展瓶颈，突破这一瓶颈就意味着别有天地，更重要的是，金融是温家宝最熟悉的两个行业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专家说。**（《中国最具争议的人：温家宝全传》）**

朱镕基用"肢体语言"支持温家宝接班

2002 年 10 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召开前访问美国。与以往不同的是，被称为江泽民大管家的曾庆红并未随江出访，这也令坊间纷纷猜测曾是在为十六大作最后准备，甚至传出江泽民以全退换取曾庆红担任国务院总理，以形成"胡曾体制"，确保江泽民退后发挥影响力。

但是，朱镕基却用"肢体语言"明确表态，支持温家宝接班。在江泽民离京时，朱镕基到人民大会堂送行，其后的官方新闻被江泽民完全抢去，但是朱镕基也没闲着，除了召开正常的国务院会议外，还特地带着温家宝巡视国务院各重要部门。10 月 28 日，他和温家宝到国家统计局考察。朱镕基除了严厉要求统计局制止地方上资料弄虚作假，保证全国整体统计资料真实可信外，还特地让温家宝也讲话，提出要求。

11 月 20 日，朱镕基还带温家宝考察国家气象局。同样，朱镕基自己作完指示后，又让温家宝提要求。媒体评论人士称，这些肢体语言，用意再明显不过，就是要告诉"全党全军全国"，他朱镕基坚定地支持温家宝接班。

早在北戴河会议之前，朱镕基也有一个肢体语言，就是带着温家宝出巡黄河。北戴河会议之后，朱镕基更明显将温家宝往前台推，许多日常事务都交由他处理。虽然温家宝在国务院副总理里面排名在李岚清、吴邦国和钱其琛之后，但朱偏偏只带着温出巡考察，说没有"挺温"色彩，难有人相信。事实上，对于十六大的人事安排，江朱处事风格明显不同，朱镕基力求增加透明度，早早就表明自己的退休之意，对于属意的接班人也不躲躲闪闪，左遮右遮；相反，江泽民始终不对交接班明确表态。合理的解释是，朱镕基不恋栈，江泽民对权力难舍难离。

此外，据香港媒体披露，朱镕基还在北戴河会议上作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全文四万多字，指出了中国经济领域存在十大隐患，造成隐患有六大原

因，其中要害是现行政治体制。

朱镕基说，他的报告，会内会外有别，会议层次有别。有人说，这是朱镕基任国务院总理和届满之前的一次较完全的交底。朱在讲话中，五次提到干部要头脑冷静、清醒、醒悟。

朱镕基在报告中用了主要篇幅，详尽地讲了经济领域十大隐患和危机：

一、经济领域发生问题，基本上都运用行政措施来解决和压制。随着发展开放和加入世贸组织，已经证明：行政命令和措施，是有危害的。

二、内需市场持续疲弱，启动不顺利。中国市场虽然广阔，但是中国经济离不开世界，特别是香港特区、美、日、欧盟、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变化的影响，而且依靠程度日益加深。有数据表明，香港特区、美、日、南韩和大陆经贸，直接影响到3000万职工的就业和国民经济总值的20%以上。

三、随着工业科技化提升，产业结构变化，失业人口年增500万，现在城镇失业人口达3000万。每年新增就业人口800多万。乐观估计，每年只能安置400万人。

四、农业、农民的问题，不仅存在着农业结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生产力的解放。农村四亿多剩余劳动力，不但影响农民生活水平，实际上已经是社会上一颗计时炸弹。朱还坦白说：中央没有一套长期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战略规划。又说：中央欠农民的是太多了。

五、国有企业改革停滞，资金流失，企业欠债，现今还有40%的国企要靠举债生存。可七部委半年就把全年经费花完，至六月底，外交部、经贸委、公安部、民委、民政部、对外经济合作部、司法部等部委，已"超额"半年花完了年度经费，现在靠国务院特拨或增援过日子。

六、资金外流情况仍然严峻，从五个方面堵、截、查、管、审，成效不明显。80年代中期，每天有2000万外流。到90年代中期，每天外流资金达到一亿以上；近几年每天外流资金达到近10亿！至今已有达3000亿美元被侵吞、挪用、外流。

七、已经查明，银行坏账、不良资产比例高达38%以上。中央是有不可推辞的责任的，后知后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上达不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资本金充足率。

八、证券业长期缺乏必要的管理，受到人为操纵。有的地方政府部门及企业干部和证券业大户、金融机构勾结。目前状况是积重难返，直接关系到5200多万户股民的利益，这是一颗重磅全局性炸弹。中央是在用行政措施压制着，防止炸弹爆炸。

九、党政部门非法设立小金库，现在还没有一个较完整的统计，大概不少于 3000 亿元，这是非法的，是党政部门腐败的典型。

十、现掌握的外债、内债，还是一个虚数。外债 1600 多亿美元，内债 9600 亿人民币，实际数可能要高出 20%以上。银行存款结构严重失衡。

朱镕基承认：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迟迟不能改变，已经严重影响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和投资意愿，而且严重影响到中国在国际的形象，更严重影响到人民对政府和社会制度的信心和凝聚力。

朱镕基把造成经济隐患和危机的原因，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现行政治体制，在经济改革中暴露出不适应性，甚至起了消极阻碍作用。

二、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专业素质很低。很多严重问题的发生，都和干部自身素质切切相关。

三、法制、法规，不能在经济领域中起到规范作用，法制形同虚设。法制、法规在大部分地区和部门被驾空，被领导个人滥权驾空。

四、政策定位在运作过程中出现问题，得不到纠正，缺乏通盘战略、应对方案，其中包括严重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公开干扰。这在法治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五、改革和发展的方针政策在贯彻过程中，发生严重倾斜；形成尖锐矛盾，造成广大职工和农民对经济改革政策质疑，到反感和对抗，失去了坚实的支持基础。

六、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等习惯，已经成了不少党组织、政府部门官僚的顽症。

朱镕基在任期结束前所谈的经济领域十大隐患和危机，无疑把解决这些难题的答案留给他的继任者——下一届中国政府总理。

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说，现任总理朱镕基，最出众的中国改革派人物即将告别政坛。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位新的国务院领导者，此人必将以激进的改革者、或谨慎的思想家的面貌树立其形象。（**《中国最具争议的人：温家宝全传》）**

温家宝十六大进入中共核心层

2002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11 点 30 分，400 余名中外记者，在经历了长时间等待后显出几分焦躁。中国乃至全世界数以亿计守候在电视、收音机、

互联网前的公众，也在等待着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新出炉的政治局常委，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结束后，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会见中外记者

在比预定时间晚了近半个小时后，清一色藏青色西服、白衬衣、红底白点碎花领带，九名新当选的中共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鱼贯而入，开始与媒体记者见面。

胡锦涛来说："我代表新当选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感谢全党的信任。"他微微侧头，一一介绍其它八位政治局常委：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当介绍到第七位李长春时，他顿了顿，微笑着补充："他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成员。"

至此，中共第四代领导团队在外界意料之中正式浮出水面，而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则成为中共"核心中的核心"。

其实，早在十六大召开前的 10 月 26 日，胡、温、曾三人曾同时登台，出现在农村基层党组织贯彻江泽民"三个代表"的会议上，会议由曾庆红主持，温家宝提出具体措施，胡锦涛则最后总结。这个组合透露的政治讯息，就是"胡温曾"体制要取代目前的"江李朱"体制。

伊铭《中共新的权力三角》一文指出，三角关系，在几何学与物理学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几何学方面，通过三角的解析，任何平面都变得可知，角与线也具有了奇妙的对应关系。在物理学方面，三角关系是最基本的平衡原理。将三角关系运用于权力游戏并非是中共的发明，然而运用得炉火纯青、得心应手却非中共莫属。

中共十五大，乔石退出权力漩涡，朱镕基取乔石而代之，"江、李、朱"三头马车渐次形成。胡、温、曾体制，也许会是中共党内的最佳组合，因为三人都长期在党内共事，虽然性格不同，资历深浅不一，却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都属于同一代人，处事风格都很低调、谦逊，而且相处融洽。特别是温家宝与曾庆红又曾经一起在中央办公厅共事，温的谦让，据说一直受到曾庆红的尊重。

伊铭认为，"十年磨一剑"的胡锦涛主政后，假如由务实、温和、稳健的温家宝主管国务院，由政治智慧过人的曾庆红负责党内事务，再加上吴邦国、

黄菊、贾庆林、罗干等人的辅助，第四代领导集体与第三代相较，应该不会逊色。与“江、李、朱”三头马车另一个不同的是，胡、温、曾体制将更具凝聚力，因为除了同心协力、共治天下以外，他们中的哪一个人都没有独立成为“核心”的本钱。

这一点，从十六大结束后温家宝便率员到贵州贫困山区访贫问苦便可看出。

“虽然温家宝在十六大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担子越来越重，但是他务实的作风和亲民形象却丝毫未改。”贵州省民政厅厅长郭猛指出。

山西省委会务处的乔建国记得这么一件事。2003 年 1 月 2 日，元旦刚过，温家宝率领国 家计委、农业部、水利部等部门官员一行 12 人冒着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严寒，到吕梁山区的静乐、娄烦等贫困乡村和太原磷肥厂、中化第二建设有限公司的太原市万柏林和平小区等地看望困难农户和城镇低收入居民。温家宝每到一户都与村民围坐在炕上亲切交谈，向群众详细了解收成年景、农民负担、退耕还林、中小学教育等情况，询问他们的困难与要求。

据乔建国介绍，由于天气寒冷，温家宝感冒了，但他坚持带病听取山西关于进行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的汇报。这也是这次视察山西过程中的唯一一个会，七个人作了汇报。

再过一段时间，农历除夕，是中国人合家团聚的传统日子，温家宝来到辽宁省阜新市看望煤矿工人，慰问困难职工。

据相关媒体报导，温家宝一下飞机，便驱车两个多小时来到阜新矿业集团艾友矿，下到 720 米深的矿井，在变电所、水泵房、井下调度室，向一线工人详细询问生产、安全等情况，还乘坐井下小矿车到正在综合采煤工作面紧张工作的煤矿工人中间。入夜，温家宝在矿井里与煤矿工人围坐在巷道的铁轨上，一起吃年夜饺子，共度除夕。

辽宁省阜新矿业集团黄玉平告诉记者，阜新矿业集团有近一万多下岗工人，相当于集团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温家宝的这一举动，煤矿工人兴奋异常，都觉得这是对整个煤炭行业的激励，虽然现在国企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在辽宁乃至整个东北地区更为突出，但是国家没有忘记他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一位学者评价，这些年来，中国百姓了解温家宝的途径，主要是电视新闻。他常常“受总书记江泽民和总理朱镕基委托”，去贫困山区，去重灾区。但中国百姓真正开始了解温家宝，应该是从 2003 年春天开始的。（**《中国最具争议的人：温家宝全传》)**

温家宝出任总理：我是温和、有主见的人

发布: 2010-11-22 09:06 | 发布者: 推介 |

2003 年 3 月 16 日上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六次全体会议。会议经过投票表决，决定温家宝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在 3 月 18 日召开的两个多小时的记者会上，温家宝第一次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与 800 多名中外记者见面。

温家宝说：我首先对全国人民讲几句话，感谢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在中南海工作了 18 年，这是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十分重要的一个时期。我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面貌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我经历了这场伟大的实践。......全国 2500 多个县（区），我跑遍了 1800 多个。这使我更深地了解了国情和人民的状况，深知人民的期待。我绝不辜负人民的期望，一定要以人民给我的信心、勇气和力量，忠实地履行宪法赋予我的职责，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不负众望。

温家宝在评价上届政府和朱镕基时说：上届政府在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忠实地履行职责，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人民是满意的。我们现在的全部工作都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开始的。前人给我们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摆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和问题，还要我们继续进行开创性的工作。我总记着一句古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居安思危，有备无患。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已经成为制约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一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第三，下岗和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社会保障的压力非常之大。第四，城乡发展不平衡，东西发展不平衡，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相当一部分人口处于贫困状态。第五，财政负担沉重，金融不良资产比例较高。但是，我们有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奠定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要坚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我相信，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德新社记者问：朱镕基开始当总理的时候，他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他都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他比起来，你觉得你的工作风格会怎么样？

温家宝回答说：朱镕基总理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个领导人，他有许多优点值得我学习。至于我自己，大家普遍认为我是一个温和的人。但同时，我又是一个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人。在我当总理以后，我心里总默念着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就是我今后工作的态度。

香港东方报业集团记者问：我们很想知道，新一届政府对香港政策会不会改变？目前香港财政赤字严重，失业率也很高，无论是特区政府也好，香港市民也好，都在努力渡过难关。请问，中央政府会不会采取进一步措施支持香港更快渡过难关？我还想问一下，您什么时候去香港亲自为我们打打气，我想香港市民一定会很欢迎的。

温家宝答：感谢你的提问，使我有机会第一次通过新闻媒体向广大香港同胞、澳门同胞表示我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香港战胜了亚洲金融风波带来的经济上的困难，保持了稳定和发展。毋庸讳言，香港经济目前确实遇到比较大的困难，主要表现在失业率增高和财政赤字加大。这既有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也有香港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但是香港的优势还在。香港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直到目前，香港没有一笔内债和外债，目前香港的居民储蓄率还超过 1997 年。香港有完备的法制，有有利的区位优势，有许多优秀的管理人才。现在需要的是团结和信心。我完全相信香港同胞的智慧和能力，在以董建华先生为首的特区政府的领导下，香港一定能够克服眼前的困难。

至于说到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我想明确表示，我们将一如既往、竭尽全力支持香港的稳定和发展。我们正在抓紧落实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的各项措施。香港是中国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也是中央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希望能到香港去，越快越好。

香港凤凰卫视记者问：熟悉您的人都说您是一个重视事实、也非常注重资料的人。麻烦您告诉我们，在目前中国国情当中，有哪些资料您认为是最为可喜的？有哪些资料最忧心、牵挂和关注的？

温家宝回答说：瑞士前驻中国大使曾经说过我的脑子像computer（计算机），我的脑子里确实装了许多数字。这些数字有使我高兴的，也有使我忧虑的。譬如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GDP的增长速度年均在 9％以上；中国近五年尽管受到亚洲金融风波的影响，GDP的增长年均在 7.7％，去年达到 8％。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 3000 亿美元等等，这些是使我高兴的。但是，

有些数字恐怕连记者也不完全清楚，比如中国的劳动力有 7 亿 4 千万，而欧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只有 4 亿 3 千万。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 1000 万；下岗和失业人口大约 1400 万；进城的农民工一般保持在 1 亿 2 千万。中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中国 13 亿人口有 9 亿农民，目前没有摆脱贫困的 3000 万左右，这是按每年人均收入 625 元的标准计算的。大家知道，这个标准是低水平的，如果标准再增加 200 元，农村贫困人口就是 9000 万。中国东西部差距很大，大家恐怕只是从概念上了解。我想说一个数字，中国沿海五六个省市GDP超过全国GDP总值的 50％。

这几个数字，已经点出了三个问题：农村问题，就业和贫困人口的问题，东西部地区差距问题。因此，当好中国的总理不容易。如果要我说现在的心情，我觉得身上的担子有千钧重……（**《中国最具争议的人：温家宝全传》)**